

● 人才故事丛书 ●

主 编：蒋蕊娟

走 向 卓 越

——自己的故事

陈应谦 沈立人 王雪蕉 吕锦华等著

中国人事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走向卓越:自己的故事/陈应谦等著,一北京:中国人
事出版社,1998.4

(人才启示录丛书;2/蒋蕊娟主编)

ISBN 7-80139-206-X

I. 走… II. 陈… III. 人物-传记-中国-吴
江. IV. K820.853.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8)第 06762 号

中国人事出版社出版

(100028 北京朝阳区西坝河南里 17 号楼)

新华书店经销

煤炭工业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1998 年 4 月第 1 版 1998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787×1092 毫米 1/32 插页:2 印张:5.625

字数:99.65 千字 印数:0001-3000 册

定价:13.80 元

目 录

- 序一 张学忠 (1)
- 序二 孙长贵 (3)
- 序三 蒋蕊娟 (5)
-
- 鲜红的记忆 陈应谦 (1)
- 潇洒脚步 沈立人 (75)
- 半个世纪的画卷 王雪蕉 (95)
- 以书为伴的岁月 吕锦华 (117)
- 在科学的道路上 李怀志 (141)
- 脚踏冰山 苗来生 (152)

由吴江市人事局局长蒋蕊娟同志主编的《人才启示录》丛书如期付梓，我作为一个同行，倍感欣喜。

蒋蕊娟等同志，长期从事基层人事工作，无论是发掘人才，还是服务于改革，他们都将一般事务性的工作紧搭在社会进步的脉搏上，其间一定不乏有益的启示和可资借鉴的经验。从这一点看，这套书是“基层人写”和“写基层人”，这对于如何做好基层的人事工作，无疑是不可多得的“经验谈”。今年春天，我在会议间隙，到吴江实地考察了那里的人事工作，他们的努力和做出的成绩令人倍受鼓舞。

当前，我们人事工作的指导思想和总的要求是：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精神，坚持邓小平同志关于建设高素质干部队伍的要求，紧紧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大力加强精神文明建设，把工作的连续性和创新性结合起来，继续推进人事工作“两个调整”，深

化相配套的人事管理体制，加快整体性人才资源开发的步伐，开展“为人民服务，让人民满意”的活动，建设好公务员、专业技术人员、管理人员三支队伍，为实现跨世纪的宏伟目标提供强有力的人事人才保障。

这套书的另一个特点，就是立足于“吴江人写”和“写吴江人”，编撰角度新颖，因而书中所论及的人、事无不带着江南润土的气息。

吴江地灵人杰，群英荟萃，曾走出许多诸如柳亚子、费孝通这样的知名学者。然而，他们所处的年代，只是一个人才自生自灭的历史阶段。当前的重要任务，对我们这些从事人事工作的干部来说，就是从这一古老的土地上，发现、发掘、培养出大批投身于社会主义建设的优秀人才。这大概就是蒋蕊娟同志编撰《人才启示录》丛书的初衷吧。

是为序。

1996年12月26日

张学忠同志为国家人事部副部长。

《人才启示录》丛书是吴江市人事局向社会奉献的一部佳作，其品位，感同非凡！

不断耕耘，不断收获。早在几年前，吴江市人事局就创造性地站在人才发展的战略高度，创办了《人才》报，并通过这张报纸以及多种媒体，颂扬历史，反映当代，全面、系统地展现吴江人的精神风貌，以其浓厚的吴越乡情雅集了一大批海内外英才贤士。《人才启示录》丛书的面世，无疑给人们以启示，为读者迷津指途，为吴江的两个文明建设发挥积极的促进作用。

《人才启示录》丛书既以其真实、鲜活的内容体现出激人发奋的正气，又凝沉着赏心悦目的雅气，有其独特的风格；超越寻常，高瞻远瞩，开拓了行政地域和行业界限的视野，着力揭示了人才成长的普通规律。

因此，丛书给广大人事工作者以深刻的启示，同时又不失为青少年的良师益友，也是人

们用以教育后人的好教材。这正是我为其高兴之所在。

吴江，既有悠久的历史，又颇具现代特色。相信《人才启示录》丛书的出版，又是一次很好的体现和弘扬。

1996年11月于南京

孙长贵同志为原江苏省人事厅厅长。

近年来，日益深化的现代意识，使得人们对人才所显示出的巨大力量感到越来越不可轻视，有的人已经乐意将它强调为各项事业兴盛的“第一推动力”，这种意识在我看来一点也没有过分。

作为一个多年从事人事人才工作的人，我一直认为，古今中外由人才造就的喜怒哀乐都是至关重要的，因而，很值得思考、借鉴。每当不肯放弃这种念头时，我总希望能够通过某种人们乐于接受的形式——比如采取富有人文色彩的形式——来补偿具体事务性工作所不能尽力的部分，于是，《人才启示录》丛书就在这样的心愿驱使下开始编撰了。

想要完成这样一项不小的文化工程，而且期望丛书的品质能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和行家的评鉴，确实不是轻松的事。好在有一个特别的基础，那就是我负责编刊的《人才》报，其栏目中有相当一部分文章具有启发和教育的意

义，也受到过读者的喜爱。不过，即使如此，我们在选编中也注意到，凡是对现实启示作用不明显的文章一律不用，凡是写历史的文章必须具有较高的文化价值，凡是纪实的作品都应是第一手资料。这些原则，也就构成了丛书的基本特色。

《人才启示录》丛书共分为六册，分别是《谈人说事》、《名人画廊》、《骄子风采》、《走向卓越——自己的故事》、《人才史话》和《凡人风华》。在体裁上主要是言论性的杂谈、人物散记、报告文学、自述性传记、笔记小品和随笔，力求在阅读时能够轻快、活泼一些。

我们承认，编撰像这样一套从人才角度来论及社会、人与事的书籍，因缺少参考资料，不免显得稚嫩，加以本人水平有限，不妥之处存之必然，当请读者朋友指正。

在此，我要衷心感谢我的同事们和朋友们，是他们在丛书的编撰过程中给予了我很多的支持和帮助。

1996年秋于退思园

第一部分：迈向圣地

一

我已经是 80 多岁的老人了。回想着过去的岁月，青少年时代在我的记忆里，依然那么清晰，那么生动。

辛亥革命的次年即民国元年（农历壬子年七月二十一日），公历 1912 年 9 月 2 日，我生于吴江县黎里镇。祖父叫陈仲甫，终年 83 岁，父亲叫陈叙卿，终年 82 岁。据父亲告知：祖辈是从浙江省慈溪县逃难到吴江，值“洪杨”之乱，带上几麻袋中草药来黎里镇经商行医。黎里镇第一个中药铺“陈同春”即于 1841 年道光二十一年开设，至今已有 150 年。慈溪老家，系原陈阁老家族。当祖、父辈在世时，仍与慈溪老家来往，很讲究节日典礼，虔诚恭拜祖宗神像，我在幼年常参加跪拜。

我的家在黎里镇夏家桥下岸的住宅区，上

岸是面南，多设商店，祖父的“陈同春”药店在对岸。童年时，我先上一二年私塾，七八岁再上树人初等小学。在位于庙桥弄底禅杖浜的高等小学读书时，毛啸岑是校长，以英语、国文、算术为主课，五年级学英语模范读本第一册。有次，我对“desk”（桌子）答不上来，被罚午间迟放学一小时，叫“关点心”，如下午迟放学叫“关夜学”。此事至今记忆犹新。

到六年级，国文课读《祭妹文》、《陈情表》、《曹刿论战》、《卖柑者言》等古文，都严格要求诵背，十分吃力。临毕业前，父亲问我：学得怎样？如果不行，去求求毛啸岑校长，送些礼物。我马上回答：“不必要，求人也无用，主要还是靠自己。”父亲听了很高兴，认为有志气。

我在初小二年级曾读过暑假补习班，那是二、三、四年级混合大课。有次，老师提问：“有样物事，强盗抢不了，小偷偷不了，火烧不了，水淹不了，是什么？”有的同学答是金子银子，老师说可以被人抢了。有的同学说是房子田地，老师又说，可以烧掉淹掉。大家猜得十分尴尬着急，你看我，我看你，我站起来回答：“本领。”老师非常高兴，说：“对了。二年级小学生有此志气，奖一本少年杂志作为鼓励。”平时，父亲就常常叮嘱我：“一个人要有学问、有本领才行，长大了不必靠父母。”这些嘱咐给我的印象很深，使我早早地萌发了自力更生和学习知识的愿望。



陈应谦同志

摄于1996年11月，北京颐和园，时年83周岁。

二

高小毕业时，正值 1925 年孙中山先生逝世。毛啸岑校长召开追悼大会，我们毕业班学生都参加，并赠发每人一套三民主义宣传资料。由此，我开始初步知道一些三民主义救中国的大意了。

我们毕业班的全部同学，接着就在高小校院内新建的中学校上初中，校长是王旅昌。现在，我能记忆的高小同学，有邻居帐簿作坊的蔡炳坤、焚烧垃圾老太太的孙子王三友、殷佩六的几个儿子（殷的大儿子殷尚恩，比我高一级，同班的有殷尚惠和患小儿麻痹症的殷尚忠），还有徐大楣、王鸿训等。那时，我的学名叫陈昌瑞。我们曾站在一起唱毕业歌：“劳燕分飞，各奔东西……。”70 年历史翻过了，今犹健在者几人啊！

在我家夏家桥附近有所女子小学校，张应春烈士曾在该校任教。我在家门口亲眼看见张应春女士，那装束在当时是很少见的：短发、黑裙、白衫，她精神抖擞地经过我家门，给我留下的印象颇深。传说她是革命党人，国共合作时，她任江苏省妇女部长，后被国民党惨杀在南京。父亲常告知邻近的柳亚子先生做革命工作时用篮子装信寄发的故事，我为此吃惊摇头不止。记得某日我们正集合排队放夜学，突然从上海来了一位中学生，仓惶地报告他亲自参加五卅游行目睹同胞被杀的惨状。这些零星的故事、见闻，在幼小的心烙下深深的印记，深远地影响着我后来的人生观。潜移默化的学校、

家庭和社会的教育，对一个人来说是多么重要。

三

1926年后，我随父亲到盛泽镇西庙桥开设寿康中药店，并拜西荡口简寅生名医为师。师兄姊有简伯龙、简汗青、简晓峰、简美贞，还有外来的徐寿人、刘意安等人。我年龄最小，每天随诊抄录方剂而已。如此闲荡二三年，十分苦涩。盛泽与黎里不同，以经营丝绸为主，市镇繁荣，贫富悬殊。那时，有一件事在我的生命历程中十分重要：1926年（民国十五年）夏季，时疫（即霍乱）流行，严重时每天死亡者达数十人，朝发夕毙。夏天的一个午后，我先腹泻数次，渐渐加重。腹泻的特点是，不费劲地自然而下——像开放水龙头那样直泻而下。这样几次下来，马上自感体力不支，空虚了。我告知父亲：“可能得了霍乱！不行了！”父亲嘱我速休息。他马上找位善针灸的理发师（当时的理发师大多兼学针灸、按摩、推拿等）到我家针治。我此时已十分衰竭，时值夜幕降临，在模糊中看他对我扎针（不用艾炙），其中有特长针向我腹部扎进去，虽害怕但不感到疼痛。约半小时结束离去。开初，我仍不时腹泻，但次数渐少。到半夜感到发生明显变化，大便似有劲了，精神也好多了！不久，黎明光降，父亲去店铺上班，旋即返回告诉我：邻居杂货铺的十三四岁的男孩昨天同时得霍乱，今晨已死亡了，正在“烧包”（凡刚死者的家人将死者平时所穿衣服焚烧叫“烧包”）。我聆听之下，悲

喜交集。相似年岁同时得病，一亡一存，两相对比，祸福如此明显。我已衰竭垂危而转危为安，庆幸得救，不能不归功于理发师的针治之效，他挽救了我的生命。此事此情，至今近 70 年来，我始终未曾忘怀过。

四

1927 年我母病故，父娶继母。次年，我到在上海商务印书馆任编辑的继母亲戚家做客，得到十里洋场观光的机会，顿开眼界，发现先进之光。上海之行使我更明白：必须学习专技，奋斗竞争，才有出路。于是，下决心要到上海继续念书。我先在老西门的精勤学社补习英文、国文、算术等功课，该校教学严谨，我迅速获得较大进步。之后，再到文生氏英文专门学校，拟投考海关、银行、邮电外商经营事业，以期发展前途。但经过几年日常观察，洋人和租界对中国同胞的奴役暴戾，使我十分气愤。失望之余，我的思想矛盾开始转化，扬弃了不正确的崇洋意识。我和在复旦大学毕业的舅舅商讨，职业生涯何去何从？他劝我仍习西医，既可为民治病，又不求人，更不求洋人，自力更生。我遂决定投考东南医学院。入学刚不久，就遇上“九·一八”事件，这正好激发出我过去幼小心灵和近年所见所闻的义愤，于是，积极参加了自己学院和邻近的暨南大学所发起的爱国学生运动，使我进一步受到思想教育，加深爱国主义觉悟。我后来才知道，我参加的两校学运是由中国共产党某支部领导组织的。我平时爱看进步小说和电影，

如郭沫若、鲁迅、成仿吾、郁达夫、邹韬奋等人的著作，以及《渔光曲》、《大路》和《雷雨》等影剧。我校政治老师经常宣传中国共产党要求抗日的事迹和江西瑞金赤都的情况，讲述毛泽东、朱德的故事，我听得津津有味，更加仰慕共产党救中国的信心和希望。当时，上海共产党地下组织活动频繁，宣传抗日救国，更加深了我对蒋王朝卖国求荣、投降妥协的反感和不满。有几次，想找那位政治教师谈谈心事，表达爱慕共产党的感情。不料该教师是国家主义派人物，出版政治书籍。幸而未上当入圈套——“张灯扑蛾之计”。

医学院功课十分繁重，从五年制延长为六年制，要经国家统考后发毕业证书，所以学习紧张。我原来身体瘦弱，精力不足，幸好有些同学爱好体育运动，因此一起早晚锻炼，尤多长跑。我有时在暑假期间留校活动，可以同时借用显微镜、实验室加强复习功课，一举两得。那年，上海市召开大学生运动会，是在交通大学内举行，我报名参加万米长跑赛。比赛时我落后了，但坚持跑完3万米赛程，引起全场注意。同学们和观赏老师围上前握手祝贺，称赞我有始有终坚持到底的精神可嘉，毅力令人钦佩。我本是倒数的失利者，反而在次日的报纸上受到不点名的报道和表扬，使我内心愧憾万分。我在不知不觉中逐渐养成的这种坚持不懈、有始有终的习性，贯穿在以后的工作、学习和运动锻炼之中，做什么事都恪守凡半途而废则一事无成的教训，不让所

下的功夫、精力白白落空和流失。其后，对毛主席教导的“凡事要一抓到底，抓而不紧等于不抓”的至理名言，更有深刻的理解。

五

经过强身训练，我精力充沛，学业上进，名列前茅。毕业时考入南京中央医院做实习大夫，该院是按照北平协和医院新建成的国家大医院，三百多病床，分一、二、三等病房，设备齐全先进，主要大夫和护士长等都来自协和医院或留英、美医生，一切制度规章基本上按协和制执行，连医师的名称，也改叫成北方话的“大夫”。医院对病人十分负责，严肃、认真，正规化。南京中央医院也是中央大学医学院的教学医院。我和其他进入该院的同学，是经沈克非校长亲自到上海考核后录取的，他虽是协和毕业的留美生，但是位爱国主义者，对书写病志，要求一律用中文，查房对答不准讲英语。他常亲自考查我们的工作，亲自作病例学术报告，甚至深入到食堂关心后勤生活。如此深入基层工作踏实的作风，使我深受教育，印象难忘。在抗美援朝战争时期，沈克非教授到东北负责指导输血工作，十分爱国。

我做实习大夫时，分管头等、二等病房和随科主任教授们出特殊门诊，所见国民党政府的大小官员、太太小姐颇多，他们对医生倒也十分尊敬和客气。

我们南京中央医院地处市郊，毗邻卫生署中央军校，旁为厉志社，前有公园和明孝陵飞机场。过逸仙桥

到闹市区，向郊外即游览名胜的中山陵和明孝陵、谭墓等。在这样优越的环境里，我的工作仍是十分紧张而有节律，学术进步很快。那年正值“双十二事变”，事变的当夜，我们几个大夫正在打桥牌，突然听到爆竹声，传来庆祝“蒋委员长”回京的消息，医院准备了为蒋介石住院检查健康的一切条件，让我负责，但蒋介石没有来。不久到了1937年的夏天，我们正平静地奔走在病房，一心一意为病人服务，“七·七”事变的枪声响了，全国上下忍无可忍地卷入了战争状态。“八·一三”上海战事首先爆发，日本飞机第一次向我们医院对面的飞机场投掷炸弹，使我们这些从未经过现代化战争的人，从惊梦中清醒过来，十分恐慌，不知所从何去。从报纸上看到中国共产党八路军一致抗日的声明，以及将在苏北创立抗日根据地等有关抗日的消息。国难当头，战争把我们这些久已不问政治的爱国青年，又拉回到政治舞台上了，我决心献身随军抗战。当时，有几位高级大夫如李穆生、梁树芳等，到海军的江阴江防司令部工作，要我也去，我匆匆随带一些日用衣物，参军上前线了。我告别了求学求知的平静的青少年时代，同全国人民一起走入了八年抗日的艰苦岁月。

六

1937年“七·七”事变后，南京决心抗日，大学生集中南京军训，政治机关大量撤退备战。“八·一三”上海战事爆发，我随南京中央医院几位高级大夫，到江阴

海军江防司令部设在南闸镇的伤兵医院工作。11月初，上海战事失利，南京、江阴危急。这几位高年大夫首先撤退向后转，要我负责前线医疗救护工作。我既年轻又无经验，无法胜任此职，这明摆着一推了之，逃之夭夭。我亦从江阴越长江，到对岸靖江县再到扬州。不料在扬州遇见同学茅寿璋，他刚从前线回家，告知国军无法抵抗，看来日军即日到来，不如暂避一时，一同去扬州郊区三里巷乡村，在他亲友家蛰居二月余。其间不断传来日寇枪杀、奸淫我同胞事件。

1938年春节后，我决心到大后方参加抗日救国神圣的战争。从水路经泰州到南通天生港，乘英国轮船在上海租界外滩上岸。沿途途经长江口岸一带，看到无数大小兵舰和渡轮，都悬挂着太阳旗，少数几艘悬挂米字旗、星条旗或其他国旗。当然是不可能有中国旗的船舰了。见此情景，我极其伤悲：祖国已成为殖民地了！我在上海租界上想外出看看，一到老西门口，已被日军封锁把守，义愤填膺，决心不再返家省亲，又买英国船票到香港，转广州入内地大后方。那时中央医院已迁到长沙协均中学，正在救治前线来的伤病员。我见到院长沈克非，要求到前方医院工作。他理解我的心情，同意我奔赴前线并开具了证件。我于1938年3月至5月间，在河南信阳县伤兵医院工作，这个医院医药条件很差，给伤兵涂点红药水就搪塞了事，且伤兵无人管理，时常闹事。令人伤心的还有医院贪污腐败十分严重，我亲眼

看见院长在抽鸦片烟呢！我无法继续效劳了。

我随即参加了由宋庆龄募款组织、林可胜（协和医院生理名教授）主持的医疗防疫队，医护人员先在长沙受训一个月，然后分赴各省县的前后方，为难民防疫免费治病。我被分配到湖南省支队工作，这是服装设备、待遇建制与红十字会组织的手术医院队完全相同的姐妹队，服务对象一为难民、二为伤员。我队先到衡阳，再到湖北羊楼洞，再返湖南常德，正遇长沙大火，撤退到沅陵。湖南省政府机关也同时撤到沅陵。处处一片混乱，惶惶终日，不知所措。1939年初，我队调到湘西芷江县，我是分队长，主管该地防疫工作。芷江县城较大，城内有20多万居民，宪兵司令部亦驻在该地。一次，宪兵司令陈子珍中将宴请外地来的两位少将师长，要我和他司令部的军医处上校蔡处长陪客，席间谈及一事，说某次宴会时菜肴中挟一只死苍蝇，主人看到后马上找副官耳语几句，不久，在盘中托出该炒菜大司务的头颅来了。这些军阀作风，讲得有声有色，而我听着，不禁大为震惊：如此暴政！平时，我亦常闻惊锣急鸣，看见宪兵推扭几名乡民插上某某匪犯死竿，快步游街，押去正法。初见惊恐，其后听得习惯了。

春夏之交，芷江城内霍乱流行，每天有不少人死亡。我们除宣传卫生常识外，加强预防注射。但由于市民多从江河中挑水饮用，所以，我们在各个挑水码头上设专门饮水消毒站，严格执行消毒，我经常到各处检查

监督。消毒站每月雇员用费 100 元，由县政府交我使用，我每月向县政府报销，多退少补，十分守廉。但县长认为凡是交我使用的办公经费，就算个人收入了，不必每月来报销清算。他盯着我看，好奇地问：“你可能是个共产党员吧？”弄得我莫名其妙，我以为这是应尽之责，不能贪污钱财，使该办好的不能办好，使大批人民遭殃、霍乱流行。我由此知道国民党大小官员中，贪污已成为例行常规，反之，廉洁奉公者必为共产党党员了。当时，我每月工资 100 元，如加上办公费 100 元装入私囊，则每月可达 200 元了。那时每两黄金仅 90 元至 100 元，每人的包伙费每月只需 7 至 8 元。而我个人生活费花不了多少。我用工资的积存款买些金饰品，后来带到延安给中国医大购置一些实验标本，对教育有所裨益。

某日，芷江突然遭日机袭击，警报大鸣，我们迅速离开房屋躲避，随即轰炸声中，房屋震荡。我们原来藏在葡萄棚下，起到一点精神作用，自觉可笑。我们马上赶到轰炸点抢救伤员，但见四肢头颅血淋淋地或挂在城墙，或悬于树枝，满地尸体。我又一次目睹日寇残杀我同胞的惨状。

从 1938 年 3 月到 1939 年 9 月这一年半时间里，我在抗日大后方，耳闻目睹国民党消极抗战，贪污腐败，伤兵难民无人医治，人民遭殃，国难当头，痛感个人能量有限，忧国忧民于水深火热之中，心情十分沉重：我

向何处去？

我在长沙医疗防疫队集训时，认识了李亭植医生，曾向他袒露自己向往八路军的思想，他说：内部有熟人，将来一同去吧，或到新四军或到延安。我正在芷江忧虑万分的时候，李亭植来信，告知奔赴延安，并附着介绍信，我喜出望外，立即辞职，到桂林八路军办事处报到。这是1939年8月。

七

记得在桂林一家民房，门口有小屋作为传达室，内置各种革命书刊报纸。我心情激动，静待接见，边看边等。约半小时后要我上楼，亦即传达室的楼上，房间很小。我见到戴眼镜穿灰布军装40多岁的八路军人物即李克农同志。他表示：“欢迎，请先略等几天，等等李亭植。”不久李到桂林，他认为我先行到达比他还积极。我们一起住在竹料泥糊的简易平房内即桂林办事处招待所。数天后乘大卡车北上，我扮作八路军副官，套上袖章，很感“神气”，此时我梦寐以求的愿望实现了！内心何等高兴和骄傲啊！要到新世界发挥我的本领了！

车经柳州、独山、贵阳、再经遵义到重庆。每个人按每天发放伙食费（约每人每天合一元），沿途自己选购食品。住宿旅馆费则由公家租报。时值深秋季节，桂林办事处发给我们一套灰布棉军装。先住在重庆郊区山坡地方的招待所，等车北上。招待所附近山上山下正是桔黄季节，有天然岩洞以防空袭。有时我们下山到重庆

市区曾家岩八路军办事处。先在招待所等车去延安的有位日本籍 30 多岁妇女，是何思钟教授（已在延安）的夫人，她带上二个男孩和一个女儿，后来一起乘车赴延。

到 12 月初通知我们出发，那天宪兵检查时十分严肃，身穿戎装少将衔的叶剑英参谋长，在场护送我们，因此得以免查放行。还有冯文彬，据说他是青年团团委书记，到成都，有一对青年男女上车，女的是华西大学口腔学院牙科生，男的可能是位党员干部。大卡车上约有 20—30 人。出成都北上剑门关，山高险要。到陕西省宝鸡，有八路军仓库和办事处，休息一天，经咸阳时，曾到附近马嵬坡参观杨贵妃坟冢。所见一堆荒土，十分凄凉。到了西安办事处休息几天。我们又买些御寒衣物和日用品，作长期生活在延安打算。

我们从西安继续北上，心情格外激动，不久即将进入另一世界的延安了！回忆那天下午有人向全车人宣告：“马上要到我们自己的地方了！”即郿（富）县，我们首先看到一个巍峨的营牌，正门口站着数名持步枪的灰布军士和旁边几名手持红樱枪的游击队员。大家互相鼓掌，十分亲热，欢迎我们驶入大门站口。我们再观察边区市容民情，安祥整洁，一路风光明媚，终于在 1939 年 12 月 20 日到达圣地延安。此时前后，毛主席于 12 月 1 日发表《大量吸收知识分子》，又于 12 月 21 日发表《纪念白求恩》。这是针对我们学医的知识分子

的两篇文章，真是巧合的幸事。

我们先住在延安大砭沟卫生部招待所，是一大间一大排的土坑，铺上千草，将我们自带的行李安卧在上。次日有白求恩和平医院院长鲁之俊（外科专家），是李亭植老同学，来看望我们。他告诉我：“你的老同学朱慧现改名叫朱仲丽同志已早在延安，已和政治部主任王稼祥结婚了。”次日朱也来看望我们，并于晚上由卫生部部长叶季壮在西北餐馆宴请我们，大家欢叙一堂，异地相逢，格外高兴。这时我们迁到延安东北远郊拐茆陆军医院，刚改名白求恩和平医院。眼看已到1940年元旦日，医院开大会欢迎我们。李亭植代表我们讲话，十分热闹。我心情异常兴奋，感到处处新奇。就以那个新年大会来讲，大家又讲话，又歌唱，表演节目，无拘无束，欢舞亲切，成为新世界、新乐园的大家庭，还以为在梦中欢腾呢。同时，我敏锐地意识到，这是共产主义社会集体主义新生活方式的开始。

八

我在延安住了不到一个月，1940年1月中旬，我被分配到延安南面200余里的张村驿卫校工作。

张村驿卫校，即八路军卫生学校，它的前身是中国工农红军卫生学校，1931年创建于江西中央苏区，随同工农红军进行长征。贺诚、陈志方和王斌等同志，都先后担任过该校校长。抗战爆发和红军改编后，该校才改为八路军卫生学校，王斌继任校长。可见，在陕北山

沟里的这所卫校虽不引人注目，却具有长期的传统。它是在红军战争中诞生的，是在艰苦卓绝、浴血奋战中成长起来的，在当时中国医科院校中，也是独一无二的。所以，我刚到这里的时候，自然会处处感到新鲜。

中国旧社会的医科院校同其他院校一样，办学方针基本上都是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学来的。这种学校里，学生虽然也能学到不少科学技术知识，但也培养了他们对个人名利地位的追求，脱离工农大众，脱离革命斗争，更是普遍倾向。张村驿卫校却与此不同。它直接继承了红军卫校的办学方针：即“培养政治坚定、技术优良的红色卫生干部”。当时，卫校有学员约 900 人，绝大多数是从抗大、陕北公学和青训班抽调来的青年，分别编为军区十三、十四、十五、十六期和调剂八、九期，还有两个护士班。虽然文化程度参差不齐（多数是中学水平，也有大学肄业或小学程度），教学设备更谈不上，桌凳都是土台台，但是，大家的政治热情都很饱满，学习也很认真。那时我在十四期任课，没有现成教材，我是用自己带去的几本外文书作参考，边作笔记，边写讲义。我们实行教学民主，学员感到有什么地方没有听明白，可以当场发问。还有课代表，每星期要征求学员意见，向教员汇报。教员又和同学常常生活在一起，所以师生关系很融洽。卫校学员除了学习和在校内开展各项文体活动外，还参加种田和农副业等劳动。在张村驿周围荒山上，卫校学员开辟了千余亩耕地，年产

数百担小米。

我在张村驿卫校的时间较短，只有两个多月。1940年3月，该校迁到延安东门外的柳树店，我也随校到了那里。这时，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也迁到柳树店，作为卫校的实习医院。同年9月，卫校改名为中国医科大学，我继续在医大工作，直到全国解放。

这时，学校的规模扩大了。建立了十多个学科：解剖组胚、生理、生化、细菌、病理、药理、内科和外科、儿科和妇产等科。教员也有所增加，他们大都会外文；有些曾留学德、日、英、法等国。还有国际朋友如朝鲜人方禹镛、德国人米勒、奥地利人福莱和加拿大人马海德等来医大工作或兼课。教员条件也较快得到改善。这时，学校从国统区和香港购置了不少外文书籍和仪器设备，建立图书馆和实验室，还自己制作一些简单仪器和教学设备。这一切为提高医大的教学质量和学员的技术水平，提供了较好的条件。我也将自己的金饰品托人带西安变购一些标本切片资料，充实教学。记得1945年有个从国统区来延安的中外考察团，参观了医大以后，曾说：“医大的教学设备条件，看来和贵阳医学院差不多。”尽管如此，医大仍然把提高学员的政治思想水平放在首位；提高学员的医学技术水平，正是服务于无产阶级政治这个大前提的。这在医大的办学方针上，表现得极为明白。

九

医大办学方针的基本精神，还是红军卫校传下来的，同时从抗日战争的实际情况出发，有了新的发展。1940年制定的新校章中，曾明文规定：学校工作的目的，是“培养革命的、技术优良的卫生干部，适应抗战建国的需要，为民族解放与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成为政治坚定、思想正确、忠于职责、贯彻始终的卫生工作者”。

为了贯彻这个办学方针，学校除设立政治部，开设政治课和健全党团生活外，还通过其他的办法和途径，如教学组织、发扬艰苦奋斗克服困难的延安精神和生产劳动自力更生等方面来实现。现分述如下：

（一）教学组织

学习组织比较严密，在校部下设学员大队部有队长和协理员，统一管理全校学员和各大队。每大队辖2—3个期（每期约有40—100人不等），设队长和指导员管理学员的思想和生活等工作。学习由各期与教务处联系。每期设期长和副期长各一人，分别管理学习和生活，并负责上下联系。期长每周要向大队部及校首长汇报，及时解决发生的问题。

每门功课，均设课代表一人，其任务是负责同学与老师的联系，及时反映同学们对老师教课的意见和疑难问题。

每期按人数多少又分几个行政班组，每组5—8人，

男女搭配，收集对学习和生活的意见。小组讨论会可能解决许多疑难问题。如当时由于缺乏教材和书籍，同学们在上课时必须边听边看边想边记，精神高度集中才能完成任务。每天课后同学们都要把课堂上笔记整理一遍，互相核对补充讨论了解。所以大家非常珍惜自己的笔记和热心参加小组讨论会，发挥个人才能和集体智慧，各人的笔记才能完善。经过几年的艰苦劳动，到毕业时，每人都有一套厚厚的笔记本，成为他们在战争中完成医疗任务唯一的参考书。到了后来发油印讲义并补充笔记。

（二）发掘艰苦奋斗克服困难的延安精神

我初到张村驿时看到十五期的教室是借用镇村的一座小庙戏台。同学们自己动手在戏台前面，用土坯砌墙，留出门窗，用石灰粉刷，搞成一座小教室。里面用砖头垒成高墩和短墩，向群众借来门板和木板，架到上面作为课桌和凳子。黑板是用锅烟灰和牛胶涂在墙上做成的。后来，迁校到延安柳树店，在建校中，大家动手通过延河从城里运送炸毁旧房的木材，兴建校舍，与工人一起创建礼堂、图书馆、教室、实验室等。

在建校十周年纪念和十四期毕业之际，举办了展览会。展出品种，有用白细布绘制的解剖学和外科学、手术学的挂图共 300 件，教具和模型 120 件，各种标本 200 多种，这些都是由师生克服种种困难制成的，目的为了提高教学质量。还有上述学员的精美笔记本等。在

展览会上，毛主席参观赞赏并题词：“办得很好。”朱总司令的题词是：“埋头苦干。”

毛主席题词后，给在校师生讲话，说：“你们医大和中国革命一样，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她必将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而不断地壮大……。”又亲切地指示说：“你们要学点唯物论、辩证法。我还是那句老话，为人民服务。”那次十四期毕业文凭上就是有毛主席题词“救死扶伤，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

学校校长，医院院长主任除大量行政工作外，还兼任教学工作，而且精益求精地教导学员。我们的细菌教员曲正同志是留德留日的专家，他带领同学研制优质牛痘苗，既丰富了教学内容，又解决边区军民预防接种的需要。教员的生活比较自由一些，但在教学、医疗任务繁重时，仍能克服困难条件，常与同学一起生产劳动和参加政治运动，成为集体主义成员。所以十八期同学对老师有一段评语：“我们老师不仅以他们渊博的学识、精湛的技术孜孜不倦地教诲我们，而且他们本身处处都是我们学习的榜样；他们脱下西装革履，抛弃优裕生活，不顾国民党的造谣诽谤，冲破层层封锁到延安，穿粗布衣，着草鞋，住窑洞，吃小米，在昏暗的油灯下编写讲义，改作业；在冰冻的教室里用冻僵了的手，握着标本，捏着粉笔，能不使我们感动吗？他们不仅在教书，而且在育人。”

（三）生产劳动自力更生

延安时代的物质生活是非常艰苦的，加上国民党的长期封锁，生产生活资料愈加贫乏。大家响应毛主席的号召，“自己动手、丰衣足食”。那时我没有牙刷牙粉，只能用些粗盐，用手指早起擦擦牙齿。为此牙齿经常发炎化脓；有次高烧败血症，也没有什么消炎药可治，听天由命，硬是顶过来。我的鞋子坏了到后来用破旧布打成布草鞋穿，已是较为高级的鞋了。小灶伙食常吃馍和小米粥，久之食欲不振。每月发给我五元生活费，在当地每元可买 50 个鸡蛋，在无处可放的情况下，只得用盐水泡，先因所放盐量不足，都臭了，后来大量加盐，又太咸了。

十

在越来越困难的情况下，又在原来的生产运动基础上，于 1942 年（1941 年是最困难最艰苦的一年）军民开展了轰轰烈烈大生产运动。一度规定每人每年要生产粮食三石、毛衣裤一套，而且不影响基本教学进度。在这样繁重的任务下，女同学纺毛线、织毛衣；男同学从事农业生产，开荒种粮，有的编制箩筐，一度供不应求，有的种西红柿、南瓜，有的上山采药或糊火柴盒等等。我们教员也人手一架摇纺车，开荒种地交任务都不例外。

有的男同学上甘泉西山烧木炭。整个烧炭期间，劳动量很大，劳动环境、居住条件潮湿阴冷，营养有限，又处于柳拐子发病区。这些综合因素，使参加烧炭的几

名 20 岁以下的年轻同学，得了四肢多部位的关节损伤变形。经过三个多月的艰苦奋战，三个月共交了 40 万斤木炭，为贺龙铁工厂、军工厂提供了燃料和制炸药的原料。同学们用生产所得的钱，解决日用品，发肥皂、毛巾、牙刷、牙粉和自捻毛线织成毛衣裤、毛袜、手套等。种菜则改善伙食。

学校组织办了两个农场，养了 300 多口猪，种了大片蔬菜。不久，就达到了粮食自给一半，肉食基本自给和蔬菜全部自给。这不仅减轻了人民负担，也增强了师生的劳动观念，促进了思想改造和知识分子劳动化；并达到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目的。

尽管参加生产运动占用了一部分时间，有时也停课进行。但原订的教学计划，还是保质保量定期完成了（没有寒暑假）。

医大的学制，比历届卫校的学制都更长。军医班改为四年，制药班改为三年，调剂班仍为一年。1941 年，还招收了研究班十余人。在教学内容上，也作相应的调整。不仅重视临床技术，还扩大了理论部分。处在抗日战争年代的医大，为什么要在学制方面作这样变更呢？这是从毛泽东同志《论持久战》的思想出发的。根据毛泽东同志的科学分析，抗日战争是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人民革命力量将在抗战中空前地壮大起来；抗战胜利后，就会有一个空前广阔的解放区，并可能把抗战的胜利发展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到了那时，党的医疗卫生

事业，必将有一个巨大的发展，就需要有一批人数众多的、忠于党的事业，又具有较高医学水平的干部，作为发展党的医疗卫生事业的骨干力量，这当然应该早作准备。医大，正是基于这种政治远见扩建起来的，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医大要延长学制了。

既然是为了培养发展党的医疗卫生事业的骨干力量，那么，应该选派什么人来医大学习呢？当时，有一个通俗的说法，叫做“培养新老干部”。“新干部”主要是指刚从国统区来到延安的知识青年。“老干部”大都是原来红军、八路军的师团中的卫生部部长或卫生队队长。其中，多数参加过长征，但年龄都不大，20上下，是年轻的老干部。这些“老干部”学员，文化水平一般较低，但他们都经历了革命战争的锻炼和严峻考验，也有丰富的临床经验，只要经过学习，提高医学文化水平，他们就能成为发展党的医疗卫生事业的极其宝贵的领导力量。当然，这就要使他们有较充裕的学习时间。他们到校后，有的还先补充一年文化，再进入军医班学习。医大的办学方针和学制延长，实践证明是完全正确的。随着1945年抗战胜利和1949年中国革命的胜利，医大学员奔赴全国各地，担负起了迅速发展党的医疗卫生事业的繁重任务。解放初期，他们还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代表，接管了许多国民党的医学卫生机关，他们中不少人，直到现在，还在医学卫生部门，担负着领导工作。

还值得指出的一点是：医大学员，都是怀着饱满的政治热情走出校门的，党分配到哪里，他们就打起背包，高高兴兴地到那里去，党的需要就是自己的志愿，这同医大认真贯彻自己的办学方针是密切相关的。

的确，在医大的办学中，还没有“同工农群众相结合”、“同生产劳动相结合”、“又红又专”和“德、智、体全面发展”等明文规定。但从上述情况中，可以清楚地看出，它实际上已经这样做了。这同党在全国解放后，提出的“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教育方针的基本精神，是完全一致的。

中国医大教育方针的具体实施和延安精神的体现，我是从集体主义生活方式和置身于革命大家庭中，从实践中慢慢学到的。同时，对我人生观得到进一步的改造，成为共产主义战士有密切关系。现在，在新形势下，又如何适应改革开放呢？

第二部分：在延安

1939—1940年期间，延安风情概况

1939年冬，我刚从蒋管区到延安边区的共产党世界，一切感到新鲜稀奇。偶见用红绿油光纸张贴的标语：“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化！”“工人农民联合起

来！”这工人两字即毛主席在党八股一文中批点的。“一切服从蒋委员长抗……”后来知道这条是违背我党抗日统一战线独立自主的原则的。耳闻共产党领导人中有王明、博古、洛夫、康生、罗迈、凯丰等名字，似中似洋，我心中好奇，爱打听多问。据告，这是留苏人员的别号，有的见于上述标语上。新华书店陈列各种书刊：如《毛泽东自传》、《朱德自传》、斯诺的《西行漫记》，各种马列主义名著和种种革命小册子；其中就有王明的《百分之百布尔什维克化》一书公开出售。说明当时党内思想自由争论，尚未统一。还没有听说“毛泽东思想”这一命题。直到1945年七大会上，王稼祥同志首先提出“毛泽东思想”，即马列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思想。我们早已知道共产党领袖是毛泽东，他的文章早已为人们争读，如《论持久战》一书。至于《〈共产党人〉发刊词》，一直在党内传阅，尚未公开发表。那时党组织、党员活动都是秘密进行的。对毛主席与上海电影明星蓝苹即江青新婚传说，意见纷纷，似觉不合常情，有不妥不安之感！

延安老城，于抗战初期，遭日机炸毁，已灭人烟。转移到城郊山坡四周，如王家坪、杨家岭，为军政机关所在地。新市场为商业区、边区政府、边区银行、农贸市场集散地。大砭沟是一般行政单位所在地，以卫生部、医疗门诊部、新华书店、西北餐馆、八路军大礼堂等为热闹中心。市街行人，多半是外来者，有干部，有

学生。有少数人象文化人，长发、衣帽不整、边幅不修的流派人物，引人注目。但一般行人，个个都精神焕发，超然自在，乐观友好。一律穿灰布军装。女同志早已“不爱红装爱武装”，绑腿军帽，雄威潇洒，呈现一片战时景象。

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和其机关学校，矗立在宝塔山周围山坡上冬暖夏凉又能防空抗震的土窑洞里；毛主席和党中央同志亲自来讲课作报告的窑洞大学，是一座治党治军治国英才的大熔炉。入夜微弱的小油灯，照亮了各个山头，处处都似高楼大厦，疑是山城重庆抗日中心，但换了世界。据告：日寇侵占华北后，到1938年河南信阳、武汉、长沙失守前后，大批青年男女纷纷投奔到人心所向的抗日中心延安圣地，参加抗日救国运动。中央适应形势的需要，成立了抗日军政大学、女子大学、陕北公学、马列学院、自然科学学院、青训班和鲁迅艺术学院等，培养了大批德才具备、坚定不移地执行党中央路线的干部。这批青年多数于1938年参加革命，故又称“三八式干部”，十分珍贵，贡献极大。现在已成为革命老人了。全国有更多的青年志士仁人，参加就近解放区，在前线浴血抗战，同样起到不可磨灭的功绩。

到1939年，国民党在边区周围，关卡林立，禁止进入延安，甚至抓人去受训改造。我们于1939年12月经过西安时，办事处同志警告我们，要集体外出，小心被国民党特务抓走。从此有志者难以进入延安禁区了。

那时，延安实行吃、穿、住供给制，免费就读。干部除供给制外，每月最高津贴费五元，我每月也得五元。

延安的西北餐馆，有个名菜叫“三不沾”，即嘴、碗、匙都不沾，实际上就是重油鸡蛋羹而已。还有各种炒菜，初到延安者，身边尚宽裕，餐馆生意兴隆。有次我们从柳树店医大到大砭沟卫生部开会。饶正锡部长于午餐叫了几个炒菜请客，放在窑洞门外的桌子上，我们四五个人站在那里大吃一顿。我最记忆犹新的，有个青辣椒炒肉片，又鲜又辣，十分可口，美不胜收，回味无穷，至今对此菜，尚垂涎三尺呢！

1941—1942年：困难时期

1941年国内外形势有三件事，影响很大：

(一) 1941年1月的“皖南事变”：是国民党反共高潮、破坏抗日统一战线、有利于日本帝国主义灭亡中国的阴谋；

(二) 1941年6月22日，德国法西斯大举进攻苏联，长驱直入，直到莫斯科保卫战，社会主义国家和共产党十分紧张，人心振荡；

(三) 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袭美国海军基地，爆发“珍珠港事件”，英美对日宣战。

当时日寇十分猖獗，国民党内投降派、反共顽固派，执行其防共、限共、反共政策，准备向日本投降。

从毛主席在 1941 年对干部作报告的照片上，毛主席的裤膝上有两个大补钉，便可以推想那时的困难情景了。

生活上：陕甘宁边区，被国民党 20 万大军严密封锁，停发军饷，军服每年每人一套也困难。粮食又不足。接着毛主席发动大生产运动号召：“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思想上：有少数人不安心于本职工作，甚至怀疑抗日胜利遥遥无期。所以毛主席那次做了“革命有前途，个人有前途”的报告（此报告原文未能找到），在叶剑英主持下提出了“通过业务来表现政治”的讨论题。

我们医大教员讨论过几次，意见不一致。我与王斌校长极为主张每人应首先将自己的工作做好，就是革命工作。但有少数人另有看法，争论不休。

总之，中央认为这几年是困难时期。我就在这 1942 年的困难时期，光荣地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又于同年结婚，死心塌地为革命工作终身。

这两件事分述如下：

记得入党前，有次组织上通知我，可以参加教员党员小组的生活会，到席旁听。我参加时，很细心地倾听他们互相提出的日常生活和工作中的意见，后来各自虚心接受，作了自我批评，态度十分诚恳。由此我深受教育。这样同志式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在旧社会里，从未见闻，这对每个人的进步十分重要而珍贵。再想到自己的

毛病缺点很多。为此我更加积极要求入党。经过两个老党员的介绍和三个月的候补期、宣誓，我成为一名正式中国共产党党员。回想起来，为什么要我去旁听秘密党小组会受教育呢？可能组织上认为我已具备入党条件了。入党后，将原来把我作为统战对象以客情相待，一变而为严格要求，以党员标准来批评和自我批评了。开始时我在思想上和面子上有点受不了。根据毛主席《改造我们的学习》和整风文献精神，在理论上，在实际中，加强自我改造、锻炼（包括劳动），确有飞跃和进步。凡经过延安整风学习运动的老同志、老党员，确有一种不同的风格。以后又经过各种运动，素质不断提高，至今不衰，故能保持晚节。

接着，1942年秋，我和姚永华同志结婚。延安结婚有两条原则：一是同志，二是组织批准。婚礼很简单。我们教员结婚，学校组织上照例添几个荤菜，大家欢叙祝贺，已成常规。记得那天，仍像他人婚事一样，在教员宿舍的四合院内（即朱总司令常来报告的场地），教员小厨房就在旁边，增放几张桌子，大家来聚餐。一无酒，二无烟，有些糖果而已。延安结婚前后，夫妇对象，一律称为“爱人”，属于中性，男女都适用，一直沿称至今。有的夫妇结婚后，无固定房间，每逢星期六，找个房间临时同居，有的回家团聚，这叫“过星期六”，也沿习至今。

我们次年即1943年生了儿子，叫延智，那时正好

赶上“抢救运动”。姚永华也被“抢救”，又要哺育婴儿，十分累罪，幸好时间较短。我到杨家岭参加医疗会议，庆幸得免。后来我们为了改善生活，自设小炉沙锅，偶尔添菜。但“能源”要从用过的煤渣中二三道里寻找小煤核（头二道已被厨房同志拣走回烧了），像“淘金”一样艰难。最好唯一的私菜，是红烧鸡，或红烧肉，再窝入几个鸡蛋。到时请客共同享受，有时请鲁艺要士，有时找个别同学来品尝等等。苦中作乐，过得很愉快、甜美。1944年6月16日姚永华为庆祝儿子周岁生日，又做了上述名菜，由于小锅容量有限，只请了一位客人来自我祝贺而已。

1943年：整风学习运动（包括抢救活动）

经过1942年困难时期，到1943年春，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斯大林格勒之战，又称红色凡尔登）和我国的抗日战争经过了最艰苦的岁月，度过了黎明前的黑暗，胜利的曙光已经在望。全党开展整风运动。首先深入学习文件，领会精神实质，提高思想认识，然后联系自己的思想和工作实际。以反对主观主义整好学风；反对宗派主义整好党风；反对党八股整好文风为中心内容，进行对照检查，和风细雨地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同志们都写发言提纲和笔记心得。整风运动真是一场极其生动的马列主义教育运动，使同志们在世界观的改造上，对提高理论水平，分清历史上的路线是非，起到积

极作用。其间，陈云同志给我们作过学习《反对自由主义》的报告；总政傅钟副主任亲自来校蹲点指导。有次讨论到医学上有否阶级性问题，结论是：学术上是统一性，服务观点方法上有阶级差异性。我们又听了胡耀邦同志来医大作的整风运动动员报告，其中有一段，非常生动形象地传达了毛主席给官僚主义的画像：一言不发、二目无光、三餐不食、四肢无力、五官不全、六亲不认、七窍不通、八面威风、九（久）坐不起、十（实）在无用。他的讲话，引起了全校师生的极大学习兴趣。

但是到1943年整风后期，康生在大砭沟八路军大礼堂，作了“抢救失足者运动”的报告，明显地出现了“左”的偏差。他不顾毛主席的九点指标（一个不杀、大部不抓……）。相当一部分同志受到不应有的冲击。康生的“抢救运动”导致医大停课10天（7月1日—7月10日）。这10天逼供信盛行，使整风运动走了一段弯路。幸好及早发现，及时纠正。9月开始分别平反，让受害者在会上发言，叫“出气”、“解疙瘩”，使受冲击者深受感动，恢复了团结局面。其中“逼供信”为害最大，先用车轮战、疲劳战，日夜“逼”成“特务”。再“供”出同道名单，在偏听偏“信”下，不断扩大被斗面。所谓“坦白从宽”，只要自认“特务”就可以吃碗鸡蛋挂面，以示解放了。后来鸡蛋挂面供不应求，甚至连保小的小学生也有自称为“小特务”。被中央发现

立即中止。

这期间，某夜，突然康生的社会保卫部派车带上刑具、名单，要逮捕医大师生共约 40 多名，说是“反革命分子”，要王斌校长签字。王校长认为证据不确，不算数，拒不签字。而医大的政治保卫人员苦劝王校长：不要冒风险了！还是签字罢！但王校长始终坚持不签。次日，他亲自到毛主席和王稼祥同志那里汇报，说明理由，得到同意，避免了一些人的灾难。后来在医大文印股工作的张真同志说：“名单上有他。”解放后他任哈工大校长。仅此一例，可以推测他人了。

那时，我正在杨家岭礼堂的上面会议室开医疗问题讨论会（吃住在那里十多天）。有天下面礼堂开大会，很热闹。我抽空下去看看，见到康生正在作动员，是要大家坦白从宽的报告，要大家报名认罪，气氛十分紧张，也确有人当场提条报名的。我看了十分惊奇，返楼告诉王校长、马海德、鲁子俊等同志。

中央领导同志来医大视察作报告

在延安时期，毛主席曾到医大视察并作报告约有四次之多。第一次，毛主席于 1941 年春到医大先看望了住院疗养的续范亭（民主人士，原阎锡山的高级顾问，后反阎到延安）和王观澜同志，他们各住一个窑洞，患的是肺结核病。毛主席给王观澜“既来之、则安之”的题词后，再到学校视察了教室、实验室、图书馆、宿

舍、厨房等，听取了汇报，然后到医大自建的大礼堂讲话，大意是说：一切事物都是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不断发展的。毛主席指着山边的小树比喻说：你们学校，像这棵树的生长过程一样，从卫生小学到卫生中学再到卫生大学，现在虽然校舍和设备还很简陋，但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会不断发展的，以后解放了全国，进入大城市，会发展得更大更好。只要我们真正为人民利益学习、工作、服务，我们的事业就有无限的生命力。

1941年11月7日学校举行建校十周年（已改名中国医科大学）庆祝活动，毛主席给医大十四期毕业证书题词“救死扶伤，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第二次到医大，详细看了学校举办的展览会，题词“办得好”。然后对师生讲话：抗日有许多工作，学医治疗伤病员就是其中的一种工作。做学生要好好学习，学好了，要全心全意为军民服务；做教师的要好好教，要教得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这生动、用意深刻的讲话，给全体师生以极大的鼓舞和教育。

毛主席在1943年冬第三次到医大，看望了一些病人后，在傍晚张挂马灯下，仍在礼堂为在“抢救运动”中受冲击的师生，道歉甄别平反。最后仍用老话“为人民服务”结束。

第四次是1944年。毛主席给医大师生讲话中，讲到我军发展过程时指出：我军用小米加步枪战胜了蒋介石的五次围剿；蒋介石怎样充当了红军的“运输大队

长”；我们将如何战胜日本帝国主义，迎接抗日战争最后胜利的到来……。

周恩来副主席有一次从重庆回延安，专程来医大视察，甚至深入到厨房和饲养牲口的地方，而且对炊事员、饲养员的姓名都熟悉或细问。这是他习以为常的常规。到晚上运来发电机，我亲眼看他同工作人员一起牵拉电线，安装银幕并主持放映电影给医大全体人员看，边作解释，工作十分热忱周到。在与师生交谈中，周副主席亲切地说：“你们在这么艰苦的条件下，把学校办成现在这么样子，是很了不起的。希望你们百尺竿头更进一步，把学校办理更好，多为前方部队培养优秀的医务干部。”

朱总司令从前方回来，叶剑英参谋长从国统区回来，都曾到医大视察并作报告，讲国内外形势，特别是战场形势。朱总司令连续来医大几次，详细讲解前方游击战争和百团大战的战绩。朱总司令在可容一二百人的教员宿舍四合院内，大家亲切地围坐在他老人家身边，静听他的报告，其乐融融。报告会由饶正锡部长兼政委主持，饶部长坐在总司令的左前侧，秘书在右桌上记录，我戴着眼镜在秘书背后侧坐着。回忆那时多么幸福、愉快呀！

贺龙将军，在1945年“八一”建军节时，恰巧在医大养病，学校就请他作报告。这位久负盛名的传奇式人物，用自己的亲身经历教育我们。他生动风趣地介绍

自己如何从一个旧军阀转变为共产主义战士，甚至连生活琐事也不隐讳。通过他的报告，我体会到“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的信条。贺将军富贵不移、威武不屈、视利禄如草芥，一心追求真理，锲而不舍、百折不挠的精神，深深打动了每个人的心：“做人要做贺将军这样的人。”

陈毅同志患疟疾贫血，兼痔疮手术住院期间，常到王稼祥夫妇休养的窑洞。他说：常与医院朝鲜大夫方禹镛对奕围棋，盘盘输掉。方大夫每盘只叫输一二粒或二三粒，这其中显然有尊敬之意。陈毅想赢几盘，总是赢不了。有次和王稼祥夫人朱仲丽同志下围棋，陈毅同志一边下棋一边吃水果糖。有次棋势对陈毅同志不利，他有些紧张，只顾一个子一个子地下，忽然发觉嘴里的“糖”含了半天没有甜味，下意识地把它吐在手心里一看，啊！原来是一粒棋子！陈毅同志把吐出来的棋子，放大棋盘上，仰头大笑！王稼祥同志笑着说：“陈毅，你可真是食而不知其味了！”由此可知陈毅同志无论干什么，都是非常认真的，下棋如此，工作也是如此。

我在那次杨家岭礼堂上面会议期间，有位香港海员工人的老党员叫邓发，他上楼看望我们，闲谈中，他告诉我：“西安事变前，我在杨虎城将军那里当炊事员（广东人善烹调），因此常有机会在杨虎城吃饭时，边征求做菜的意见，边机警地做了很多抗日救国和统一战线的政治思想工作……”我聆听后十分感动。共产党员的

中央委员为了救中国，深入虎穴，甘当孺子牛！哪有共产党不得天下之理啊！

第三部分：告别延安

1945年：抗战后的征途

1945年抗战胜利后的10月4日，中央军委成立总卫生部，任命王斌同志为副部长。当时，毛主席指出：“我们没有什么东西给东北拿，把三个干部学校（注：指中央党校、抗大总校、中国医大）带去，把军委的几所学校拿过去。”1945年11月7日，王斌同志奉党中央命令，带领中国医大部分师生离开延安，告别陕北乡亲，踏上奔赴东北的征途。那时，我是医大的一名教员，王斌校长要我随校出发。学生队有十八期和二十期同学共约数十名（十九期已毕业）。在得知医大迁往东北的消息后，大家准备了一些途中所需的物品和食物等。我买了两件毛皮衣给两个孩子用，并将工作任务交待给留下的师生。

王校长对我们有家眷的教师，每家分配一架轿窝子。这是陕北的交通工具，小孩大人可在轿内躺睡，两头用牲口架轿行走，要互相配合步伐，特别过山路弯道，需有经验的轿夫驾驭。出发那天，全部轿窝子、车夫、牲口都到齐，另有一些牲口用于驮运物品。学生和

工作人员数百人，浩浩荡荡，整队出发。我们恋恋不舍地离开生息了七八年的延安圣地，带着革命任务，兴高彩烈地踏上新的征途，目的地是东北解放区。那时，大批干部和中央委员都纷纷进入东北地区。

柳树店，地处沿延河向东北方向的必经之地。当天第一站甘谷驿，其后经延川，到清涧县。该地盛产青石，所以多数房屋都是青石砌墙，石片瓦，十分清洁坚固。次日，王斌下令：任命我为教育处处长，刘永久为总务处处长。

学校组织了“前站组”。这套组织制度是承袭了我军在打平型关战役中转移大批伤病员的运输办法和长征中积累的打游击经验。他们负责沿途大队伍人马的住宿、饮食、交通、粮草筹划等。前站组的同志每天都是披星戴月出发，早走三四个小时，到达预定目的地后，办好一切交涉，做好一切准备；定好每家每户男女老少以及每队班级的住宿，准备开水伙食等，再迎接大部队的到来。所以我们毫不用操心，只要管好自己，跟随大队行军就行了，每天约走七八十华里，像长途旅游观光一样轻快。

我们经过陕北的绥德、米脂到达佳（葭）县，渡过奔腾湍急的黄河，进入了晋绥解放区。记得那天下午在黄河岸边，人畜共乘渡船时，看得出牲口在汹涌澎湃的河心中也心惊胆颤，不敢乱动。我们浏览着黄河两岸的潮势险滩，有惊无险，安全地渡过了黄河。

过了黄河，即山西省。当时由于日寇仍然盘踞着同蒲铁路，只得绕道。十二月份天气寒冷，塞外朔风劲吹，刺骨之寒，人畜须白，棉衣变薄，飞鸟不见。那里人民生活十分艰苦。

经过绥远省重镇丰镇时，政府机关仍有伪军站岗把守，物质丰富，市容繁盛多了。我们曾两次穿越长城，又复进入山西省的阳高、天镇。沿途新老解放区的城乡呈现鲜明对比，老区人民心情开朗，衣食基本有了保证，而新区则由于日寇三光政策的摧残，留下累累伤痕，历历在目，人民衣不蔽体，面有菜色。这一切使我们更觉重建中华任务的艰苦。跨进丰镇，我们已看到了祖国的动脉——平绥铁路，有的同学伏下身去抚摸铁轨。

我们从山西天镇乘火车抵张家口附近的孔家庄待命。经过一个多月（11月7日—12月12日）的行军，横跨陕西、山西、绥远、察哈尔，行程数千里。那时，张家口隶属察哈尔省的首府。张家口是前两个月接收下来的，正在整顿治理中，一般市容尚好。我曾几次进入市区购买一些东西，并在王校长的住处见到了聂荣臻将军。

约于12月底，突然接到命令继续进发，从孔家庄乘火车，经宣化、怀来到延庆附近待命。据说蒋军占领了辽宁省义县，铁路线受阻，就在怀来县城里过了元旦。最后退回张家口，暂时到河北省的涿鹿县待命。位

于桑干河畔的这座古城，九门九关，青砖筑成，风貌壮观，城内市民尚称富裕。我们住在一家大厅的东厢房，任国祥一家住西厢房，其他师生都和市民共居，和睦相处。到春节期间，师生们发扬我军的拥军爱民光荣传统，出墙报，向群众宣传革命形势，组织秧歌队，密切了军民关系。到了1946年2月下旬，全校师生又折回张家口，接管了伪蒙疆医学院，改名为张家口医学院。三个多月后，中央命令学校继续向东北插进。此时有张家口军区派来的大卡车和军队武装护送，并有延安来的抗大和党校部分师生干部。我们医大约占三四辆卡车，共计八九辆车编队进发。

我们到达了齐齐哈尔市，大家住在大兵营房里。次日，陈云、李富春等陪同当地军区负责人来看望我们。陈云、李富春见到我，很高兴地说：“陈应谦同志，你也来了！很好！”次日参加了陈云同志的一次干部会。陈云同志分析了全国和东北的革命形势；指出我们的有利条件，我们东北地形正像坐在太师椅中，周边平安，背后靠苏联地界。但他又意味深长地说：“我们必须丢掉幻想，准备吃苦，准备打仗。要脱下皮鞋，深入农村，建立巩固的农村根据地。否则，我们会死无葬身之地……。”他明确地指出当时东北形势是“敌强我弱”，要求同志们作长期斗争的准备，打消轻敌观念及和平幻想。这些话，对我们这些刚到东北的同志，教育意义很大。我们于1946年7月上旬到达祖国北垂煤城

兴山市（现名鹤岗），结束了行程数千里，横跨八省的征途。

1946 - 1948 年：向前挺进

1946 年 7 月继续北上，延安中国医大迁至东北合江省兴山市。同时接管了伪满陆军军医大学、东北大学医学院、哈尔滨军医学校等。

1946 年 8 月 15 日在兴山举行开学典礼。当时校长兼政委是王斌，副校长李亭植，政治部主任是阙森华，副主任李玉堂，我是教育长兼附属医院院长，副教育长是季钟朴。

那时，正值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日本帝国主义被打倒，抗战胜利。中国人民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正准备完成新民主主义的改革，实现民族统一与独立。然而，恰在这时，帝国主义及其各国走卒却代替了德、日帝国主义及其走卒的地位，组成反动阵营，反对苏联，反对各国人民和中国人民的解放运动。以蒋介石为首的中国反动派充当了美帝走卒，不顾人民利益，撕毁“双十协定”，发动全面内战，向人民解放区进攻。在几个战场上我军主动撤退。东北解放不过一年，土地改革尚未普遍和深入，敌伪残余尚未肃清，北满地区的地主武装，胡子谢文乐、李华堂尚未消灭。医大驻地兴山的四周几里路以外，时有土匪行踪；百里以内有大股土匪盘踞，竟敢与我独立团战斗，并扬言要攻占兴山……。副

校长李亭植冒着严寒赶到佳木斯请示贺诚后勤部长，要求几十条步枪，武装自己，保卫学校，危渡一冬。

由于日本军国主义统治东北 14 年，奴化、毒化东北青年，缺乏民族民主教育，因此，当时对国际问题、国民党问题、共产党问题、日本帝国主义问题、伪满问题等等，在新参加医大的一些人员中认识不清。所以，有盲目正统观念、反苏反共情绪，对战局悲观，以及入学动机不纯等问题。有的人说：共产党只会打仗，不会领导科学文化。有的学生准备回家，要求退学。有的人准备更衣，等待国民党到来。附属医院中，医疗条件很差，对伤兵缺乏教育和组织，致使伤兵三五成群；打人骂人，嫖赌卖东西，乱打乱抢。生活设施也极差。这就是当时学校和医院的情况。

全校经过政治学习，医院施行新疗法，加上当时的客观形势好转，国民党在各个战场上处于防御地位，北满地区的胡子也被肃清。1947 年春，东北民主联军（当时的名称）三下江南，在东西满及热河地区相继收复失地。1947 年夏季，攻势节节胜利。解放区的人民经过土改，在政治上、经济上都翻了身。这些都直接影响到全校人员，坚定了“为人民服务”的思想。

但正在这时，东北辽西地区因多年来流行鼠疫，加之连年战争，到 1947 年秋，鼠疫猖獗，影响到战争和土改。医大抽调二百余名师生奔赴疫区。经过两个月的努力，不但扑灭了鼠疫，救治了辽西人民的生命；同

时，配合战争和土改，对学员加强教育，学员增添了实际知识和才能。此时我军腹背受敌，即受军事和瘟神的双重压力，情况十分紧张和严峻。

这里提一下：日本侵略者消灭鼠疫的办法，是用机枪将发生鼠疫的村镇包围起来，不许人畜出入，然后喷洒汽油，用火焚烧。人畜、房屋一同化为灰烬。今天白城子一带老疫区还可以看到被烧毁的遗迹。由此可知日本帝国主义对疫区简单地用“烧”的办法来消灭，对人民是惨无人道的。而我们，是用先进的科学方法，对病人用药物治疗，使病人与健康人绝对隔离，同时展开灭鼠灭蚤运动，消灭传染源，所以得到人民的拥护。

那时，东北十分寒冷，令人惊恐！有人告诉我们：小便时，要带上一根木棍，以便边尿边打尿棒，因为尿流出时已冻成冰棒了！耳朵、鼻子一摸就掉下来了！实际情况，当然并非如此可怕吓人，但寒冷程度也是惊人的。我某次从兴山学校到佳木斯，要渡江到对岸，正是严寒季节，我雇了马车跨过冰冻的江道，约费半小时，当我要下马车时，双腿已不能移动，下不了车了。我意识到腿已被冻僵，失去知觉了。我马上用双手狠狠拍打双腿，并按摩双腿，这才能慢慢走下车。还听说，有人在行军分散打游击时，三三两两到老乡家里取暖，有的同志立即失去知觉倒下死亡了。老乡将其尸体安放到他们的寿棺里，不料此人又复活过来了。在其塔木战役中，正值严寒，战士们隐蔽在战壕里，不能动颤出声，

时间一长，尽管战士穿着东北特产的乌拉草鞋，仍有人的脚趾被冻落，有的人整只脚坏死脱落。

我们幸好住在煤都兴山市，暖气供应充足；室内高达20度，而户外则是零下40度，相差很大。外出时，虽穿戴皮大衣皮帽子，仍感到严寒，头脑收缩疼痛，像戴上紧箍帽。有时一边是微弱的太阳光，一边茫茫下起大雪。雪不是鹅毛状，而是针头状的小雪珠。记得1948年中秋节那天，当地西瓜刚上市，我们边吃西瓜，天空中边下大雪，真是“抱着火炉吃西瓜”。以上是我们东北三年生活的概况。

解放战争为什么能在三年时间里，战胜了蒋介石的大量军队，赢得大片土地，很快胜利呢？除了毛主席党中央英明指挥和各军种、部队奋勇作战外，各条战线上的密切配合起了重要作用。就卫生战线来说，医大做了两件事：一是全力救治伤病员，二是短期内培养了大批合格医生。解放战争中有句口号：“一切为了战争”，还要对伤病员负责，又提出了“一切为了伤病员”的口号。现分述如下：

第一，其塔木战役——

其塔木地处东北吉林市和长春市之间，是战略要塞。我军在1947年冬季其塔木战役后，消灭了敌军主力，很快占领吉林市区及长春周围的据点，将长春市紧紧包围成一个孤城，把郑洞国军围困其中达数月之久。同时，我军占领四平，已切断长春孤军的退路。到

1948年底攻占锦州，发动了辽沈战役。1948年11月，东北全区解放，大军南下，势如破竹。经过天津战役、淮海战役，摧枯拉朽，国民党军队土崩瓦解，全国解放。1949年10月毛主席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中国人民站起来了。

其塔木战役是在1947年冬天展开的，正是天寒地冻的季节，在摄氏零下数十度的气温下发动的。我们从贺诚后勤部长那里接受命令，准备接收大批重伤员。在“一切为了伤病员”的口号下，我们积极组织输血队、担架队，在治疗上精心准备。那时我是医大附属医院的院长，附属医院下设三个所，每个所可收容三四百人，共计千余名重伤病员的病房，任务是十分艰巨和光荣的。那次战役，除轻伤病员留在前方治疗外，其余的重伤病员全由我们医院负担。

那年冬，气温常在零下40度。每当伤病员火车到来前，必先由学生队组织的担架队及医护人员到站迎接。凡伤病员火车到达时，学生队员热烈鼓掌，一片欢歌笑语，先给伤员精神上很大的安慰。医院离前线其塔木很远，火车也要几天到达。随车有医护人员照料伤员，沿途到站都在深夜（避免敌机轰炸），所以大家都已十分劳累。接到医院后，我们忙着为伤病员洗脸、喂水、开饭、接屎、接尿，同志们忙成一团。伤员们分不清谁是干部谁是大学生，谁是护士谁是院长、政委，总觉得像见到家里的父母、兄弟、姐妹一样亲热。医生们

早已做好治疗的一切准备工作，争取时间，抢救伤员。按照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治疗经验，我们作出新的治疗计划，组织了500余人的输血队，给血2万多毫升，挽救了不少重伤员。15个手术台同时工作，日夜抢救。从王校长起，凡是外科大夫都投入手术战役中；学生按不同年级，分别参加各项工作，在实践中受到一次“救死扶伤，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的教育。连日本投降时收留下来的日本医生、护士，对中国共产党为人民服务的精神，也不胜敬佩。

经过这样全力以赴的救治，在40至60天内，有一半伤病员恢复了健康，重上前线杀敌，加强了战斗力。

政工人员也深入病房，将伤病员组织起来，过组织生活，彼此认识，互相扶助，互相制约，不致发生违犯纪律的事件；召开积极分子会议，听取对医护工作、生活上的意见。有时开展文艺娱乐会，了解休养员中的思想；有时组织大会，表扬休养员的模范事迹；有时讲解新技术疗法和医院概况，使伤员安心休养，早日恢复，再上前线。在这里，休养员在得到肉体上的治疗的同时，也在思想精神上获得丰收。这是共产党的政治思想工作见效的表现。人的行动由思想意识支配，所以，加强思想教育，引向正确方向，收效甚著。不论在军队中或在工作生活中，都有以思想领先的政治思想工作，并设立组织机构，编制放在领导地位，这一点十分重要。

第二，专科重点教育和形象教学法：

中国医大在贺诚部长和王斌校长领导下，为了适应战争急需，在短期内培养大量专科大夫，成为医学教育改革的试点。我们用3个月的政治学习首先提高学员的思想，再用4个月上基础课，4个月上临床专科，共计约12个月的时间，培养了大批适应战争、为前后方急需的内外科医生。这一年既无寒暑假，又无星期天，相当于二年的专科时间，再加上学生的主观努力和客观临床条件，配合形象教学法，所以收效甚大。到学员毕业时，我们把原旧制四年毕业生和新培养的专科生进行会考对比，用实际操作和书面解答的方式，在校外医务专家的主考下得到评定。我们认为，此制度适合当时战争急需，成绩显著。

当时旧中国正式的西医大夫，全国仅有2万多名，而中国医大在两年多时间里培养了1731名，到解放后的1950年，在此基础上每年招生800名，改为四年制，与一般医学院校每年只招四五十名，完全不同。

以上的培养教学方法也只是服从于“一切为了解放战争”和“一切为了伤病员”的需要而制定的，从而加速了解放战争胜利。

专科重点教育，从1947年9月开始，到1948年10月结束，在兴山中国医大召开东北军区全军卫生教育会议，由贺诚部长主持总结发言。那时贺诚是全军后勤部长，已了解到东北战争形势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他与王斌校长组织医教干部数批向新解放区进军，派任国

祥去延吉龙井成立第一分校，派李亭植去长春（待解放）成立第二分校，派季钟朴到哈尔滨成立分校。他要我到安东（今丹东）接任第三分校。我们于中秋节后出发，经过刚解放的吉林市区，再南下经桦甸、梅河口、通化、恒仁、宽甸等地到达安东，成立了第三分校。不久，沈阳解放了。1949年2月，王斌校长接管沈阳医学院（原满洲医科大学），我也从安东带上第三分校合并过来，返回总校工作。

建国初期（1949~1952）

沈阳解放时，王斌校长于1948年11月冒着硝烟烽火，首先带队进入沈阳市区，接管原满洲医科大学（国民党接管后改为沈阳医学院）。有少数医生、教授躲到地下室不敢出来。王校长召集这些人说明政策，特别是我党对知识分子政策。其中原附属医院副院长、放射科副教授仍任命为副院长。其他有顾虑的医务人员都安心下来工作了。这是一所在中国医科学学校中较大、设备较全的学校。由于沈阳地下党的工作和护校队的斗争，除少数师生出走外，绝大多数师生留校，保护了物质器材，完好无损。

1949年春，我受东北军区后勤卫生部部长贺诚指派，和白希清同志接管英国教会创办的历史悠久的辽宁医科大学，即原盛京医学院，我们和英国教会签订合同，租借八年为期（实际上一借不还至今）。这样，把

两所学校合而为一，仍名中国医科大学，已在东北卫生部任部长的王斌仍兼校长。我和阙森华为副校长，并请郭沫若同志题写了校匾。

其后，我们扩大招生数，有医学系、卫生学系、儿科学系、护理、检验、放射等，每年招收学生多达千名。急需提高教学质量，关键在于提高师资水平。而当时，日本教授都将返国。这时，盛京医科大学毕业的爱国教授：李佩琳、吴执中、项全仲、陈雅芬等来到医大，临时避难到北平的教授、医生们也先后返校、授课。我们又聘请了湖南湘雅医学院毕业的潘绍周教授，他曾和我在南京中央医院同过事。他从美国来信，要求回来参加祖国建设。我们寄去回国的路费。他们夫妇俩一是心内科专家，一是儿科专家。还有宋庆龄同志介绍的从美国经苏联绕道到东北的骨科专家杨克勤教授。我们又到上海聘请了外科教授蓝彝、内科教授郭霭然、产妇科教授宋英士，他们都是吸收了英美先进医学科学知识、学术水平较高的教授专家。由于我们千方百计地从各方面争取到大量高级知识分子，较快地提高了教学质量，因此有条件成立各专科学院和大量招生。其后毕业的学生，较能适应建国时期的需要。

全国解放后，由于旧中国医学教育十分保守，每年每校只招生数十名，到毕业时只有半数而已。中央卫生部要求彻底改变这种状况，指令全国各医学院校来沈阳参观中国医大教育实况，共商如何解放思想，改变教育

计划，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和培养目标。所以，我们经常接待来自全国各医学院校的参观团，十分繁忙和光荣。

1950年6月25日爆发了朝鲜战争，我军参加了抗美援朝战争。当时美国进行细菌战，从朝鲜前方到东北后方都有散布细菌的生物毒品。我们沈阳在抗美援朝中地处前沿，十分重要。东北卫生部成立反细菌战的专家组，要我兼任组长，以中国医大为基地，组织团结全国专家们一道工作，收集美国细菌战的情报，研究投掷下来的大批蚊蝇昆虫等实物证据。专家组分为昆虫组、细菌组、病毒组、病理组、临床组、预防组和情报资料组等。我们的研究材料最后由白希清以中华医学会会长的名誉汇总成“科学报告备忘录黑皮书”向联合国控诉美帝罪行。

1951年的二三月，东北气温仍然寒冷，河流仍未解冻。但各地群众和一些卫生单位纷纷送来各种各样的昆虫，有大批苍蝇、蚊子、红虫等。经过全国著名专家如谢少文、黄桢祥、米其文、梁伯强、李佩琳、辛钧、吴执中、景冠华等数十名教授专家（还有中国科学院昆虫学专家陈××一起）进行研究实验，鉴定证明：这些与季节迥异生长的各种昆虫，有的品种中国还没有，有些带有多种细菌和病毒。在培养中发现了各种致病菌如鼠疫杆菌等。有时在抚顺市附近的夜空出现红色球状物，坠落爆裂后就有各种蚊蝇、昆虫等物，不久该地某学校教师就发生炭疽杆菌的肺炎和败血症等致病致死病

例。据朝鲜前方卫生人员报告：发现各种各样的老鼠、青蛙、鱼、虾、蟹等死物，几乎是应有尽有。美帝疯狂投掷带有致病致命毒物和细菌的昆虫动物，把朝鲜变为美帝细菌战的实验场。但敌人始终未能得逞，我们专家们的科学证实把美帝国主义的无耻暴行公布于全世界。

到 1952 年第二届全国卫生会议时，卫生部发给我们中国医大和反细菌战专家组一面锦旗，锦旗由毛主席题词：“动员起来，讲究卫生，减少疾病，提高健康水平，粉碎敌人的细菌战争。”我作为专家组同志的代表，在大会上光荣地接受了这面胜利锦旗，这面锦旗留在了医大，作为珍贵的纪念品。

后来，将原有的“粉碎敌人的细菌战争”的字句除去，只留下“动员起来，讲究卫生，减少疾病，提高健康水平”，作为卫生部门群众卫生运动的旗帜。接着又成立了全国“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当时由周总理担任主任，全国各省市自治区领导同志参加，每年发动“爱国卫生运动”，全国人民的健康水平确实提高了。现在我国的平均人寿，由解放前的 35 岁提高到 70 岁了。这就是全国卫生运动的由来和毛主席为反细菌战争题词的光辉史绩。

第四部分：我与领袖人物

我与王明

王明，原名陈绍禹，安徽人，毕业于莫斯科东方大学，善长口才。当时是共产国际执行主席团成员，负责领导亚洲地区的共产主义运动。在抗日战争初期，犯了右倾路线的错误，受到批判。

1943年三四月间，我正在延安医大宿舍窑洞门口晒太阳看书，王斌校长嘱通讯员送交一份很厚的病历资料，要我检查一下，看看有什么问题。我接阅病人名叫王明，是人所熟知的我党领导成员。这份病历已有一二年的时间积累的页数，包括体温、脉搏、用药吩咐表，以及病情记录和化验单等较为详细的正规病历。其中令人注意的问题，是用药方面，从去年即1942年9月间起，至今已有半年多的时间。每天三次，以少量氯化低汞（甘汞）和重碳酸钠（苏打）长期作为缓下剂服用。这些低汞和苏打在胃肠内可转化为有毒的高汞。量虽少，如果长期服用吸收后，会发生慢性汞中毒，引起口腔炎和损害肝肾。这是禁忌处方啊！为此，我转告王斌校长。不久，我参加在杨家岭后山坡一排窑洞处，即王明住宿地，为王明病情会诊，到会者有付连璋、王斌、鲁之俊、马海德和主治医生、王明家眷等十多人，挤满了一个窑洞。我坐在窑洞门口，据理发表意见，得到与会

的震惊。待检查病人时，病人果然呈全身衰弱状，血压增高、口腔炎等症。病人诉：两侧腰痛，小便稀且减少（化验单报告蛋白和红细胞等阳性）、精神不振、掉牙齿……等。并说：所开处方，每次开一两个月的药量，大量积压，久置发生变色，主治医生仍坚持要病人服下……。

经过大家讨论，认为长期服用此药，在胃肠分解吸收，可以引起慢性汞中毒，影响肝肾机能，是完全可能的。这就是所谓王明的“处方事件”。王明成为长期的病号。

就在是年7月份，在杨家岭礼堂上面会议室里召开为期两周的医疗会议。参加者即上次会诊人员，证实主治医生的处方错误。

我为了科学证实，在英文版实验室检查一书中，找出能检出尿中排泄微量汞的方法：即将病人24小时全尿加入一定量的盐酸，用文火薰到一定量，重金属汞仍在浓缩尿中，再放入薄金片将汞吸附着，置金片于显微镜下观察呈粉红色状为阳性现象。这样我在王明那里呆了一个多月。检尿多数为阴性。当偶尔而呈阳性时，亦即病人自感全身极度不适时，王明自称为排汞了，往往和所检阳性汞一致。其后我回学校，王明有时派通讯员送全尿来检验。

检尿期间，我住在王明的书房窑洞里，内藏大量俄文本马列主义书刊。他有两位秘书，分管政治和生活方

面，有二三位勤务员、通讯员；一排数个窑洞，比其他中央领导同志更多些。他有个儿子叫小明，约六七岁，常和我玩耍。我就在窑洞门口用木炭煮熬他的尿液。有时到他卧室检查身体，了解病情。王明夫妇对我很客气、尊重，生活上很照顾。其妻叫孟庆树，口齿伶俐。告知她原在上海一些纺纱工厂里做地下工作，发动女工反抗资本家剥削和组织罢工等活动。王明有时也说说《红楼梦》故事。

我与徐向前

徐向前是山西省五台县人，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北伐战争时参加中国共产党。抗日时期任八路军 129 师副师长，八路军第一纵队司令，一直在前线抗击敌人，生活艰苦，导致长期患病发烧。从前线回延安求治，未能确诊，到 1944 年转辗来我们医大附院，住在一个窑洞里，由我主治他的病。经过反复检查，我认为他右侧胸膜炎，积水较著，可能由原肺结核引发的合并症。再请黄树则、史书翰、任国祥等大夫确诊后，加以治疗。记得中央同志来探望他时，见到徐向前的被褥十分破旧，发给他一套新被褥，他不要。我检查他病时，看到他随身除破被旧衣外，别无他物，与一般战士勤务员相同。真是官兵一致的典范，太艰苦了！我为此十分同情和敬佩共产党员为人民服务的精神。旁边有一个勤务员照顾他正在发高烧的司令员。此情此景难以相信，深深

教育了我，至今回忆犹新呢！

我经常看望徐司令，精心医治。我们的感情很好。不久，他恢复健康，重上前线去奋战了。

在解放战争的太原战役中，他仍抱病指挥呢！

全国解放后，徐向前于1950年访问苏联回国到长春旅途中，得了重感冒，高烧不退。他来电指名要我再去看他治病。我到时，已有苏联专家主治他的病了。不久病愈。我们便参观了原日本在满洲国的地下金库和电影制片厂。尤以金库的地下道，门洞深奥，十分坚固秘密。

我与刘少奇

1944年春，刘少奇已从新四军回延安，正在筹划“七大”会议的文件报告等组织工作，十分繁忙，精神紧张，经常失眠，身心虚弱。他要我到他家作全面健康检查。当时我住在杨家岭礼堂后面的小楼里，下楼过一座旱桥即可到达他窑洞住家。经过几天的各方面检查观察，包括理学和化验的结果，并无异常病变。我认为是由于劳累过度所引起的，宜多安静休息。他放心了，表示谢意。

我在延安时期，有时参加一些会诊和专科检查，如：彭德怀长期腹泻，诊断他为阿米巴痢；为邓颖超患沙眼病手术治疗；为叶剑英测检老花眼时，他请我吃饭，有一盘生拌鲜嫩黄瓜，便是难得的时菜了，记忆深

刻。我还曾参加王观澜、续范亭、周士第、贺龙、朱德、陈毅、蔡畅等人的会诊。

我与陈云

陈云是上海浦东人，出身贫寒，小学毕业就当学徒。我们医疗小组（即王斌、鲁之俊、马海德和我）是在枣园为王稼祥检查病情时，同时为陈云作健康检查而认识熟悉陈云的。他听我的口音知道是上海一带的南方人。异地同乡相遇，分外亲切，他要我到家去玩玩，因此我有时去看望他。他告我说：他那时是上海商务印书馆门市部文具柜的小夥计，以掌管小学生用的石笔、石板、铅笔、抄本等买卖作幌子，实际是共产党地下党员，做通讯联络、组织发动商务印书馆职工罢工等活动。后来，党组织送他到苏联上学去了。那天他买好苏联船票，将上船前十分紧张，登上苏联船只后，才放心来。

有一次，他很热情地留我在他家吃便饭，说：“我为你专做一个家乡菜叫调碎蛋（即鸡蛋羹），你一定爱吃的。”我们俩人边吃边聊天，十分亲切友好。时隔不久，他要我到延新市场财经办公室去看他，为他检查视力。原来他40多岁已有老花眼了。我便要他配镜矫正。看到他住在一间十分简陋的办公室内，正在为筹划中央和边区人民生活问题而操劳。

1946年7月，我们医大从延安到东北的北满齐齐哈尔

哈尔滨市。陈云看到我很高兴地说：“陈应谦同志你来了！很好！”他那时是东北局副书记兼北满军区政委。正是敌强我弱困难时期。他提出总方针是：“发动群众，改变敌我力量对比……有了群众一切好办，可以有军队，清除土匪，经费供给也有来源；没有群众，一定失败，死无葬身之地……”等名言。此报告经中央批准同意。那次陈云讲话，我们医大师生都参加了。其后东北局党组按照他的方针，一步一步地好转，最后东北全区很快解放了。

我和毛泽东

我有幸曾三次和毛主席接触交谈。第一次于1943年秋季，我住在枣园为王稼祥会诊期间；同时为毛主席、江青检查身体，我们就在他们住家窑洞里用手提X光机，做胸部透视。因为江青有肺结核病，人很消瘦，有时给她注射钙剂类药物。毛主席和江青非常喜爱他们的小女儿李讷，那时约有二三岁，胖胖的。

有次我们晚饭后散步，遇见毛主席约我们到他家玩麻将牌。有毛主席、鲁之俊、马海德和我共四人。王斌在旁观看。我坐在毛主席上家，设法多打牌给毛主席吃和，打了一二圈，毛主席成为赢家，他很高兴。这套麻将牌桌是早已放好了的，可能是近日毛主席作消遣之用的。

第二次在1945年10月，即毛主席从重庆和平谈判

回到延安第二天。他派了汽车到柳树店医大，接王斌校长和我到他家检查身体健康状况。在检查中，毛主席提问说：“我在重庆时听说有位大军官，在某天早晨问他警卫员，为什么今天天亮得那么迟啊？警卫员告诉他，天亮已经很久了，太阳已上山高照了！此时军官才知道他的两眼已失明了。”毛主席追问我：“这是怎么回事啊？”我问：“那军官前晚到过别人那里吃饭没有？”主席说：“对！对！听说他那晚去别人家做客了！”我又问：“他喝了酒没有？”主席又说：“宴请客人哪有不喝酒呢？一定喝了！”我答道：“那很可能吃了一种‘酒’。酒有两种，平时我们喝的酒是‘乙醇’，无毒性，而另一种叫‘甲醇’，工业用的，人吃了侵犯视神经；重者可引起失明的危险，这很可能有人陷害他。”毛主席听了点点头，似表同意，并若有所思地慢慢说道：“我在重庆时，有次蒋介石披上斗篷和宋美龄夫妇两人一起亲来住处，要我参加他们的宴会。我不好推辞他们的热忱，就去了。还有几次民主人士来请我去参加他们的宴会，我也都去了。这样我在重庆时参加了好几次宴会，吃了一些酒。现在看来我的视力还好，没有什么变化么？”

我和王斌两人对他详细检查后，告知毛主席，你身体一切正常，未发现变化。自感也良好，可以放心。他点头表示满意。当时党内同志和群众对毛主席去重庆谈判很不放心，担心被扣留或陷害。毛主席能健康地回到

延安，大家才放心了。毛主席又对我们说：“谈判归谈判，蒋介石此人不可信，要立足于‘打’字上，你们要准备到前线参加救死扶伤工作。”接着毛主席要我们吃午餐。他热情地要我品尝品尝他的甜南瓜菜，似乎表示考问合格，给予一种奖励和鼓舞。

就在这次离开毛主席家不久，当年11月，王斌校长率领中国医大部系师生，从延安奔赴到东北前线，参加解放战争。五年后的1950年3月1日毛主席从莫斯科回国途中，经过沈阳时来中国医大视察，久别重逢，毛主席握着我的手十分亲热，有说不完的言语。这是第三次，详见《陪同毛主席视察中国医大》一节。

我与张闻天

张闻天，江苏无锡人，曾留学美国和苏联。颇有才学和见识；品德高尚谦和。我们医大初到东北兴山市（现改名鹤岗市）时，他是合江省委书记。住在佳木斯办公。约于1947年春，佳木斯卫生局局长刘夕青（原中国医大研究班毕业生、长征干部）要我到佳木斯了解情况。佳木斯市公安局局长史××突然死亡，其妻诉述：史局长患重感冒发烧不退，请当地开业名医×××来家诊治，先服药无效。该医生说：此病较重，需要打针，但你家眷不要在场，回避一下。其妻信以为是。次日该医生独自在病人身上打了针。医生打完针后，匆忙离去，边走边说：“此病严重，不好治了。”其妻回到病

人身旁，一看病人奄奄一息，呼吸逼促，呈窒息状，随即昏迷不醒死去。其妻认为史局长之死，显然与医生打针后病情急剧恶化有关，提请检查死因，追究医疗事故。

1947年，当时我们在东北遭国民党围攻，哈尔滨有撤退的危险，以佳木斯一带为大后方。大后方的治安情况和统战工作都十分重要。当地名医，颇有声望，故请他来为史局长治病了。

我与刘夕清和家眷商讨，为了慎重起见，确定致死根据，最科学的办法，做尸体解剖。大家同意后，立即将尸体运到对岸兴山医大。由我主刀，开到胸肺部，发现油珠状血水，再用海绵块吸取该部血水挤到盘中，可见上面飘浮着大量油水。由此证实该医生打的针药里注入大量油液，循环到肺部阻塞肺叶呼吸道，迅速窒息死亡，与临床所见完全一致。因此尸解诊断：“因注入大量油液引起呼吸窒息致死。”由我签字正式报告送去。

他们得此报告后，公安部门将此医生逮捕入狱。但他拒不供认，而大量饮水禁尿，终因膀胱蓄尿过多，发生破裂引起尿性腹膜炎自杀身亡。经此事故教训，党政人员到我们医大来求治者更多了。

不久，张闻天书记和刘英同志夫妇两人来到医大诊治疾病。同时介绍进步电影女明星陈波儿也来治病（肾脏炎）。

到1954年，我们科学代表团到波兰参加会议，途

经莫斯科。张闻天夫妇在中国驻苏大使馆官邸会见我们，招待座谈，颇有礼节，并嘱其萧秘书代购莫斯科大剧院的天鹅舞戏票。这是第二次见到张闻天夫妇，异地重逢，分外高兴。

在文化大革命中，我偶尔到北京八宝山公墓，见到陈波儿墓碑被红卫兵打掉一部分的惨景，为此回忆凭吊一番。

我与林彪、叶群

林彪在东北解放战争期间，任第四野战军司令兼政委。1947年秋初，东北军区总后勤部部长兼卫生部长贺诚，要我带上行李和参考书专为林彪治病。我从兴山到达哈尔滨见到李富春，介绍到叶群处，亦即林彪在哈尔滨的住家那里。记得叶群那次穿上蓝色薄呢外套（东北哈尔滨入秋即天凉），和我一起到市街为林彪操购一些食品和药物。当晚6—7时到火车站等候一辆柴油轻型专用火车。他带警卫人员要我乘此专车，约一二小时后到达哈尔滨南的重镇双城县，即林彪前线司令部所在地。已有吉普车等候。我和叶群坐在后排。不久有一军人，据云是炮兵司令周瑞，也上车坐在前面。我们到达林彪住宅已深夜了。我临时住在他机要室里。有两名机要人员值班，机器终夜不停地发出哒哒声，接收前线各部队的报告请示。我模糊地睡到天明，次日换到旁边一间厢房里住。我就在那里专为林彪诊治宿疾。据他告

知：在苏联时期因病医生给他长期服用“阿托品”，以致留下长期顽固性失眠症，十分痛苦；虽经多方医治和用各种办法如理疗、服安眠药等，又在哈尔滨请过当地俄籍女医生诊治都无效。特别近来在前线日夜指挥战争，十分劳累，更加重了失眠症。要我研究其原因和根治办法。我带上一些参考书和 Sollman 药理学名著，有关阿托品的药理学、实验资料十分详尽。我细心钻研和参考内科学、病理学、生理学等诸方面，并详细询问林彪服药过程。据云是受伤后以阿托品作为止痛剂而长期服用。这样反而引起迷走神经兴奋，发生失眠症，还发现他的脉搏缓慢、无汗、便秘等症状。我经过一个月的细心观察研究，写出一本全面资料和办法的建议书。最主要的意见是要用吗啡类药物拮抗之或能根治失眠症。可先试用小剂量观察有无作用，再定具体办法，这是作为参考性的意见。同时作口头解释，详述阿托品的药理作用。林彪听后看了我的意见书，认为有理也未表态。又说要我长期留下来工作。我听后毫无思想准备，所以也未表态，只说：“考虑，考虑。”那时我是中国医大教育长兼附属医院院长，工作十分繁重。到此已月余，专为研究个人病症，放弃了为广大伤病员服务和教育工作。如长期留下，与我参加革命的目的不相符合，而且也与我个性好做基层事业不相容。可能林彪不了解我的思想本质，所以，几天后，林彪当我们三个人进餐时又提问：“你对留下工作有何想法？”我不答是否。此时叶

群在旁看出我不愿留下的思想，随即插口代答：“陈大夫有很多工作要做，要回去商量好再定，你不必急于强求别人马上留下来！”以解我的困境。我则以笑表示同意此见解。林彪因此不再强求了。

再谈点这两人生活情况：

叶群，我初见面的印象是一个 30 多岁较矮小的妇女（福建人），性情朴实，中学文化程度，带上两个幼孩。一男（即林立果），约四五岁，一女，约二三岁，随林彪一起生活。某次他们三人在院里晒太阳，堆放一堆锯木屑和几块砖头给两个孩子作玩具之用。我问叶群，你为什么不在哈尔滨市场上像秋林等百货公司买些玩具给小孩玩呢？她答道：他（指林彪）不允许花钱买，所以用此办法。她正在结毛衣给孩子们穿，我又问：你为什么不在市场上买些现成的小毛衫呢？叶又答：他不同意这样做，要求自己做才行。

第五部分 难忘时刻

延安庆祝抗战胜利狂欢夜

1945年8月14日（农历七月初八星期二）傍晚，我们和往日一样平静地在教员宿舍石窑洞广场上，有王斌校长参加，由我主持座谈讨论如何进一步办好教员和家眷吃的小灶伙食问题。该广场大地上，我和李亭植教

员两人共同种植数十窝南瓜坑。由于新建的石窑生地上需要大量肥料，我们两人天没亮就到厕所偷粪作为底肥（当时禁止取公厕肥料），所以南瓜生长旺盛。那时正值开花结果时期，成为我们边开会边欣赏的南瓜花园场地。大家赞慕，预祝我们有个好收成，超额完成交公粮的任务（每人秋后完成瓜菜代粮计划）。

会议即将结束时，突然从学生队土窑山坡上爆发一阵吹呼声“日本无条件投降了！我们胜利了！”反复呼喊，响彻天空，随即四面八方数百学生，从各个窑洞中涌出，欢呼声不绝于耳。这是令人从梦寐中惊醒的突然爆炸性大新闻，太好了！大快人心！万众欢腾，雀跃舞蹈。我们都融入群众的欢声中，其乐无穷！

据学生队告知：那晚十点钟刚就床躺下不久，便听到学生队部韩协理员大声嚷着：“日本投降了！同志们，日本政府宣布无条件投降了！”……“什么？日本投降了？！”动作快的同学，已经一骨碌爬起来，一面向外面跑，一面追问着协理员。面对越聚越多的同学，协理员解释说，这是校部通知的消息，来源于新华社收到的电讯。这一特大喜讯，很快传遍柳树店医大的每个山头、每间宿舍、每孔窑洞，全校师生沸腾起来了。脸上淌着欢乐的泪水的人们奔走相告，互相拥抱，重复一句话：“抗战胜利了！抗战胜利了！”这时已经有人把冬天的铺草、草垫子点上火把冲下山去，有的还敲打洗脸盆，就这样，自愿地聚集起来的队伍，拉到校部广场去庆贺。

在广场上，各期同学、老师和工作人员都来了。人们自动围成圆圈，跳啊！扭啊！欢歌啊！大家尽情地高唱各种革命歌曲，有人一遍又一遍高唱国际歌。真是尽情尽意地欢唱啊！陕北秧歌舞本来就是大动作组成的，欣喜若狂的人们跳起来，动作就显得更宏伟壮观了！难怪这一夜有的女同学跳断了裤带。群众自发的庆祝持续到东方泛出鱼肚白，方兴尽而散。

那夜我们站到高坡上，远眺邻近桥儿沟鲁迅艺术学院的山坡窑洞四周，以及更远的延安市区周围的机关、学校、部队等山顶、山坡各处，处处都是同样火把齐发，照成一片火海。延河两岸，片片火光，锣鼓齐鸣，以表示庆祝狂欢，如火如荼。这样壮举的夜景，实乃本世纪震撼人心的第一把爱国胜利火炬啊！真是激动人心之夜、彻夜不眠之夜、终身难忘之夜。接着，同学们、教职工们，不断欢呼说：“大连已是我们的了！”“青岛也是我们的了！”“东北沈阳、哈尔滨都是我们的了！”“还有张家口……”。当时我们处在这穷乡僻野不毛之地黄土高原的延安陕北，早已渴望快快赶走日本鬼子，回到故乡大小城镇，和乡亲父老们团叙庆贺，所以听来颇有吸引力，获得了自我陶醉般的精神力量，更加强了我们狂欢劲头。高跳！吼喊！一个个像疯子、狂人！

从那时起，柳树店对岸大路上，奔向根据地的队伍，川流不息地急速前进着，延安再一次成为一个向全国输送干部的出发点、打“天下”的摇篮。我们医大，

有些人坐不住了，学不进去了！向往着下山，改行做革命政治工作去打天下。为了把同志的激昂情绪安定下来。8月下旬，师生们被组织到中央军委所在地王家坪去听叶剑英参谋长的报告。40多岁的叶将军，精力充沛，英姿飒爽，足登高筒马靴，边踱着边讲话，从国际形势讲到国内形势，再讲到调动部分干部下山的必要性，最后谈到我们医大同学。他说：“最近医大同学中出现一种学不下去，想下山打天下的情绪。这种情绪是积极的，但是桐油罐子装什么好呢？依我看来，还是装桐油好。你们医大学生，学医还是当医生好，这是一样的道理。下山总是要下的，但是要等到需要时，由组织调动。所以你们还要好好地学下去……给你们吃个定心丸，静下来努力学习，必要时再走。走，是了迎接新的战斗任务，走得愉快；留，也是革命需要，留得安心……”

从此，叶将军的“桐油罐子装桐油”这一个被桐油所固定的浅显易懂的比喻，多少年来，成为鼓舞鞭策我们师生树立专业思想、钻研业务、做好本职工作的诚言成语。

不久，延安新华社、解放日报，发表党中央社论：《庆祝抗战最后胜利》。我们全校师生都反复学习。我深感重要，剪下保存至今，已整整五十个年头了，她成为历史纪念珍品。当时延安十分困难，报纸用当地马兰草制成的土纸发行，为此更有纪念的价值。

今年 1995 年就是 50 周年纪念大庆节日，再温读社论内容，颇有爱国主义教育的现实意义。回顾前半个世纪以来，中国受尽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欺压。从 1894 年甲午之役，清政府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割让台湾、赔款二百兆两银子。敌酋田中奏称：“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东亚，欲征服东亚，必先征服中国。”这一狂妄侵略计划，从 1931 年的“九一八”事变，侵占我东北四省起，到 1937 年“七七”以后的大规模侵华战争，蹂躏我国土，屠杀我同胞，铁蹄所至，庐舍为墟。我中华民族所受的奇耻大辱、血海深仇，罄竹难书。这八年抗战，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抗战，坚持团结，坚持进步。中国共产党发动群众，进行人民战争，抗击了半数以上敌军及 95% 的伪军，收复广大国土。八年抗战胜利，我国军民伤亡 3500 多万人，实来之不易啊！这八年抗战史，正是最好、最生动的爱国主义的教育史，教育了全国人民勿忘血仇史，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今年是抗日胜利的 50 周年，也是解放全国、人民站起来了的 46 周年。我个人经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新中国三个历史时期，感到万分庆幸，成为站起来了的中国人民了！不愧为炎黄子孙啊！

作者注：

(一) 延安老城抗日初期，被日本炸为废墟，城内无人烟。人员都疏散到附近的郊区和山沟山坡，建立各种窑洞或平房，如枣园、王家坪、杨家岭、新市场、大

砭沟、桥儿沟、柳树店等；远郊有甘谷驿、拐岭、三十里铺等。

(二) 中国医大校址：在延安东门外数公里郊区的柳树店。医大设有附属医院接治军民，隔延河斜对岸，有设在桥儿沟的鲁迅艺术学院，两校师生常来往，亲如姊妹。

(三) 延安窑洞有几种：多半属于靠土山坡挖建而成的土窑；石砌窑洞功本大，多在平地上建成；另一种是土窑外套建一部分石窑的混合窑洞。窑洞的特点冬暖夏凉、安静、防震、耐久。

(四) 小灶：为优待教师而设的，教师的家眷可参加共餐。有馍、小米粥、常有荤菜。

大灶：为一般人员和学员而设的，有小米饭、土豆萝卜白菜等，有时杀猪改善生活叫会餐。总之不论大灶、小灶，都较清苦平淡。但作为营养标准自然满足，所以延安男女一个个长的红胖健壮，少病。

(五) 老师都叫教员，如炊事员、勤务员、指导员、协理员、司令员、战斗员、学员，以示一律平等。

陪同毛主席视察中国医大

1948年冬，我由毛主席正式授命为中国医科大学副校长。该医大当时是由延安的中国医科大学与沈阳医学院、辽宁医学院、辽宁药学院合并组建的。1950年2月底，毛主席结束对苏联的友好访问，乘火车返国途经

沈阳视察时，住在和平宾馆。中国医大校长王斌同志立即拜见毛主席，请他来中国医大视察，毛主席愉快地答应了：“明天上午先到你们那里。”

翌日，3月1日，我们提前上班，再次进行严密的保安检查，大楼内外只留少数人员，一片肃静迎盼的情景。上午10时左右，毛主席身穿黄呢中山制服，神采奕奕，魁梧英姿，在越南胡志明主席、周总理、高岗陪同下，来到了中国医大。我们先迎毛主席一行到医大基础楼会议室休息，汪东兴手持毛主席的大衣，和警卫人员在会议室门外等候。

毛主席首先进入会议室，满脸笑容地与大家一一握手见面。他与我们见面握手，分外亲热。记得五年前，即1945年10月，毛主席从重庆谈判回延安第二天，就要王斌同志和我到他家里为他进行健康检查，向我们介绍重庆谈判、政治形势以及他外出宴会等生活情况。我们给他的身体作了详细检查，并解答他提出的一些问题。我们认为他身体良好，一切正常，请他放心。随后他请我们吃饭，他热情地亲手用筷子夹了几块南瓜，向我提送，要我“品尝品尝”，并说：“这是延安自然科学学院研究出的新品种，很甜美。”我正不敢接受时，王斌同志在旁说：“主席要你尝尝，你就吃啊！”我如梦惊醒，赶快提呈饭碗站起接纳，说：“谢谢主席！很好的甜南瓜，我很爱吃！”五年后的今天，我们都成为全国解放战争的胜利者，毛主席已是我党、我国人民的伟大

领袖，此时重逢，内心何等喜悦呵！

毛主席询问我们的工作情况，我随口汇报说，那年我们见到您后，很快离开延安，到东北参加解放战争，在王斌校长领导下，收治大批伤病员，培养了大批医护人员，支援了东北战争。毛主席听了深有感触地说：“我们过去在长征时期，缺医少药，十分困难的情况下，保证指战员的健康。你们做了不少工作呢！记得过草地的情况么？”他以为我也是“老长征”。我说：“我不是长征干部，到延安参加革命的。”接着，我指给毛主席看现已成为中国医大校产、原满州医科大学建筑群的鸟瞰照片，毛主席风趣地说：“谢谢帝国主义！”我也点头笑笑。

这时，王斌校长与周总理、高岗也正在一边热情交谈。聊家常过后，我和王斌校长分别在主席左右坐下，长桌对面坐的是胡志明主席、周总理和高岗。王斌校长说：“请主席为学校的校牌题字。”我即摆开已备在桌上的文房四宝，倒水磨墨，毛主席却挥挥手说：“郭老的字，写得比我好，看到大门口已挂上他的字牌了，我不必再写了！”原来他进医大正门时，就在车上看到郭沫若书题的校牌了，我和王斌校长异口同声说：“请再写一个更好！”毛主席摇摇头，表示坚决不写了。此时坐在我对面的周总理马上用手摇摇，暗示我们勿再勉强主席。我会意地坐下，我深感毛主席的细心和谦虚。

接着，王斌校长详细汇报医大奉中央命令（他那时

兼军委卫生部副部长)从延安到东北,投入解放战争,用英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对战伤医疗的先进经验,实行救死扶伤工作的情况。在王斌校长即将结束发言时,毛主席高兴地点点头,对胡志明主席说:“越南正在与法帝国主义战争,可以派人来中国医大看看,吸取一些经验作参考,是否需要,请考虑。”胡主席马上拿出小本子记上,不久,胡主席即派越南卫生部长到我校参观访问,并赠送一批越南抗法战争中的医疗救护照片,我陪他十多天。当时,我深切感受到毛主席对越南解放事业的关怀,也领会到胡主席对毛主席的尊重。主席对王斌校长的汇报给予了充分肯定和赞赏。周总理表示同意毛主席的意见,并要高岗对中国医大多加支持,高岗频频点头,连说:“是,是。”

毛主席开始参观,我陪同毛主席先走向基础楼的教室。当进入大型阶梯教室时,我报告主席:这是现代化设备,教师讲课中,可随时用电动关闭窗帘看幻灯片,黑板也可以上下自由活动。毛主席高兴地说:“现在比延安时代不一样了,现代化设备要好好利用,发挥应有作用。”我们再到生理实验室,参观了能用微细玻管插入人体汗腺毛孔吸取汗液进行研究的一系列精密设备。毛主席频频点头。当我们转到另一个实验室时,突然出现一个青年助教,快速伸手要与毛主席握手。毛主席对此突然袭击似乎一惊,虽然也伸手与握,但不久毛主席说不看了。此情此景,正在后面谈话的王斌校长和周总

理、高岗，可能未必觉察。

毛主席结束了约 30 分钟的参观，12 时左右离开了中国医大，据说下午还要视察沈阳的工厂。当毛主席走到大门口，王斌校长正敬送主席时，我校保卫科科长孙仲毅摄下了有历史意义的照片，成为我们和中国医大珍贵的纪念。

随周总理赴十三陵水库劳动——目睹 定陵地下宫殿原型

1958 年正值大跃进时期，兴建十三陵水库，热火冲天，干劲十足。首都人民、党政干部，纷纷参加义务劳动。5 月间，我有幸随周总理带领的中央劳动大队，参加十三陵水库劳动。中央劳动大队有中央各部委负责人：文化部沈雁冰、水电部钱正英、卫生部李德全、妇联蔡畅、邓颖超、康克清等人，共约百人。我在卫生部张凯副部长、药政局长蔓焰等同志一组劳动。劳动前，周总理召集大家开会，讲述修建十三陵水库的意义、计划及劳动注意事项。卫生部长李德全从卫生保健爱护出发，要求大家年龄大了不要劳累过度，注意身体。而蔡畅等反驳道：要尽力拼搏，在劳动中锻炼自己的思想，体验劳动改造世界、改造自己。

我们的劳动任务，主要用独轮车推运石块土方。周总理有一幅手推独轮车劳动的照片，就在那个时期拍摄

的。我则体力臂力不支，推独轮车毫无经验，左右摇晃，只能在前拉拽绳索导行，或用镐挖土装车。我们住宿在水库劳动工地附近临时修筑的简易房，自带铺盖行李，躺在稻草地铺上。一日三餐，咸菜、稀粥、馒头，饮食大增。第一天清晨7时，我们由周总理手擎大红旗导路去工地劳动，雄纠纠，气昂昂，更加激发了全场万人劳动大军的干劲，人人精神焕发，一片雄伟壮观。如此劳动七天。最后一天，休息参观刚发掘不久的明朝第十三代万历朱翊钧皇帝的定陵地下宫殿。

参观仍由周总理带领，文化部长沈雁冰引导介绍：如何在大暴雨后，发现冲露渠沟，挖掘数十米后到达墓穴口；传闻有千斤石的机关，不敢破洞深入；后来了解此宫有第二次封闭留下的裂缝，所以想到了可以同样再打开穴门了。经数月之久，定陵宫门安全开掘。据说，洞穴顶上有一圆孔，人先跳入洞内，将机关石移走，再从外面打开就安全了。我们是沿架筑的跳板，层层扶栏杆下行人宫门的。那时周围土堆石块多且乱，我们又惊又喜，小心翼翼，像进入一个奇门洞里。

经前殿入正殿时，首先看到几个约一米高的大绿花瓷缸，内留存大半缸的灯油，旁有腊烛台，大蜡烛烧剩大半截。据云闭穴前用瓷缸即“长明灯”的大龙缸的灯油燃灯，不知经过多少时日，才自动熄灭。我估计乃因燃烧中需耗的氧气渐尽后，灯才熄灭的。由此可知，空气中缺氧，对物质尸体的氧化、腐败，亦随之减弱，得

以较久的保护。正殿中央两侧道上铺设着像铁路轨一样的朽木片，原是两条半月状木板接成的，作为滑运棺椁重物之道，运毕未取走，已腐败成黑色泥土状了。两侧各有配殿，即从正殿两侧进入，像一个正窑洞分散进入两个侧窑一样，但比正殿为小，其中没有随葬物，也没有随葬者。

后殿是个大殿，正中放置着很高很大的明朱翊钧万历皇帝的棺椁，两侧分置较矮小的孝端、孝靖两皇后的棺椁，棺椁都是朱漆。四周有装随葬物的朱漆大木箱，不知其中内容物。我们进入宫穴时，只有几盏临时拉线的电灯照明，所以，光线不太明亮。我特别注意到，在后殿一角有两个穿白衣戴口罩的工作人员（可能是工匠、工程师或考古家）正俯首在灯光下，用小镊子等整理一具尸首。尽管脸面萎缩不清，但我看清两片黑胡须，上戴金皇冠，即用极细金丝编织而成的翼金冠。我十分惊奇，因有木栅栏阻挡，不能前进了。我引颈细看多时，约距2—3米，灯光昏暗，不能再看清其面部，很觉遗憾不足。细思回忆，万历皇帝10岁登基，在位48年，终年58岁，卒于1620年，已葬尸300多年而胡须尚存！定陵发掘前考虑到尸体有可能保存完好，曾与协和医院解剖室、病理室的教授们联系，请他们提供防腐技术、参与研究。但打开地下宫后，发现尸身已腐败了。葬物葬尸见风易风化，即氧化变质失真，难以保存，所以，尚存古墓缓开，以待科学发达，对葬物葬尸

文物保管有了新办法时再开掘，而盗墓小窃也无此能量打开石穴地下宫殿，尽可放心。

定陵地下宫殿，距墓顶有 27 米，离地面 7 米多，位于明楼正后部，是由五个石拱结构的殿堂组成的，即前殿、中殿、后殿及两个左右配殿，总面积 1195 平方米。各殿的入口都是整块汉白玉雕刻的玉石门。地面上铺的“金砖”又名澄浆砖，是明代宫廷特地在江南烧制的一种方砖。据记载，一窑“金砖”要用几种枝柴烧 130 多天，出窑后，要在桐油里浸泡。苏州砖窑造 5 万块，要用 3 年多时间。这种砖铺在地上光滑耐磨，并且越擦越亮。定陵修建从万历十二年（公元 1584 年）到十八年（公元 1590 年），共计用 6 年时间，每天工匠达 3 万多人，共耗白银 800 万两，相当二年的田赋收入。定陵于我们参观的第二年（1959 年），建成定陵博物馆，展出地下宫殿出土的珍贵文物，供游客参观欣赏。

36 年前，随周总理到十三陵水库劳动中参观定陵地下宫殿的情景，至今记忆犹新。周总理那普通劳动者的形象，在我心上永远栩栩如生。

进入“从心所欲不逾矩”的古稀今不稀之年，不能不自我感觉到多少有点“老”了。正在此际，接到故乡吴江市人事局的《征稿通知》，要求写写“自己的故事”，是乐于遵命的。

人生如白驹过隙，总会留下些痕迹。怎样看待自己，生前不容易有恰当评价。等到身后别人致词，尽是溢美过誉，反正听不见了。前年，一本杂志对我采访，刊出有句套话：“一生坎坷。”我不以为然。自己以为，在人生道路上，走过的脚步或许是沉重的、蹒跚的，但不如说是潇洒的。潇洒不是风度，而是生活态度。追求潇洒的脚步，是我的人生写真。

我的老家是吴江的芦墟。柳亚子有句诗：“芦墟无沈不成村”。祖父沈淦（菊卿）原是卖鱼的，后来开咸鱼店和豆饼店，又置了田地和住宅，大体上属于工商业兼地主。有此基础，与鲁迅、蔡锷同生于1881年的父亲沈龙圣

(文杰)成了读书人，光绪某年考上了“秀才”。接着进了学堂，从南京到北京大学，学的法律。后来知道，他是南社的早期社友之一，编号在第16；在逊清做过“七品小京官”，参加过辛亥革命；当过大学教师，留法勤工俭学的革命前辈不少从他学法语；后去上海，在邵力子等办的《太平洋报》、《民国日报》当过编辑；参加过北伐，在叶楚伦任江苏建设厅长时，他是主任秘书。北伐失败，他赋过闲。后来才当法官，从吴县地方法院到浙江高等法院，再到最高法院。母亲芦翠琼是江西人，出自书香门第，在峡江当小学校长；那时，父亲在峡江任县长（知事），就认识并成了一家。

我在1927年生于上海。大革命转入低潮，父亲曾犹豫过，躲到老家芦墟。我首次到芦墟，也就在那一、二年；似乎记得，晚间睡的帐子是蓝花布。稍懂事时已在苏州，四岁进了纯一小学；五岁随父母到杭州，先后进了树人小学和弘道女中附小。再去南京不久，抗战爆发。在去内地途中，一家老小又转辗经吴江返苏州，我先后进了崇范中学和教育学院附中。

这是一个大转变的过渡时代，我们都经历了一个从传统的人格转变为现代人格的过渡进程。从小学到中学，我接受的是传统教育，应当分析，其中有积极的成分。除了学校教育读新书外，我感到，家庭教育也烙印深深。在杭州，父亲教我读《诗经》，从“窈窕淑女，君子好求”开始，每天一篇，终于读完。抗战之初暂居

芦墟，叔叔沈文倬教我读《古文观止》，也是每天一篇，都要背诵。中学时代，就能自学了，内有一个暑假圈点了《资治通鉴》，一个暑假浏览了《全唐诗》。这不仅获得一些古文修养，更是潜移默化地接受了忠、孝、仁、爱等伦理观念。中国的古典小说和西方的名著也大多在这几年读了。

谈到家庭教育，印象清晰的有两方面。一是对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的认识，没有走弯路。父亲原来是国民党左派，与左派人士有往来。我小时候从报上看到称“朱毛”为“匪”，父亲说不是，他们是有志于救世者。同住人家一位亲戚（姓孙）被捕，在反省院，父亲带我去看他，送去不少食品，使我懂得“犯人”不等于“坏人”。二是某种超阶级的正义感，是我获得进步的原始动力。父亲做法官，他说是为了主持正义，声张公道。每晚在家，他看公案，写判词，常叫我从书架上拿法典，找条文。他以“清官”自命，《南社丛刊》上有纪录，使我至今铭刻在心，与腐败不共戴天；但他对因贫困铤而走险的，却不无同情和怜惜，使我至今有类似情结（如认为卖淫中有的是“卖贫”，应当严惩嫖客，尤其是官嫖）。

当然，真正受到革命教育，来自现实和党的直接、间接影响。我从小不贪玩，体音美是弱项，唯一喜欢读书。学校功课难不倒我，除在上海南洋模范中学要背英语字典占了较多时间外，课余时间充裕，都用来看“闲



沈立人同志

历史，据说要有距离，才能看得清楚。对自己，没有距离感，不可能客观，但是只要发自内心，就可力求真实。

——摘自沈立人《潇洒脚步》

书”，只约束自己同时不要翻阅 10 本以上。中学时代，有位同学曹月峰藏书多，如《鲁迅全集》等，我都读了，他赠我诗中有句：“翻尽依书佩君勤”。后来到上海进了震旦大学法学系，更有条件在书的海洋中遨游，短短半年，读了《资本论》三卷和《古史辩》七大本以及其他。由于读这些书，有位进步同学杭锦涛介绍我参加一个读书会，读到《西行漫记》和《论持久战》等。联系国运艰难、民生困苦的现实，茅塞顿开。1944 年冬，杭约我去苏北或延安，我心动了；但以父母年老，又是独子，竟未成行。

有了这样的思想基础和理论基础，到抗日战争胜利，我的政治倾向就明确而不变了。那年我 18 岁，成年了，与同乡和同学宣镜渊结婚，到 1995 年已臻金婚纪念。转到苏州东吴大学，选的经济系，为什么？不是想经商，而是期待革命成功后的建设新中国。但是在那个血与火的年代，读书是安不下心来的。回顾到 1948 年的三年间，主要从事三方面的活动：一是在学校，并不认真读那些“资产阶级的庸俗经济学”，而是以学生运动为中心，如办墙报，曾有天天上墙的“爱光日报”；二是在社会，参加和组织一些以青年为主的社会团体，如文心图书馆（地下党背景）、苏州文艺社等；三是在家里，开始成为现在所说的“自由撰稿人”，走上了“笔砚耕耘到白头”的漫长道路。

初生之犊不怕虎，但是毕竟很幼稚。在学生运动

中，我是左派（戴个引号）。例如公开主张“70分主义”，不仅与老师对立，也脱离广大同学。于是，地下党既团结我，又保持着距离，甚至有所怀疑和警惕。在社会上也一样，与进步青年打成一片，而与组织不大靠拢。曾经参加办一个夜校，我教语文，选的是鲁迅、茅盾的文章，讲的是解放区的故事，引起了当局的注意。一次，后来知道是地下党派钱君华专门到我家里，劝我把壁上挂的地图，插着一面面小红旗表示解放区的，无论如何要收拾起。我从中亲切体会到党对我的爱护和关怀。

写文章也是从1945年开始的，前年同时是我的写作50周年。大量的是杂文，多仿鲁迅笔法，揭露黑暗，批判反动。先是投稿进步报刊，如《时代日报》、《文汇报》；后来懂得还可以利用中间甚至对方的出版物，从《申报》、《大公报》直至《中央日报》。尤其在苏州，与一些青年报人搞熟后，还在《大江南报》等辟了专刊、专栏，有自己的阵地。三四年间，发表了千篇以上文章，约有200多万字。解放后历次运动中受审查，我表示：“没有一篇媚蒋，更没有一句反共。”前年，自己印了一本《人生最忆是青春》的小册子，选入80篇，只是其中少数代表作。

1948年夏天，解放区和白区两条战线都到了决战前夕，斗争格外尖锐。在南京“五·二〇”学潮后，苏州东吴大学被迫对十多名学生运动的积极分子“劝令退

学”，我也在内。当时，不少进步报刊被查封，以笔为武器的空间缩小了。我和几位朋友，决心去解放区。其中一位是程伯皋，介绍了有个姓吕的，说有什么关系，要搞个秘密组织，定名“群社”，留在白区一样是干革命。我们投入全部心力，干了一些事。只是不久，吕某被捕，供出我们，一起关到“首都特刑庭”，被判处7年徒刑。结果是只有70天，李宗仁登台，搞和平谈判，我们以公开的政治犯身分得到释放，成为幸存者。解放后经过审查，“群社”定性为自发的进步组织。

在“特刑庭看守所”和后来的“老虎桥模范监狱”，我们才直接认识了一批自己的同志，内有太湖游击队的杨若平，以及有名的民主人士如余心清、骆宾基等。这段生活，既不自由，又有某种特殊的欣慰，并得到别种环境里难得的锻炼。在听到隔江炮声时，作了两手准备：一是等待解放，二是准备牺牲，省悟到慷慨成仁的心情。恢复自由后，回到苏州，太湖游击队派人找上门来，要我们根据中央决定，发展新民主主义青年团。这样，正式参加了革命，并以努力工作迎接解放。地下团有芦墟支部，就是我经手的。

风浪中的追求和陶冶

解放后，组织上分配工作，给我两个考虑，或者在青年团，或者去报社。我说，革命成功，要搞建设，学的经济，正有所用。起先分配在苏州专署财经处，后来

说未有适当机构，暂时到苏州专署（市）税务局，担任调研股长。局长王琢，比较干练，我们一见如故，至今仍是好友。当时个人所想，急于解决入党问题。1950年夏，党内小整风，市委办了“学习班”（？）；有部分青年积极分子参加，由我担任团支部书记。哪知不到一周，来了调令，要我去苏南财经委员会工作。领导问我，是等学习结束，可能解决了组织问题再去；还是先去？我以工作为重，选择即行。哪知失去此一机遇，后来规定，到一个单位必须经过一年考察才能发展；不久又来了各种运动，最后还对家庭出身、社会关系有各种限制。屈指算算，几乎少去近30年党龄。如果说是“坎坷”，我感受最深的即在这里。今年邓小平同志去世，《东方文化周刊》组织知识分子笔谈，要我就这个问题体会“没有邓小平就没有我的今天”，是抓准了。

另有一件事，也是出入30年。1950年上半年，复旦大学要建经济研究所，所长吴承禧解放前办《经济周报》，我投过稿，希望我去。我向王琢讲了，他一口拒绝，理由不仅是工作需要，而是为我着想，与其从书本到书本，不如多搞一些实际工作，在实践中获得真知。我不能不服从，心中是惆怅的。直到30年后，我去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会议上见到王琢（他也早转到理论战线了），旧事重提，相对莞尔。对此，我不后悔。虽然，如果当时就转，在经济理论的修养和研究成果上，肯定比现在的“半路上出家”要好一些。

得与失，是辩证的。在苏南财委两年后，并省到江苏省财委，后到江苏省计委，累计干了20多年经济实际工作，得益良多，对后来搞经济研究是必要的铺垫。当时机构精简，苏南财委办事的除主任秘书何文浩外，最初只有三人，一干机要，一干资料，我干会议记录和整理。财委书记先是区党委书记陈丕显兼，后由马一行、周一峰具体负责，委员包括各经济主管部门的头头，所有重要的经济工作都由集体讨论，作出决议，付诸执行。参加会议，对我无异于上课，了解情况，熟悉政策，特别是懂得一切从人民利益出发；整理会议决定，对我就不仅是做作业，而是进一步学习党的立场、观点和思维方法、工作方法。内如研究问题和总结经验，都是既肯定成绩，又正视矛盾和缺点、失误。这种实事求是的作风，使我终身受用，只是后来渐渐少了，至今仍在记忆和留念。

专心致志搞建设，这种好景并不长，来的是一个运动接一个运动，我也成了老运动员，几乎无一幸免。“三反”、“五反”，苏州税务局搞得一塌糊涂，我幸免了。肃反审干，就逃不了了。那次，通知我接受隔离审查，离家时留下一首诗给镜渊：“最需坚信党英明，人去楼空莫怨生；他日归来最欢喜，还我清白一身轻。”反映我的心情还很轻松，或者说是潇洒吧。但是，牵涉到胡风问题，就复杂了。其实，我只是对他们的诗和小说相当欣赏，1947年苏州文艺社组织去上海扫鲁迅墓

时见过胡风；重要依据是我在解放前的日记里，一次记下与欧阳庄、许君鲸同谈，他们是“胡风分子”，我不会不是的。大致经过八个月，才搞清楚，肯定我“思想进步、历史清白”。利用这段时间，我再次读了《资本论》。

反右之风，也刮到我。先是整风，写大字报，论数量我第一。后来反击，忽然一次会议不让参加，就靠边了。过了不久，又让我参加，并要揭发某某。最后，处理了右派，内部“洗澡”，要我检查的，主要是大字报上有一篇“肃反监护违宪”。右派改正后，我请查查档案，在副本中发现一张纸，铅笔写着“中右”，没有签名盖章，不知道算不算。也在20多年后，一位老领导告知，当时确有人坚持要把我打成右派，只是大家感到我工作积极，于心不忍，才未打成，而以另一位凑数。我听了，觉得很不是滋味，并且觉得，那倒不如让我来当右派的好，可以像厉以宁一样，有机会多读些书，成为饱学之士。《群众》杂志前年有一篇写我的通讯，年轻的记者说我曾是右派；后来更正，加上“几乎”两字，给以澄清。我想，在别人眼里，我这样的人，不妨料断当时在劫难逃。

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我国经济经历了一番大折腾；但是通过调整，还有所前进，并摸索到正反两方面的若干经验教训。我们搞经济工作，那几年是吃力不讨好的。大炼钢铁时，我在省计委，抽调到钢铁指挥部，

日以继夜，很少休息；而在子夜，总要登楼眺望，见到满城红焰照天，内心十分兴奋。发展社队工业，我参与搞规划，不断加码，达到天文数字，预期着一旦实现，农村将是多美景象。三年困难，下去调查，也曾对“包产到户”寄以希望。这些，俱往矣。前几年参加写《当作中国的江苏》和《当代江苏简史》，我承担1958—1965年那段，别人说不好写，我说一定要写并且力争写好，以史为镜，引以为戒。

1964年后，实际上我不再搞计划工作，而是参加“四清”，去运动农村干部了。我是“三门”（家门、学校门、机关门）干部，没有去过农村，严格地说，就是并不真正了解中国经济实际。因此，去农村，很高兴。先后在句容大卓、邗江瓜洲和宝应城区搞了三届，认识了一批基层干部、贫下中农和工厂职工，结下了难忘的友谊，有的后来还有联系。去年，我们重访大卓丁村，见到草房变成瓦房，只是其他变化不大，有待急追。“四清”中干了什么？值得怀念的是一度出现偏差后，我做“保护”工作，在干部遭到批斗后，随即去家访一下，讲明政策，以访不测。

“四清”未完，“文革”来了。确有一个不理解的过程，一直持续到粉碎“四人帮”，才似乎揭了谜底。在“夺权”时，有人拉我一起站在“造反派”的对立面，无异“螳臂挡车”。打内战，写大字报，却发挥了特长。到了干校，才把我“揪出来”，还是解放前的被捕问题。

“靠边”那天，我和平时一样，头碰到枕就入梦乡，并未转辗反侧，有人据以判定：“老沈不会有问题”。可能是平时群众关系不坏，受到冲击不大，审问也较客气：“你是叛徒！”“我叛变了自己出身的阶级。”“你有罪！”“国民党判过我七年！”到落实政策阶段，还未公开宣布，专案组有人就偷偷地先告诉我了。这次“清队”，我是潇洒走了一回。

接着是干部下放，全家去农村，当农民。这回，我做了积极分子，不去老家去苏北，到最困难的地方，淮阴地区泗阳县北部的庄圩乡。这样穷的老区，干一天活的工分只值一个鸡蛋，出乎我的意料。“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不管人们怎样评价，我却感到，不去农村，就不知道中国国情，无论干革命或干建设，都很可能隔靴搔痒。当“老下”，与搞“四清”不同，基本上是平等的，也有可能真心与农民亲近。遗憾的是当农民不久，抽到县报导组干活，重点写学大寨的先进单位——泗阳棉花原种场，并且全家搬去。应当肯定，这里的干部和群众，精神状态是充分向上的。党委书记兼场长耿超带头劳动，吃苦在前，绝对廉洁；技术员俞敬忠细心钻研，培育出了良种，不计名利；广大干部和群众团结一致，斗天斗地，夺得高产又高产。生活这样的环境里，人的灵魂得到净化。

当然，这不是说，应当实行那种实际上是不相信多数干部并带有惩罚性的下放；也不是说，像棉花原种场

当时的学大寨做法，样样都对。但是从个人看，我对下放从来无怨无悔；而最大的收获，则是成为一个地地道道的“重农学派”。在下放干部中，曾经有人悲观，认为真的要当一辈子农民了。我并不这样想，相信物极必反，否极泰来。后来，正式分配工作，叫我到文化图书馆当副馆长，通过会演，对淮海戏有了偏爱。只是不过半年，省里来调我去外贸局，又要坐机关了。

给了一个自由飞翔的空间

拿了调令回城，阴差阳错，第一个碰到的熟人竟是省计委老领导汪海粟。我们曾经同住牛棚，我不相信他是叛徒，他认为我这个人在正确路线下能发挥作用，碰到错误路线就会倒霉。知道我去省外贸局，他把我截下来，要我回原单位，并说正想组建经济研究室，不是专门与数字打交道。

时在1975年上半年，我的第一项任务是参加省委在常州进行的大规模调查。调查的主题是“资产阶级法权”，实际上却是“抓革命、促生产”，当然在指导思想各人理解不尽一样。我在综合组，接触面广，等于补上了五年课，更加懂得“文革”带来了什么，城乡变化了什么，老百姓在想什么。突出的有两点：一是常州发展了生产，主要不靠计划，而靠与外地的物资协作，这是不是挖社会主义墙脚；二是农村发展了社队企业，也以协作为支撑，但是手段多样，是不是歪门邪道？当

时，多数人给以肯定，也有不少人心存疑惑。调查结束时，除了一大堆批判“资产阶级法权”的报告外，最后付诸讨论的只是社队企业问题，一正一反。两份报告，前者由我起草，得到赞同。就是这样，与社队企业（后来的乡镇企业）结下了终生不解之缘。

在汪老领导下搞经济研究，是相当自由的。但是，在当时氛围里，大环境不宽松，我们的重点就集中于社队企业。接着是1976年，三位伟人相继谢世，“四人帮”被粉碎，举国有悲有喜。那年清明，我和俞敬忠同去雨花台参加凭吊总理的活动，也有追查，蒙混过关。社队企业受到重视后，专门建县社工业局，我主动请缨，得到同意，先后干了两年，草拟多种文件，感到“重农学派”有了用武之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正如有人描绘：“给了一个空间，让我自由飞翔。”我又重操旧业，写写文章。不久，中国社会科学院公开招考，副局长金基鹏主动问我是否去报考，恰中下怀。同时，省委要调我去政策研究室，那是一个梯子。两相比较，我还是选择了前者。1979年底，我已年过半百，终于参加了党，实现了一个30年前的愿望，感到当然，并不激动。

考进中国社会科学院，实现了又一个30年前的愿望，不无偶然。我的外语，虽然解放前夕当过半年高中教师，早已丢了；讲理论根底，有自知之明，未下过若功夫。只是建国以来，拼拼凑凑，发表过刚满百篇的所

谓经济论文；其中有与杨坚白论战的，而他恰是决定我取舍的答辩主持人。唯一优长，与同被录取的戴园晨相似，干过较长时期的实际工作。到经济研究所，在国民经济问题研究室（过去叫平衡组，后来叫宏观室），以研究现实经济问题为对象。正是与实际工作者比多一点理论、与理论工作者比多一点实际的两栖性，使我基本上适应了新的工作，由实际工作到理论工作的转换也不显得过分勉强。

80年代前半叶是建国后的一个重要转折期，改革开放从此发轫。我择定研究宏观经济，以经济发展和改革开放为主攻方向，也是为了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迫切需要。边学边干，成为著名经济学家刘国光的助手，先后参加了《中国经济发展战略研究》、《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模式研究》和《大百科全书·经济学》、《经济大辞典》等有相当开拓性论著的撰写和编审，使自己得到应有的长进。在此期间，参与承担若干国家重点课题，包括“六五”计划的总结、经济体制改革的中期规划等，接触到我国经济发展的主旋律和主动脉；后来又多次参加深圳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和海南发展战略的咨询和研究，走到了开放的前沿，学到不少新的知识。与此同时，没有舍弃对社队、乡镇企业的钟情，在不同的研讨会上，当有人指责农村工业与城市国有工业争原料、争市场时，常常成为自觉而又孤立的辩护人，并自称是农村工业不可挽回的吹鼓手。

岁月如梭，很快接近花甲之年，如何安排晚年，列上了个人的议事日程。独生子毕业于南京大学，留美返国，母校不放；我总感到在北京工作也有离基层太远的局限。几经斟酌，遂赋归来。其间，深圳、海南都要我去，更婉辞了。于是，赶在未到花甲前，调回到江苏省社会科学院，只是约定暂时并不完全脱钩，继续协作一些课题，每年去北京几个月。

在地方社科研究机构，主要为当地党政决策服务，理论探索也服从于此。我经考虑，想到两点：一是正面和反面，宣传成绩，肯定经验，有关部门和媒体都在尽力而为，我不必再凑热闹，应当冷静一点，更多注意大家容易忽视的矛盾；二是中央和地方，在北京要讲地方话，反映地方的意见和要求给中央，来地方要讲北京话，可能补大家忽视整体和大局的不足。有人说，这会两面都不讨好。我却认为，必须实事求是，不能见风使舵。作为当前中国经济学界“渐进”学派的一员，在计划和市场、速度和效益、开放和自立等问题上有自己的观点和主张，有的要反复阐述，持之有恒，不该计较任何得失。本着此一原则，承担了一系列课题，如江苏经济十年总结、宏观经济分层管理、乡镇企业与国有企业比较研究等。

回到江苏，逾十年了。惭愧的是组织上给我的荣誉和奖励，大大超过了自己应当作出的贡献。回来不久，被选为党的十三大代表，行使了自己的神圣职责。在省

的社会科学界，首批被评为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专家，首批享受政府的特殊津贴，都使我在倍加鼓舞中倍感担子沉重，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回顾这几年来，在有些问题上敢说敢讲的，而在有些问题上是没有说得够、讲得清的，因而实际上所起到的作用并不大，还该继续努力，未容稍有懈怠。

1992年，满65岁，办了离休手续。但是，“办了离休却未休”，行政事务摆脱，研究写作不止。当时曾立三愿：一是每天保持工作和学习10小时以上；二是每年完成高级职称原有定额（发表3—5万字）10倍以上；三是有生之年再写10本书。五年过去，前两条做到了，每年发表长短文章在百篇左右，第三条已经完成一半稍多。累计一下，10多年出版专著、参著和主编的书有20多本，发表文章800多篇，获得国家级和省、部级奖励20多个。现在苦恼的是外边活动有增未减，要下决心摆脱，集中力量写一些自己一直想写而未能写出的东西。但是也难，例如曾经多次表态，不再写应酬性的书评；而有时有人嘱写并非自己真正想写、愿写的，能够一概拒绝吗？

没有故事的自我独白

征文要求写写“自己的故事”，以上所述，像是一本流水帐，故事性不强。如果余年允许，真想写一部以自己为模特的小说（但不是什么回忆录）。我不是一个

难解的谜。而是一本敞开的书。因此在故事之外，想流露一些独白。

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已经当面和背后听到的评价，多数说我是一个好人，或者叫作好好先生（唯唯诺诺的 Yes man），也有人说我是一个老实人、忠厚人；还有人概括为“与世无争”。这些是褒语，属于贬语的，则说我是一个老好人、滥好人、没有原则性、缺乏斗争性。我自己认为，向往于做一个老老实实的好人，而在这个时代，充满新旧、善恶之争，还该有一些斗志，冒一些风险，不能不得罪一些人。我的一生不尽平淡，有的时候会跳出来，知我者可理解，不知我者就猛吃一惊了。

我的座右铭是什么？常被问到这个属于人生宗旨的表述，不能避而不答，否则就成了一个飘篷。答以“鞠躬尽瘁”，是往自己脸上贴金，愧不敢当，我都答以“温、良、恭、俭、让”五字。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讲这五个字；在和平建设时期，除了极少数敌我矛盾，对同志、对朋友、对人民群众，我认为这五个字还是非讲不可的。温是温和，不急不躁；良是善良，与人为善；恭是恭敬，待人以诚；俭是朴素，足以养廉；让是谦让，与人无争。真正做到不容易，奉此原则很必要。

我有没有自负之处？不少同志在离退休时，常以“一不贪污、二不腐化”自负或自慰，以示一生无愧。其实，这是起码标准，算不上高风亮节；只是在今天，

能做到这两点也足以自豪了。我引以为自庆的更在另一点，就是一辈子没有伤害过任何人，没有做过任何以损人为手段、以利己为目的之事。人生得一知己足矣，真正知己的不多，但是我的好朋友不少；另一方面，我基本上没有一个冤家，没有一个仇人，没有一个誓不两立的手。如果还有人对我不满，仍有时间来得及解怨消恨。

我的人生志趣何在？事情是这样提起的，有人看到我的外貌与年龄比似乎有落差，就问养生之道。不能不答，凑了四条：不抽烟，不喝酒，不打牌，不跳舞；还不够，又加四条：吃得多，睡得香，以及想得开，放得下。于是，有位青年学者不以为然，向我调侃：前面四个“不”，排除了玩耍，人生还有什么乐趣？我思考，对什么乐趣，确实想得不多；但有志于读书和写作，不算乐趣，也算志趣吧。其实，我的爱好还有一些，如打乒乓、下象棋、听戏曲，有时还打麻将。

我的有生之年还想干哪些事？如前所述，离休后有三愿，如精力许可，能够坚持到本世纪末，第三愿也将完成。陈辽看了我解放前的写作，说句笑话：“多了一个经济学者，少了一个作家。”萌发我一个设想，生平执过两支笔，后来抛掉了一支，今后能否拾起来重操旧业？论生活基础，别的不够深厚，对知识分子还是有所了解，不写也可惜了，应当写，不论是长篇小说或电视电影剧本。公布一下，鞭策自己。

历史，据说要有距离，才能看得清楚。对自己，没有距离感，不可能客观，但是只要发自内心，就可力求真实。有限篇幅，仅划轮廓，主要是向过去缺乏亲近、现在接触仍少的父老乡亲作一汇报。落叶要归根，老了更思乡。秋风将起，鲈鱼肥嫩，很想垂钓分湖，尽情地潇洒一番。

(1997年7月于江苏省社会科学院)



1929年4月，我出身在古镇盛泽的一家书香人家。祖父王彦人、伯祖父王镜斋都是能书擅画。

从一百多年来的近代中国绘画史看，有一个影响很大的艺术流派即上海画派。上海画派当时比较著名的大家有赵之谦、任熊、任薰、任伯年、钱慧安、倪田、张熊、吴友如、王礼、朱偁、吴昌硕等，而影响最大的是任伯年和吴昌硕。我的祖父是倪田的入室弟子，我伯祖父则是王礼的再传弟子。我祖父身体孱弱，到上海从师，学成归来，不久病逝。

那时盛泽镇人文荟萃，爱好书画者颇不乏人，由我伯祖父王镜斋，还有汪仰真、张泰然、张貽谷、吴野洲等人发起筹备组织书画会，定名“红梨书画会”，于1925年11月召开成立大会，选举王镜斋为会长，当时会员有三十余人。我伯祖父擅画花鸟，尤以八哥名震吴郡，他饲养八哥，经常写生，熟悉八哥的生

活及动态。他还收藏古代名画，抗日战争前伯祖父亡故，这些古画也在抗日战争时期流失。

我自幼喜爱画画，有时照茶叶筒上的西湖风景，纸匣上的花呀，蝴蝶呀，乐于涂鸦，我父亲觉得我在这方面还有点天份。1943年，我从苏州求学归来，那时日寇侵略中国，盛泽已是沦陷区，我父亲忧国忧民说，不受这奴化教育，还是学点自立的本领吧！我家的亲友中有画画的，有中医的，父亲胆小，怕给人治病误诊，因此为我选择了学画。画画既继承家业，而且家中有先人的手笔，画谱、文房四宝、画碟等等样样俱全。请我姑丈朱乐馥教我，从此，我与绘画结下了不解之缘。

朱乐馥是我伯祖父的学生，画花鸟善诗文，他教我是先从各种花卉入手，教我用笔、设色方法，每次给我画一张小样，然后我把样子拿回家一次次临摹。除教画外，还教我《古文观止》。画了一段时间小张的画，再画册页，姑丈还拿他已绘就的四尺对开屏条如牡丹公鸡、荷花翠鸟、紫藤燕子等让我临摹，循循善诱。我临得废寝忘食，一张张挂出来给亲友看，除用笔稚嫩外，居然维妙维肖，亲友们看了赞口不绝，我父母当然格外高兴。

我父亲为我把楼上厢房整理作画室，还养了菖蒲，说画画时经常看看绿色的菖蒲，可保护眼睛。我也立下壮志写了“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贴在画室，作为座右铭，以鞭策我自己。我原名王贻鼎，我想改名，总

要有点书画的含意。有人建议叫雪蕉吧！雪蕉的名字起源于唐代诗人画家王维所绘的《雪中芭蕉图》，用意是要我在绘画的道路上坚定地走下去，不管如何艰难，要像凌寒未凋的青青芭蕉树那样昂然挺立。

一年后，我姑丈看我学画进步很快，觉得除学花鸟外，应再学画些别的门类。当时在盛泽最有名的画家就数郑怀桥先生了。怀桥先生擅长山水、人物，能博采各家之长，自成一格，功力深厚。我姑丈与他至交。因此由我姑丈介绍我从郑怀桥先生为师，郑老师欣然应允，并经常亲临我的画室教我。他先教我画仕女，他画的仕女脸部用笔、设色有点像现代人，眼睛比较大，眉毛较浓，人物造型也不像清代仕女画弱不经风的样子。他教得十分认真、细致，后来我就临他的仕女及其他人物画。除临老师的作品外，还借他一本清代仕女画家费晓楼珂罗版设色仕女画谱。这是一本册页，共十二张，配景有树、石、水、房屋等，凡仕女画的配景几乎都有。我临摹了不下十遍，在生宣纸上画二寸左右的仕女，掌握墨、水、色是极不容易的，由此打下了在生宣纸上画仕女的基础。

那时，我在家乡已有点小名气，求画的不少，屏条、琴条，立轴都有，尤其是扇面。邻镇芦墟有位老翁八十寿诞，请我画一百张扇面，在夏日炎炎的酷暑，我在厅上挥汗如雨，画了一百张既有花鸟、山水又有人物的扇面，扇面的题款下面写上“时年十五”。



王雪蕉同志

半个世纪以来，我对绘画事业执着地追求，但是没有老师们的教导及热心同志们的关怀、支持与帮助，我也不会有今天。

——摘自王雪蕉《半个世纪的画卷》

我在学画的同时也练习书法。但字总配不上画，父亲很着急，在我写字的纸上批着“不肯用心写，奈何！奈何！”我觉得很冤枉，我不是每天练字不辍吗？父亲教我临帖，不但要临到像，还要领会其神，不能照帖抄。先临到像，一个不像，再写第二个，再不像写第三个……。那时有一画店收购我的山水画，并提出不要我题款，这对我重重打了一鞭。我就刻苦练字，柳体、欧体、赵体，大楷、中楷、小楷，认认真真地临，一丝不苟。不光临帖还读帖，后又临王羲之的行书，在我学书法的过程中，临得最多的是王羲之的《兰亭序》、《圣教序》及赵孟頫的《灵飞经》和《洛神赋》。在大雪纷飞的严冬，朔风凛冽，砚中的水用墨磨出来成为灰色的小冰片，手冻得发紫，毫不懈怠。夏天晚上在天井乘凉还拿字帖读，用手比划默记，这样刻苦练习，终于有人请我画扇面，同时背面的书法也请我写，画与书法相得益彰了。

时光流逝，我学画已三年了！我看《海报》上最感兴趣的是上海几位有名的女画家的活动情况，尤其令我称羨的如吴青霞、周鍊霞、陈小翠、顾青瑶等几位，使我崇拜、向往。我向父亲提出了想到上海拜师学画以求深造的要求。说实在的，在日寇侵华期间，父亲既无工作，又得了肺病，家道中落，生活清苦，幸我家人口少，只是父母和我三人，尚能维持。在我再三要求下，正值抗日战争胜利，父亲就托亲友在上海为我寻师，也

许我和吴青霞先生有师徒缘份，她同意收我这个乡下学生，我父亲变卖家产送我登程。

真的见到吴青霞先生了，我说不出有多么高兴，过去是梦寐以求，如今是梦想成真，多少日子的思念呀！吴青霞先生出身于书香世家，少年时代接触和临摹了大量各派古画，十二岁时，就首次举办个人画展。她是一位全面发展的国画家，人物、山水、花鸟、走兽均能挥洒自如，尤精于鲤鱼及芦雁，她集各家之长形成工写相兼的独特风格。我为能拜这样一位老师而感到荣幸。吴先生那时才三十多岁，中等身材，戴了付深度眼镜，端庄大方，我行了拜师礼，称呼吴青霞先生为“先生”。先生说，每星期六下午到她处学画，三年满师。她叫我买一本装裱好的册页本，她在册页上给我画。

第一个星期六的下午，我满怀喜悦的心情早早来了延安中路四明邨吴先生的家，其他同学也陆续到来，连我约六人，都是女学生。后来我了解到这些学生中有的在读书，有的在工作，有的学钢琴、唱歌，大多业余跟先生学，年龄都比我大一些，先生一一给我们做了介绍。她们打扮都很入时，有的很洋气，而我穿的是母亲做的花布旗袍、布鞋，相形之下，我不但土气，还有点寒酸。在家乡的时候，从小父亲就灌输我一种思想：“一个人最要紧有本领，衣服不好不要紧，字写得好人家一样看得起，如衣服穿得讲究，字写得不像样，没有学问，人家会笑你绣花枕头一包草。”所以我想衣服差

点没什么，好好学画就行，况且先生也没瞧不起我。后来父亲找到工作，又托人带钱来给我买毛衣、呢大衣，觉得在大上海毕竟要穿得像样些。说来也巧，在这些同窗中，竟有一位也是盛泽人，她叫徐碧霞，比我大三岁，她父母都在重庆，只有她，还有一个妹妹跟祖父母在上海，她高中毕业后来学画。她说话时还带些家乡口音，那真是老乡见老乡，格外亲热。

第一次到先生处学画，先生在我的册页本上画了一张紫藤八哥，她给其他同学也每人画一张，这样一个星期画一张，画完一本花鸟册页，又每人画一本仕女。我发现先生作画，不论花鸟、人物、山水总是成竹在胸，不用打稿，用手稍加比划，一挥而就，使我敬佩万分。我想，我要学到这本事就好了，要付出多少的努力呀！

先生不但悉心教我们，还十分关心我们的社交活动。1947年上海画人协会经常举办“美术茶会”，我和徐碧霞总去参加，我们感到兴趣的是观摩一些名画，还有余兴节目很精彩，京剧、唱歌等，欢声笑语，非常热闹。后来出版了一本《美术年鉴》先生把我画的仕女《葬花图》推荐收入《美术年鉴》。

时光匆匆，从吴青霞先生学画已三年，在这三年中先生对我耐心教导，严格要求，我也刻苦力学，学到了过去没有学过的画种，如鲤鱼、芦雁等，进步很大，自己从临摹学会了创作。每有展览，先生也推荐我的作品参加展出，记得在静安寺路中国画苑展出过我的《梧桐

吹笛》仕女横幅，还有《桃花鳊鱼》等。

满师了，学到了画艺，可出路在哪里呢？光有这点本领不行，像我这样既无后台，又无钱无势，在当时上海画界很难立足，而且我已成人，不能老靠父母养我。那时刚解放，我回到家乡商量前途怎么办？靠卖画不行，只有偶而在朵云轩寄售扇面卖掉，那也不能糊口。父亲说，还是再学别的本领吧，可是画画仍不能间断。就这样我考入上海立信会计学校，同时画了作品还请教先生。1951年先生介绍我加入上海新国画研究会，小组活动地点在先生家。那时，其他同学有的去美国，有的离开上海，就是与我最亲近的徐碧霞师姊也已结婚，随丈夫到外地工作，留在先生身边的就是我。所以我临先生的作品最多。1952年我到上海新亚药厂搞会计工作，业余仍坚持作画。1953年中国美术家协会上海分会主办“一九五三年国画展览”，展出我一张仕女画《采菱图》。

1953年11月，我爱人调北京中央第一机械工业部设计总局工作，1954年1月我也随之来京，从上海的地方单位新亚药厂调入中央单位设计总局。

在绘画事业上离开了吴青霞先生，我总有一种失落感。但在北京，我也尽量争取参加一些美术活动。如1956年参加北京市青年美术作品展览，展出《画眉海棠》；1957年加入北京业余美术创作研究组，有时还到北京画院去听课。

我并不迷信，但有时也真觉得命运之神对我照顾，确切地说是好的机遇吧！为什么这么说呢？

我工作的设计总局 1958 年 4 月撤销了，我调入一机部机械科学研究院，是做院领导的秘书工作。当时有一位副院长名张协和，过去在延安工作过，还会中医，业余经常为人治病，交际很广，兴趣广泛。我跟他讲述我的情况，并希望他帮助我在北京找位名师。他问我想找哪位画家，我当时特别喜欢著名女画家王叔晖先生画的《西厢记》，那书里的人物，把内心都画出来了，尤其是崔莺莺，画活了。我说最好跟王叔晖先生学。过不多久张院长过去在延安的挚友张谔同志（漫画家，曾任中国美协会会员工作部主任），他帮我联系好了王叔晖先生，让我到人民美术出版社找她。我欣喜万分，兴冲冲赶到人民美术出版社去见王先生。王先生正在埋头作画，见我去客气地接待了我，并告诉我她家的地址，约我星期日到她家。

我到北京已四年多，但对交通还很不熟悉，平时上下班这点路，星期日即使出去也只是附近走走。所以觉得王先生家很远，换了两辆车，到了鼓楼还曲里歪弯总算找到了辛寺胡同，那是座很古老的四合院，王先生住在后院的两间又黑又矮的房间，这就是人民美术出版社的宿舍，听说社长也住在这里。我想文艺界真够清苦的。王先生的画桌靠窗，光线还可以，我们两人对坐着，看王先生穿一件上青蓝布中山装，朴素得出乎意

料，戴一付普普通通的眼镜，抽着烟，谁能看出她如此心灵手巧，画出美妙绝伦的图画。王先生原籍浙江，可她从小生长在北京，所以一口京腔。我给王先生看我的作品，请她指教。她说画人物画必须学点人体解剖及透视，这样画出来才有质感。她让我买两本书，是中央美术学院文金扬编的《绘画应用透视学》和《艺用人体解剖学》。王先生在透视和解剖上下了很大功夫，在《西厢记》连环画上就体现出来了，这本《西厢记》得全国连环画一等奖，并印了好几国文字，她随手送我一本，并题“雪蕉小友惠存”。我过去画仕女都是在生宣纸上画小写意画法，而王先生教的是工笔画，用熟宣纸画，层层渲染。1959年北京市“三八”妇女节美术展览，展出我一张《花篮舞》，是在王先生指导下画的。此后，我每隔一段时间去王先生家请教。她对我教导最深刻的话：“宁可有稚气，不可有俗气。”其意是画得稚嫩可练成老练，但俗气就很难改。“小的地方要注意，往往小的地方可使动态更美。”画人物往往小的地方忽略，要引起注意。这些话我一直铭记在心。

前面讲到我单位那位张协和副院长会中医，他要让我帮他开药方，开药方也得学，还要背汤头歌诀。当时求诊的人不少，有知名的文化界人士如诗人李季、闻捷，漫画家米谷、华君武，画家吴作人、肖淑芳等都来治过病，他们和张院长成了莫逆之交。有时张院长也带我到中国美术家协会为工作人员治病，那时办公室主任

吴一舸同志要我把画给他看看，他看后主动说愿意教我。吴一舸同志早年师从著名人物画家徐燕荪，后毕业于北京京华美专，曾任京华美专教授。他作画能工能写，所画仕女雍容华贵，艳而不俗。人物、山水功力都很深，由于解放后做美术领导工作，所以画得就少了。他愿教我，当然求之不得。吴先生教画十分严格，他说用笔丝毫不能马虎，染色笔不要离开纸。不但在技法上，还在理论上教我。他要我多读书来吸取营养，他给我画示范画树枝、双勾竹等，旁边写着：“要画，不要描。”他说一定要严格要求，严格才能掌握好基本功，上颜色必须力透纸背，切忌浮。那时我临吴先生的画很多，有《钟魁嫁妹》、《孙悟空》、《傣族妇女》等，他还从中央美术学院借出收藏他的作品借给我临。当时我家中有我父母照顾，我每天晚上画得很晚，星期日半天是绘画时间或到老师家。为了练好线条的基本功，我出差外地还带着绘画工具，晚上练习。《瑶姬献寿图》是根据吴先生的墨稿在家画，又到吴先生家请教设色。这张画是四尺整纸，有三个仕女，无论头饰、服饰及背景等，都是我画仕女以来最工细、最严谨的，用笔、设色都严格要求，有的地方还三矾九染，这张画几乎花了我一年的业余时间。吴先生是很满意的。我由此打下了工笔重彩人物画比较扎实的基础。

时隔不久，风云变幻，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文艺界犹如乌云压顶，我也不敢画仕女了。这几年中除了下放



王雪蕉（左）与其老师、著名画家吴青霞在王雪蕉家中。

农村，在家时还动动笔，画点花卉。粉碎“四人帮”后，去看望吴一舸先生，他得了脑血栓，半身不遂，虽然还认得我，但已不能说话；王叔晖先生身体也不好。后来也经常去看望他们。

1979年，大约七八月间，我从报纸上看到为庆祝国庆三十周年美展征求作品的通知。心情万分激动，使我看到了光明，看到了希望。我就将这张《瑶姬献寿图》送到中国美术馆，能否选上呢？心中没底。从内容上讲是祝寿，可是仕女不知行不行？突然9月22日接到张谔同志来信，真是喜出望外，信上的第一句话：“十多年没见面了！殊不知在最近见到你的大作，真令人高兴极了，特此向你祝贺。回想起你在文革前学画仕女的基础，十年寒窗，决没有辜负有心人呀！十年过去了，你有如此大的提高、成就，我从心里高兴。在这次评选‘北京市国庆三十周年美展’作品的1900多件中，忽然看到了一张工笔仕女画，我记得是入选了！再拿出老花眼镜一看作者，原来是王雪蕉！真出我意料之外……。”过去张谔同志虽然给我介绍老师，但他还未见过我经过老师指导后画的作品。

终于盼到了举办美术展览的那天，我怀着忐忑的心情，在中国美术馆的楼下各厅转了一圈，未见我的画，心中很觉不安，再到楼上，嘿！在很显眼的地方不是挂着我的画吗？旁边是著名女画家潘素先生的青绿山水，我总算松了口气。之后的一个星期天，我去看望很久未

见的张谔同志，谈及我这十年未画仕女，用笔都有些荒疏了，还想继续画仕女，但创作画稿后最好有位老师指点。张谔同志说，我给你介绍潘絮兹先生吧！潘絮兹先生是鼎鼎大名的工笔重彩人物画家、美术理论家。张谔同志和潘先生家都住在北官房胡同，当时就把我带到潘先生家，张谔同志说明来意后，潘先生同意教我，并说他已经组织成立了北京工笔重彩画会，即将举办画展，如这次的画能选上展出，就可加入画会。我感到很兴奋，多么希望参加一个美术组织呀！我用了二十多天时间，精心画了一张《史湘云醉眠芍药》，除醉卧的史湘云外，后面还站立两个丫环作陪衬，芍药花盛开，背景是墨色的太湖石，白色的玉栏杆，自己觉得还满意。这张画参加了北海公园画舫斋北京工笔重彩画展。1980年6月，我加入了工笔重彩画会。以后，我经常创作一些画稿，求教于潘先生。潘先生是很内向的，但对我画稿上的缺点非常认真，一个小地方也不放过，给我一一纠正，在我的本子上还示范画上玉佩、步摇及栏杆等，使我得益非浅。

1980年11月由潘絮兹先生介绍我加入中国美术家协会。

我自1958年开始学画工笔人物画后，一直在人物的线条、设色及创作上下功夫，展出的也都是人物画。当时的工笔重彩画展，展出的大多是人物画，其次是花卉等。我想再画别人不常画的，我就想到画鲤鱼。在上

海时临过吴青霞先生的鲤鱼，我有线描及设色的基础。我想能画好，但画起来鱼的造型及动态就难了，正当我一筹莫展的时候，吴青霞先生给我寄来她画有鲤鱼的挂历，我翻来覆去揣摩，一张张学着，总难画活，造型也不美。但当时别人看了还说画得好呢！1981年工笔重彩画展展出我的一张《鱼乐图》。尽管我觉得不理想，以稀为贵，画鱼还是独一份！后来我鱼画得多了，不断改进，不断提高，每有机会参展，我大多送鲤鱼，连送往美国东方画廊画展，日本日中友好书画展，我都送鲤鱼作品，还有几家报纸如《中国书画报》《中国人才报》等也登我的鲤鱼。天安门城楼也收藏我的鲤鱼作品《鱼水深情》。我画鱼越来越感兴趣了。

话说，吴青霞先生在北京有位挚友周怀民先生，我从上海来北京时，先生嘱咐我去看望周先生。周先生无锡人，早年来京，擅画山水及古画鉴定，曾任京华美专教授，很有声望。我每年总要到周先生家看望。1982年我到周先生家，他告诉我民革中央成立了“中山书画社”，问我要参加否？还说：“最近中山书画社要举办纪念民族英雄郑成功书画展，你可参加一张画。”我当然十分愿意，我正希望多方参加绘事活动。这次展览我画了一张花鸟中堂，桃花、垂柳、燕子，题《燕归来》。1983年8月由周怀民先生介绍我加入中山书画社。中山书画社活动较多，每年举办书画展，还举办十位女画家联展及中外女画家联展等，虽然能参加的女画家的名

额极少，但每次均有我的作品参加。

有件意外的事：1984年10月，接到《中国妇女名人录》编写小组的通知，通知上写：“……在收集整理此书的过程中，我们认为您的事迹比较突出，有一定的代表性，是有影响、有成就的知名妇女人物之一……。”并要求我提供材料内容。此书收入我的小传，于1988年3月出版，有康克清同志题字。

自1954年来京，我的绘画事业虽然在业余时间进行，但还是很顺利的，使我充满信心和希望。1987年9月我退休了，那时我已五十八岁半，对工作来讲，已过了退休年龄，但对我艺术生命来讲，重又焕发了青春。我显得年轻了，真所谓“丹青不知老将至”呀！回家后，我全身心投入绘画，专研如何吸取各位老师教我的特点，博采众长，还有鲤鱼如何画在水中，给自己列了很多课题。

可是又一件意外的事：1988年底，机电工业部老年书画研究会的一位负责同志找我，问我能不能教离退休干部画画？我真没有这种思想准备，要说教吧，我觉得没问题，但我有点犹豫，我还想钻研我的课题呢！我问如何教？他说要站着画，把毡挂在黑板上，上面放宣纸，悬笔画，因为人多，这样画大家才能看见。这倒是新课题，过去我在方砖上悬笔练过大大字，可纸上画从来都是坐着的，这也是个锻炼的机会，对我用笔有好处，离开学还有三个月，还可练练，况且教课的时间不多，

不影响我画别的，我就答应了，从此我走上了教画的路，殊不知教画的好处多着呢！

第一，教别人必须自己有充分的准备，所以我将过去买的技法书重又一章一节细细学习，以便教学时尽量做到有问必答。

第二，过去我较多地画工笔，尤其来京后的这段时间，几乎都画仕女画，练习悬笔画，对放开用笔有好处。

第三，在教课前教什么自己先练什么，对我过去学的花鸟画来个总复习。

第四，与学员之间，既是师生，又是朋友。

还有一点过去没想到的，就是我将备课材料整理后作为我写书的基础。

开学了，我第一次走上讲台，思想好紧张。先由老年书画研究会的同志讲话，介绍我的情况，然后我将讲课的安排说了一下，看看大家有没有意见，先教梅花，梅花的品格，画梅花有几种颜色及表现手法等。然后在黑板上用粉笔画梅花的结构，再在宣纸上勾、点各种姿态的梅花。学员反映我教得很细，容易接受。从此我就一种花、一种花地教，然后再教鸟。通过教学，觉得自己久未画的花鸟画熟练起来，能得心应手，这就是“教学相长”。1990年中共中央办公厅老年书画研究会也来请我教画；1991年又到中国铁路老年大学教，由于我进该校时我教的班已学过四年花鸟，有一定的绘画基

础，所以一开始就教他们画金鱼，接着鲤鱼、芦雁及禽鸟，学员们学到新的内容，非常用功。在这些学员中，年龄最大的已有八十岁，有一天大雪纷飞，我想学员一定来得少，但出乎意料，当我走到校门口时，那位八十岁的学员正步履艰难地向学校走来。有位学员患轻度脑血栓住院，可每当我教课时他都向医院请假来上课。很多学员通过学习，参加本系统、本单位，甚至北京市画展得奖，打电话向我报喜。这些学员积极学习的生动事例对我是教育，是鼓励，是鞭策，督促我自己要更好地学，更好地教。

1992年1月《中国人才报》登载了我的作品《九如图》，3月8日又发表了《雪中芭蕉——记著名花鸟仕女画家王雪蕉》一文。

1993年，我萌发了想办个人画展的想法。我从事绘画已五十年，办一次画展，看看社会反应。这一想法首先得到家中人的赞同。然后商定了展览作品的内容、件数、地点及时间等。有了初步设想，我给吴青霞先生写信，汇报我这一打算，先生很快来长途电话，非常赞成我办展，积极支持，为我写展标。潘絮兹先生给我写《前言》，周怀民先生给我题词。有这三位先生鼎力相助，我心已定。不久吴青霞先生寄来展标的题字，并一幅她老人家为我题的词：“出蓝胜誉久驰名，鸟语花香照眼明，更喜传神参造化，洛阳纸贵若同声。”周怀民先生用四尺整纸题四个大字“艺坛之光”。潘絮兹先生

在“前言”中写：“……她的仕女画秀丽典雅，基础扎实，线条流畅，姿态动人，富有灵气。她还擅画鱼、雁和花鸟，莫不妙造自然，生动活泼，表现出她独特的明丽清雅的江南风格。她画路很广，工写兼能，是女画家中难得的人才……。”这些题词对我是极大的爱护和鼓励。

北方交通大学，过去我经常参加他们的笔会，这次展览，他们特地为我做了一批装画的镜框，展览期间所有用车都由他们派，对我办展很大的支持。

我的堂侄千里迢迢从盛泽赶来北京，为我办展助一臂之力。

8月27日，开幕式那天我到得较早，但有的观众到得比我还早。不久周怀民、潘絮兹，许麟庐、肖淑芳等著名画家都来了，由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工作部季华同志主持。有美协书记处书记雷正民、中山书画社社长邵恒秋、北方交通大学领导孙永春同志讲话，宾客盈门，气氛热烈。当时有中央电视台“夕阳红”栏目来录开幕式，人民日报、中华老年报、解放日报等记者来参观。这次共展出作品68幅，人物、花鸟（包括鲤鱼、金鱼、芦雁）、山水，观众踊跃。很多观众提出，这次展览没有出书感到遗憾，看了展览回家还能看到画册就好了。那时有位同志名叫辛显林，也是美协会员，但我们不太熟悉，她找到我慎重提出：“你应该出本书。”我说出书不容易，听说要花很多钱。她很热心地说帮我找

找人，能否少出钱或不出钱，我很感谢她，我们互相留了电话号码。我是静候佳音。

再说在我展览会前后这几天，北京电视台“文化教育信息”栏目在当天就播放了我展览情况。中国日报、人民日报、北京日报、北京晚报、解放日报、辽宁日报、中国妇女报等16家报纸，共刊登我展览消息、报导文章、作品介绍等19次。中国日报刊登我的《瑶姬献寿图》，人民日报海外版刊登花鸟画照片及简介，中央电视台“夕阳红”栏目播放开幕式情况。总之，这次展览的影响，超过我预期的效果。

展览会结束后，有一天接到辛显林同志的电话，说要带出版社的同志到我家看画，好在镜框内的画还未收起来，我赶忙布置。中国书籍出版社的编辑来了，她看了我的各类画，提出想出版一套技法系列，她要了我作品照片，说回去和社长商量一下。我说要出书先出一本画鱼的技法书，因为别的书出得较多。看编辑的态度，我觉得出书很有希望，所以非常高兴，并开始准备，看参考书，列题纲，打腹稿。所以这本《画鱼》初稿二个月写成，经过专家审稿，给予肯定。我一方面略作修改；一方面准备附图及作品。《画鱼》在1995年7月顺利出版。《中国书画报》登了出版消息，由于未写出版单位，各地读者纷纷写信给报社，报社又把信转给我，信中表达渴望要这本《画鱼》的心情，一位山东读者在中国书店读者服务部买到这本书，高兴得马上给我留下

一封信，说看到这本书爱不释手……。不久，中国书籍出版社这位编辑又找我，提出要我写《小写意花鸟画法》，9月，出版社和我订立了出版《小写意花鸟画法》的约稿合同。

花鸟画技法书已出版很多，所以我写一定要写出特色来。我根据这些年教学过程中学员画画时所出现的问题，如点缀物往往被忽视，一张作品主题画得很好，可是点缀物石、草或点苔画坏了，就会逊色甚至前功尽弃。还有花与鸟的配给也是常碰到的问题，因此我写这两章，强调其重要性。又加上别的书上极少有的芦雁一章，所以此书文字内容多、附图多。多少个日日夜夜，我真感到很累。书终于在1997年3月出版了。写这本书特别受到吴青霞先生及潘絮兹先生的赞许，说我写得好，想得周到，我心里甜滋滋的，写书时的劳累全消除了。我写这两本书，能为教学做一点贡献，能给人们以美的享受，我感到很大的欣慰。

在我个人画展期间，有人邀请我参加展览，分别是：

1994年9月纪念中国创建经济特区十五周年书画绘画艺术大展；同年10月，国际中国书画博览会在新加坡展出；1995年7月，在马来西亚吉隆坡参加中国当代著名画家作品展等。

半个世纪以来，我对绘画事业执着地追求，但是没有老师们的教导及热心同志们的关怀、支持与帮助，我

也不会有今天。肖淑芳先生在我个人画展时给我题了词“艺精于勤”，我将以不懈的努力，创作出更加美好的画卷。

(1997年7月15日于北京)



(一)

在我家里，最受欢迎的东西是书。书是我们一笔不小的财富，也是我们洞察这个世界的一个窗口，书当然也养育了我。——我在这里之所以要用“养育”一词，是因为我确实从那些浩如烟海的书籍里吸取了营养，它像田野里的五谷一样，从精神上滋养了我。——人的生活其实是由两块天地组成的，一块是物质的，一块是精神的。人在得到丰富物质的同时，如果他的精神是空虚的，那他仍不会很快活，只有两者同时有之，生活才会丰富多彩。同时，我又用我嫩稚的笔，不断为读者献上着我的一本本小书。写书比读书当然要苦多了，但我乐此不疲，苦乐其中，我们就这么友好相处着，无怨无悔，无拘无束，无比融洽。

我小时候其实并没有读到很多书，呀呀学语的年龄，虽然跟着父母在苏州生活，那时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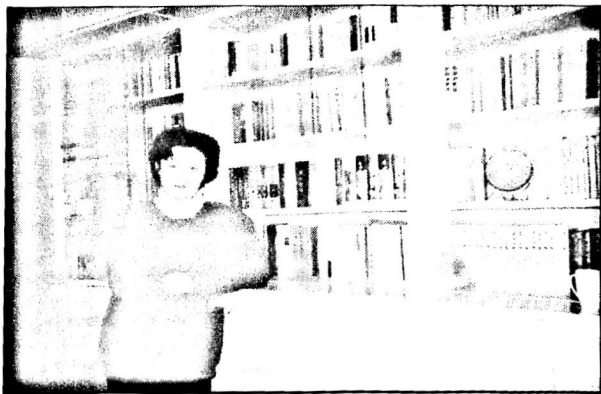
里肯定有很多书，但我实在太小了，因此父亲只是给我买回了许多识字卡片，那是我最早接触到的中国文字。这段记忆甜蜜而美好，但那些文字根本不能算作书。后来父亲从城里回到老家，不久便去了一所乡村小学教书，从此，风里雨里，父亲把他的所有精力都给了那些乡村的孩子。他很少回家，也没再给我买书。——他还能去哪里买书呢？那些寂寞的乡村，那些乡村的孩子都巴望着想看书而无书看，那些乡村就是因为缺少文化知识才急需一批老师去那儿的呀。父亲尽管喜欢我们，父亲尽管知道书是启迪孩子心灵的钥匙，但他已没法给我买书了。

我最早接触到的书是没有文字的。那是每天黄昏后母亲给我讲述的民间故事，什么杨乃武与小白菜的故事啦，什么贾宝玉和林黛玉的故事啦，什么梁山好汉的故事啦，那些从母亲的母亲的母亲嘴里传下来的生动有趣的故事，丰富了我的想象，也从此让我对书产生了一种极大的兴趣：书里，一定还藏着更多的故事！

我开始千方百计找书看。学校的课本，语文新书每学期发下来，才一两天的工夫我就把它从头到尾看上几遍了。虽然看得一知半解，虽然里面生字很多，但我看得兴致勃勃，好不快活。那时候我生活的小镇好像还没有书店，即使有，我想母亲也不会给我买，因为那时我们的日子过得太拮据了，每到月底的时候母亲总要找出一些东西去卖了，才能维持接下来的日子。——但我生

性里似乎与书有一种不解的缘份，有时候去邻居家玩，只要一见到书，立刻拣起来要看，不管是在哪里，只要生动有趣，我就会躲在一边看下去，直到天黑了大人们都回来了，我才依依不舍离去。我不知道那时候，邻居家有没有烦我，我只是沉浸在自己那个快活的小世界里。那时候，离我家不远处还有一个出租小人书的摊子，几分钱就可以看上一大摞的连环画，那也是我最爱去的地方。

我的中学时代同样匆匆而过，好书并不多见。但中学的图书馆里毕竟有了不少的书，每天吃过中饭是借书的时间，我总是早早到了，排在队伍的最前面，把图书馆里的书几乎通读了一遍。在那段日子里，我看了《苦菜花》、《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暴风骤雨》、《红岩》等一批长篇小说，还不时把书中一些精彩的章节抄录下来，笔记本抄了一本又一本，以至后来我都养成了一种习惯，一看到好的文章或段落，就手不由主地找笔，要把它们抄下来。但那时候我并没想到要当作家，我仅仅是被这些章节吸引了，感动了，我仅仅是因为喜欢它们而在做着这件事。——那是文学最早以它一种特殊的魅力在吸引着我，那是文学的小精灵最早引着我在这块园地里遨游，直到后来当我也拿起笔来的时候，我才知道要写出这些章节是多么艰难。中学时代的生活因为有了书而丰富充实多了，也更多了一份浪漫与理想。那时摆在我们面前的路也真是五彩缤纷，我最向往的是进入清



吕锦华同志

当一个作家把自己的一生都已交给了自己倾心的事业，当他在那里找到了自己人生的寄托与安慰，这个过程本身就是他的生命的全部了，至于结果，他会微笑着说：那由后人去评说吧。

——摘自吕锦华《以书为伴的岁月》

华、北大那样的高等学府，然后去当科学家，像居里夫人那样在科学的领域里创造出奇迹来。——在这里有必要说说我的语文老师，如果不是他那时候就坚持认为我在文学上有独到的天赋，对我格外宠爱；如果不是他那时候就很欣赏我的作文，常常把它拿到课堂上来讲评；如果不是他常常不厌其烦地拿了一篇篇中学生的优秀作文推荐给我看，不断提高我的作文水平的話，至少，我的文学修养还要逊色许多，我后来拿笔写作的艰难还要增加许许多多。

只是，我想当科学家的梦，我的那个五彩的光环，很快就在那场史无前例的革命中破灭了。后来我们纷纷上山下乡去广阔天地接受再教育，寂寞的乡村从另一个角度给我们补上了一堂生活的课，也为我后来的创作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素材。

(二)

有时我常想，人生的路虽说由不得自己，但又全在自己脚下。一场运动虽然改变了我们的全部，但只要我们不放弃追求不自暴自弃，只要我们的心中仍点燃着理想之火，我们总会为自己找到一条金光大道。——我这里说的“金光大道”，当然不一定就是可以让你成名成家拥有大量财富的路，但它至少可以让你心情舒畅地去做自己想做的事，去实现人生的真正价值。

只是，这条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也不容易。

七十年代后期，高校又恢复了考试制度，一批批我熟悉和不熟悉的同龄人，陆续跨进大学的校门，又实现了自己梦寐以求的愿望。这时的我已成家，有了孩子，爱人参加第一批考试，被南京大学物理系录取，走了。那天清晨，我目送载着他远去的汽车，我默默想着，来年，我也一定要去报考大学。

但我未能如愿以偿。第二年高考有了新的规定，结婚的一律不再招收。

路，难道就这一条吗？人生的理想，难道就只能一个吗？上大学固然是好，但上不了大学，难道就无路可走了吗？——夜深人静，我躺在床上辗转反侧难以入睡，我一遍遍无声地问自己，回答是否定的。

于是，我又开始了新的选择。

这时，文学园地百花争艳的情景吸引了我，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从未有过的繁荣景象，我被那一篇篇生动感人的、精彩优美的、飘逸隽永的文章迷住了，我读呀看呀，常常热泪盈眶，不能自主，我感谢生活是那么丰富多彩，也更钦佩这些拿笔的作家，把生活描述得如此精微细致。——几乎同时，我也开始尝试着写起了文章，我觉得这种“写作”非常适合我，它不需要有整块的时间，也不用我与社会上的人去打交道，这是一种个体劳动，这种个体劳动很适合我内向的性格，也使我空下来的时间里有了事做。于是，我不知天高地厚地拿起了笔，而我在中学时代打下的文学功底，这时也真起了

作用，使我很轻松地就迈进了这个园地。我开始写科幻小说，写儿童读物，写散文随笔，还写电影剧本，我似乎恨不得将有的文体都写上一通。——我把所有的时间都利用了起来，而把过日子的事情简单到不能再简单的程度，中饭常常买一些包子来充饥，而熬夜干通宵更是经常的事。但不久我就尝到此举的艰辛了，最让人痛苦的是：它并不和你付出的心血成正比。——虽然写得很认真很刻苦，但命中率并不高，稿件常常寄出没多久又被退了回来。有一次我写了一个名为《母亲》的电影剧本，正好一位很有名的大导演在拍戏，我便兴冲冲找去了，在门外等了很久很久后，才惶惶不安地将厚厚一本的剧本递了上去。我等呀等呀，希望能听到那让人高兴的消息，可不但没有，而且从此石沉大海，没有一点讯息。——那是在写作路上最初的跋涉，我没有像有些人那么幸运，一举成名或一鸣惊人，每一作品，字里行间都印满了我的幼稚与笨拙，也浸透了我的汗水与泪水。

唯一可以自慰自豪的是，我在最艰苦最困难的时候，一直没有放弃我的这份追求。——当我把它作为人生的一个目标后，我就一直向它走去，走得坚定不移，走得义无反顾，走得毫不泄气，我的目光一直盯着全国那些较有影响的报刊，我的心里一直在想：我一定要写一本自己的书。

给我很大鼓舞的是，最初发在《新华日报》和《中

国青年报》上的几篇散文，一篇是《金色的芦荡》，一篇是《悠远的纤道》：《金色的芦荡》写的是我在苏北搞民间采风时的一些感受；而《悠远的纤道》则是写我童年时的生活，写我在大运河边度过的那一段日子和坚韧不拔的纤夫留给我的印象。那时拨乱反正的中国正百废待兴，我把它比作是一艘沉甸甸的船，我在文章中写道：如果多一个纤夫少一个乘客，我们中国这艘航船不就可以驶得更快一点吗？——文章出来后反响不小，编辑部收到了全国各地大量的来信，兴奋之际他们给我来了信，说了许多鼓励的话，这对我的影响真是不小。因为，那一阵子我正被许多退稿困惑着，我开始怀疑自己是否在这方面存在着某种思维障碍，作品的发表真是让我柳暗花明又一村，同时，也让我想起了朋友的一则忠告：当你走到九十九步的时候，千万不能泄气，这时候是最艰难的时候也是最可以获得成功的时候，只要挺一挺，你就胜利了！是呵，我深深感到，失败和成功，有时真是一步之差。——从此，我生命的小船一直在生活的大海里捕捞着，采撷着，迎风搏浪向前驶去。

直到许多年后，当我的创作开始进入一个比较自由的王国后，当我的作品不断见诸报端并被辑入各种文学选本后，当我的小书一本一本出版后，我还对自己最初的岁月怀念不止，如果没有这一段日子咬紧牙齿的拼搏，如果没有这一段日子的付出与铺垫，也就不会有后来我在文学路上的得心应手。——尽管，作为作家，他

的每一个题材都不会写得轻松，他的每一篇文章都是他心血的结晶，但比起最初的起步，那毕竟要好多了。

当然，我们也不能排除外界的因素，人有时候需要关心，需要支持，哪怕是一句轻轻的问候，哪怕是一个默默的眼神。记得当时不少与我一起走上这条艰难小路的朋友，后来大都改行做了其它的事情，而我之所以坚持下来了，我想与有关方面的支持关心不无关系。——在这里有必要说说曾给了我很大支持的领导，八十年代初，当我刚刚在创作上取得一点成绩后，苏州市的领导便派了同志来吴江考察，当地人事组织部门又立刻报送了我的转干材料，从而给我创造了一个较好的创作环境。在后来的日子里，当我遇到困难想搁笔的时候，尤其是受经济大潮冲击心态不太平衡时，一想起周围那些关心与期待的眼睛，想起生活中那些感动我激励我的故事，我就又开始了默默的耕耘，我想，我至少不能让他们失望，或辜负他们的一片心意。

当然，最初的起步更是毅力的较量，一种带点儿不肯认输的赌气，另外，还掺进了一缕为理想献身的悲壮。而那时的我，也真是迷在了这个天地里，无数个休息天，我是在书桌上度过的，那小小方桌上推满了书，那书里仿佛藏着无穷魅力，人一进去后就很难脱身。我有时看书有时写作，常常喜欢把头深深埋在书堆里，吃饭之类的事都成了小事了，而无数个蚊叮虫咬的夜晚，我便躲在蚊帐里佝着身子写，常常写着写着便睡着

了。——人一旦为自己找到一个奋斗目标后，人一旦觉得生活中有了一件很重要的事要做后，那么，他在这个目标鼓舞下再苦再累也不觉得什么了。

(三)

八十年代中期，我的第一本小书出版了，书名是《小巷女子》，全书十多万字，由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艾煊先生为这本小书作了序。他在序中写道：“吕锦华从苏南水乡幽深的小巷走向广阔的世界，睁着一双几分天真稚气，几分成熟通达的善良的眼，看世态，看人生，事事有浓兴，处处有感叹。……她的叙述文字，不求结构严谨，故事完整；不求曲折跌宕，情节变幻莫测；也不刻意提炼主题，含意深蕴。只是稚气天真的眼，对世界片片断断的感叹，一种感觉，一种柔情，一种思绪，甚或一种梦境。”

的确，我的散文大部分来自我对生活的感受，我写得比较轻松比较满意的文章，也常常是我最熟悉的生活，比如我曾经写过一篇《五味糖》的散文，这篇文章主要写了一个我从小就与之生活在一起的孤身老人，我几乎是看着自己慢慢长大、也看着他一点一点老去的，这是一个既独特又带有一种普遍性的老人。——他善良，却一直不会安排自己的日子，他干活卖力，却始终没有受到大家好评，他在小镇上经常制造笑料，成为人们谈笑的话题，当然，这是一种善意的调笑，但他毫不

在意，洋洋自得。在这位老人身上，我想到了许许多多东西，也觉得有许多的话要说，那是一种甜酸苦辣交织在一起的滋味……，于是，便有了我这篇《五味糖》的散文。这篇文章后来多次被选进当代各种文学选本，我想，多半是人们从中读出了许多东西。

不久，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了我的第二本小书《总想为你唱支歌》。在这段时间里，我有机会借助各种笔会，去了国内的许多地方。中国有句古话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确，对于一个有志于文学事业的作家来说，出去和不出去真是大不一样，尤其我是搞散文创作的，出去以后亲眼看到了祖国的大好河山，经历了各种各样的生活。比如，我曾乘坐 51 次列车，在硬座车厢里，经过了长达四天四夜的旅途生活，到达乌鲁木齐时我的双脚都不会走路了，只觉得人老是在一个起伏不平的路面上颠簸，但一路上我与那些新疆知青聊天接触，了解到了许多我不知道的东西，到了晚上他们把三人的座位让给我睡觉，而自己取出席片就在过道上的椅子下睡了起来。他们每年都要在这条路上来来往往，而我只是一个过客，但我已深深感到了这一路的不易。后来我又跑到了新疆南疆的喀什地区，在茫茫无际的戈壁滩上整日整日地赶路，那种苍凉雄浑的大漠风景，那份艰辛焦渴的旅途跋涉，与家乡小桥流水、柔风细雨的景色真是一份鲜明的对比，这种对比使我的创作灵感一发而不可收，我由此写出了一系列自己觉得较为满意的作品。

品，其中《总想为你唱支歌》一文，就写了我对西北土地一片感情。

我在文章中写道：“深夜临窗独坐，在一片虚与清中，用心去重温西行的日记，我不寐的感觉是一支画笔，画着画着，仿佛连自己也迷失其中了。……在戈壁上赶路，还能经常看到这样的情景：一片片伤疤累累、粗壮结实的胡杨林，因缺水而死亡了，仿佛是一个刚刚经历了恶战的古战场，死亡的胡杨林仍高举着一条条佻曲的干枯的丑陋的胳膊，一齐对着蓝天，仍挺立着身子不肯倒下，密密麻麻粗粗细细的胳膊汇成了一个可怕的方阵，一片呐喊的海洋，为活着的伙伴和为死去的自己。荒漠戈壁上随处可见被榨干了最后一点水的枯枝败草，惟有枯死的胡杨林的方阵总使我热泪盈眶。”

我在文章的最后表达了自己一种真切的愿望，我写道：“也许有一天，有这样一个夜晚，人们不约而同地在同一时刻抬起头，一瞬之间，面对深邃而邈远的星空，大家猛然醒悟：南方的天地太狭小了，太玲珑剔透了，太经不起摔打了，而这狭小的天地里又挤满了人，矗满了楼，停满了车，人们会发现，大西北正在呼唤着我们，尽管那里的风是干燥的，水是咸涩的，但那里有一片片令小鸟展翅翱翔的广阔天空，人们不会因挤在一起而折断翅膀，那里有一块块使生命茁壮生长的全新绿洲，人们不会因挤在一起而活得太累，也许，有一天，人们还会发现，沙漠正虎视眈眈地威逼人类，沙漠可以

吞噬世界上最雄伟的城池、最美丽的生灵，可以制造世界上最悲惨的一幕，而贪婪、愚昧、畏缩和平庸比沙漠更可怕，人们忽然明白了，开发建设大西北，振奋中华民族，正是二十一世纪的中国人为自己寻找的一种最明智的选择……。”——我不知道我的这种想法是否有点太浪漫，我也知道，如果真要大规模开发建设大西北的话，我们要做的事还很多很多，但作为一种文学作品，它的作用就是要唤起人们的共鸣与共识，使大家一起来为它的实现而努力。

袁鹰老师在我这本小书的序中写道：“锦华是八十年代的一位行吟歌手，她以诚挚的爱心，总想为家乡的父老唱支歌，为厚爱她的大地母亲唱支歌，为饱含苦泪和喜泪的生活唱支歌，为历经忧患和崎岖的民族唱支歌，而在千千万万同代歌手中，她却不愿意一味地跟着别人的脚印、依着熟谙的调子、杂在队伍中随声附和，也不愿意随随便便地引吭展喉，她唱的是自己的歌，唱人生这支歌。……漫长的道路在她面前，大千世界在她面前，她将继续走、继续唱，以自己的真情、纯情、痴情，为我们唱更多的歌。大地山河在等待她，春风秋雨在等待她，父老兄弟姐妹在等待她呢……”我总觉得，袁鹰老师的话，更多的是在鼓励我向前走去，去唱好人生这支歌，以不负大家的一片期望，同时，也为我的创作指明了方向，袁鹰老师当时是人民日报文艺部主任，且写了许多漂亮的散文，受他影响，我文章的格调也亮

丽起来了。

在这一段时间里，我的许多文章在全国获奖，如《拱北海关的遐想》获《光明日报》征文比赛大奖，《邻居》获《人民教育》杂志社红烛征文一等奖，《总想为你唱支歌》获中央电视台等单位举办的“我看中国”征文比赛一等奖，《月光下的散步》获“金陵明月”海内外征文三等奖，等等。现在回想起来，那个时候真是热闹极了，仿佛要回报我这些年来的付出似的，我在创作之余享受着一份份收获的快活。但在这热热闹闹的背后，我便少了一些冷静思考，少了一些推敲作品的耐心，这于我的写作是非常不利的。——当然这些，直到后来才被意识到。

(四)

八十年代后期，我得到一个机会，去北京参加中国作协举办的全国首届散文杂文评奖工作，这是建国以来这个领域里的第一次评奖，其规模之大，工作量之繁重，是可想而知，而我们作为初评小组的成员，将负责对全国各地送来的图书进行阅读筛选，从中选出一些好书推荐给评委们看。——每天每天，我们除了三顿就餐要步下楼梯外，其余的时间就是躲在作协招待所的小楼里看书，书多得在小房间里堆了一地，我们每天都像睡在书堆里，桌上床上地上，到处是书；书看了一本又一本，有我熟悉的老作家写来的，也有我不熟悉的年轻作

者写来的，平时单独看时因为没有比较所以也不觉得怎样，放到一起看后就比出了高低，比出了好坏，在这段日子里，我不仅读到了全国各地送来的大量优秀的散文，而且开始懂得了怎样的文章才是好文章，怎样的文章才能深深打动人，这为我以后的创作，这对我后来散文的写作，其影响真是十分深远。

我至今记得在北京的那些日子里，我们常常会被一些好的散文激动得热泪盈眶，互相传阅，交流感想，赞不绝口，沉浸在一种不能自主的快活中，那感受，就像品尝到了一盘美味佳肴一样的回味无穷。也正是在这次读书中，我第一次读到了老作家肖乾的散文、钱钟书夫人杨绛的散文，还有陈白尘的、曹明华的，还有许许多多著名的和无名的作者的优秀散文。在这个洋洋洒洒的书的王国里，人的名字已不再重要，而文章的好坏却深深牵动着我们每个人的心，尤其是一些老作家文笔的老辣与对生活的深刻见地，更是让我们年轻人佩服得五体投地。——与此同时，我在心底里也开始重新构筑起我文学的小巢，我隐隐地感到自己以前的天地真是太小了，太闭塞了，我看书的范围也太狭隘了，我开始为自己制订了一个更高的目标。

九十年代，我不再向往那些频繁的获奖，也不再热衷于参加热热闹闹的征文比赛，同时，我也不再被文坛上那些刮不完的新潮流派所左右，我默默地朝着自己选定的方向走去，我不知道这是否可作为我的一个成

熟的标志，但至少，我做到了。

我空下来的时候喜欢一个人躲在书房里静静地看书，再不，就背上一个小包去外面大街上走走，感受一种平常人过的日子。因为我觉得，如果我想在创作上再上一个台阶的话，如果我希望我的散文能拥有更多读者的话，那么我首先要学会耐得住寂寞，耐得住清贫，耐得住不被人注目，耐得住沉到生活的最底层去，因为只有当你真正成了他们中的一员的时候，因为只有当你和他们同呼吸共命运的时候，你才能写出深深打动他们的文章，才能在文学这个领地里树起自己的一面旗帜。——无数老作家走过的路，该是我们最好的借鉴。

在这段日子里，我又有几本小书得以出版，其中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我的散文精选本《何时入梦》，沈阳出版社出版了我的自传体小书《边走边唱》，中国妇女出版社出版了我的长篇散文《金秋》。我在《何时入梦》一书的自序中写道：“人常常不是一开始就为自己选择好一条路的，文学创作是一项十分寂寞的脑力劳动，而散文在文学门类中又是一种更需要宁静心境、更需要冷静反刍生活才能进行创作的文体，它需要你百分之百的真情实感去锤炼这颗美丽纤细的珠子，而这颗珠子所能击起的震荡，却常常一闪而过，被人忽视，因为它实在太小、太轻、太微不足道了呀！然而，我喜欢安静的性格正好和它对上了号。……我开始在一个又一个暮色降临的黄昏，在一个又一个月光迷蒙的夜晚，撰

写我对人生的感受，对生活的反思，写故乡故土在我心中留下的那种温馨，写祖国山水在我胸中激起的一种苍凉而美好的回味，柔和的灯光编织的是一方最宁静的天地，每每进入这个世界，一切的烦恼便随之远去，而一切耳闻目睹的世事便纷至踏来。于是，我写呀写呀，写不尽人生路上的苦苦甜甜悲悲欢欢，我好象突然面对一位慈祥的长者，有着说不完的话要说……”

——的确是这种心情，如果说多年前的文学创作让我感到一种艰难、一种不易的话，那么如今的写作我已从这个痛苦的圈子里走出来了，我感到充实，感到愉快，感到我正在和生活进行一种对话，一种交流，一种心与心的叠映和碰撞，那由此产生的小小火花，会让我激动不已，快活无比，而每一篇文章的完工，对我都是一份极好的享受。——我已从一种被动的写作状态中解脱出来了，进入一个写作的自由王国，我不再受任何东西的影响，朝着自己选择的方向快活地往前走。

(五)

我开始更多地关注生活，关注周围人的命运，我想，我如果还要在这条路上走下去的话，他们首先是我创作的“源泉”。——“生活是创作的源泉”这句话绝对不是一个大而空的口号，而是无数前辈作家用一生写就的条文，这是一个非常朴素且颠扑不破的真理。

比如我有几篇非常得意的作品，写的就是我在乡村

插队时的生活，其中有的得了奖，有的人选各种文学选本。有篇《难忘黄昏》的文章，我在里面写了乡村一个平常而美丽的黄昏，那是在队里受了委屈后大哭一场后突然发现的一个黄昏，我写道：“正是落日时分，夕阳像一个灌满了气的大气球，殷红殷红的半浮在远处地平线上，天地间充满了一种绚丽而热烈的光影的流变，小屋和村子隔一条小河，小屋前是一览无余的农田，黄昏时分，一望无际的碧绿秧苗在晚风中起伏着，仿佛有一只看不见的大手在抚摸着这条绿地毯，而晚霞的缤纷艳丽布满了西天，好像是一位粗心画师泼翻了七彩颜料，就这么看着太阳一点一点沉下去，一清如水的光也就开始一点一点浑浊起来，随即天地间升起了一层薄薄的雾气，而像脊梁一样高高耸起的灌溉总渠上，牧童赶着老牛，农人扛着铁锹的身影仍被清晰地描摹在灰蓝的天壁上……；屋后小河里传来了女人的捶衣声，男人的调侃声，传来母亲高一声低一声的唤儿声……”——其实这是一个平常得不能再平常的乡村黄昏，只要天好，我都可以看到这样的景象，但我一直没有去注意，直到受了委屈，有了不顺心的事情，才发现了大自然是多么可爱，它可以抚平我们心头的伤痕，也可以使我们重新鼓起生命的风帆。我接着写道：“过后，我很快忘了此事，我又像往常一样地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汗水和泪水默默流进这块土地，没想到随着岁月的推移，我忘了那时的许多事情，却独独记住了这个黄昏，这个黄昏，究

竟给予了我们什么呢？”——是啊，我为什么会念念不忘这个一点也不奇特的黄昏呢？我想，这就是我要告诉读者的原因，也是我写这篇文章的动机：乡野的土地，乡村的黄昏，它尽管不华丽、不富有，但它充满了一种朴素的美，一种清新与淡然，大自然在这里和人类亲密无间友好相处，而在它的怀抱里，我们可以忘却许多的烦恼与不快，我们会觉得，生活其实就是这样在矛盾中缓慢向前走去的，一切，全由每个人自己来安排……。

这篇文章在《光明日报》副刊发出后，后来又得了奖。我开始听到获奖的消息很是意外，因为我并没有觉得这篇一千多字的文章有多少份量，过后我又反复琢磨思量，我想，评委们大概也是被文章中蕴藏的某种含义感动了。

我还有两篇写得比较满意的作品是《乐手》和《遥远的乡村》。在《乐手》中我写了当年下乡插队时寄住在农民家中，房东吴大娘老实巴巴的儿子，这是一个很特别的男人，平时沉默寡言，一天里也难听到他一句话，而队里干活也总是把最重最累的活分给他干，他也从无怨言，似乎生下来就是干这份活的料，但就是这样一个木讷憨厚五大三粗的汉子，拉得一手漂亮的二胡，后来大队成立宣传队时，他也被吸收了进去。我在写这篇《乐手》时是动了感情的，我写道：“那时每每半夜醒来，总听得二胡的声音从小茅屋里挣扎着出来，那么哀婉，那么忧郁，那么悲怆，那么沉重得让人抬不起头

来，无风的夜晚二胡的声音像被一根细细绳子扯着似的，在空旷的湖面上游来荡去，而有风的时候声音则被风儿撕成了丝丝缕缕，似乎满夜空都充斥着这种似有若无的回声了，每每醒来听得这种声音，我便会长久地不能入睡。我是个感情脆弱的人，我会想起古运河边弯腰弓身的纤夫，想起风雨中飘摇的渔船，想起烈日下耕作的农人，想起那些一辈子也没跨出村口一步的老人，想起那些爱着却被匆匆做了他人妻的妹子。乐声，似乎在诉说着生活的无奈，又似乎要与这无奈的生活进行抗争……。这位汉子平时不多言语，少笑，半天可以不发一言，而且说起话来总有点结巴，但干起活来却异常敏捷与利索，生龙活虎的，比常人要勇猛数倍，村里的脏活累活重活全有他的份，只要唤一声他的小名，他立刻召之即来，捋起裤腿干起来……。他的苦日子似乎总也没个出头的时候，隔天要摇个船送妻子去看病，送儿子治腿疾，而且他的母亲从不偏袒他，每次田里回来，留给他的总是一碗米饭半碗咸菜，但他从没皱过眉。他一年四季一个光头，腰圆膀粗高头大马的，远看像一段黑黑苍苍的树桩，近看则似一座稳稳当当的铁塔，就连十个指头，也都粗粗短短地像十根棍子，二胡在他怀里，颇有点像大人在玩孩子的玩具……。我不知道他为何迷上二胡，且与二胡如此难分难解，但我知道，我们的民族之所以能一代一代延续至今，就是因为有了这样顽强敦厚的乐手。”——这就是我对这位乡村男子的全部赞誉：

他默默忍受生活给他的不公正的待遇，他顽强地挑着一个沉甸甸的家往前走，他没有被压跨，被麻木，没有被生活的轮子碾碎，二胡的声音是他在生活重压下坚强的歌唱，我想，这样的人，如果我不写他，那么我还能去写些什么呢？

在《遥远的乡村》里，我写了我在农村时的房东大娘，这同样是一个值得写写的女人，因为有她这种遭遇的女子在中国的乡村真是太多了！她们年轻时守寡，然后好不容易把几个孩子拉扯大，她们的青春岁月都很短暂，而伴随她们一生的，是那漫漫长夜和孤独寂寞的日子，然而，我的这位房东大娘又似乎有点与众不同，在她那纤弱的外表下，还有着一股江南女子少有的泼辣劲。我在文章中是这样描写她的：“来到乡村，家便安在阿婆的厢房里，开始时对阿婆的印象并不好，因为我发现这个女人竟然会喝酒。苏南女子比不得北方女子，在北方，女人抽烟喝酒也许是很不以为然的事，但苏南不行，苏南女子是很少有抽烟喝酒的。可阿婆会喝，而且每天必喝，六十多岁的老太太了，常常自斟自酌地喝个半醉，下酒的菜当然很简单，只是几颗煮烂了的蚕豆或黄豆。”——这是阿婆给我的最初印象，这最初的印象的确不太好，但随着对她的越来越了解，我对她的看法也全部改变了。我在文章的最后写道：“阿婆寂寞的人生是乡村许多女子所共有的，但能像阿婆那潇洒坦然面对人生的乡村女子却不多见，风雨中，阿婆总是昂首

挺胸向前走。我常常想起那段日子，我默默祝福阿婆晚年幸福，我为自己在生活的第一个站台就遇上了这样一位顽强的女人而感到人生真是有缘，遥远的乡村，是我永远抹不去的一个故事、一曲恋情。”

写到这里，我真想对所有的朋友说：我感谢生活，是生活给了我源源不断的创作素材。——难道不是吗？如果没有这一段乡村生活，我能写出这些充满乡村气息的散文吗？

(六)

在我的书柜里，有一个地方是专为我的那些小书准备的，其中不乏近年来入选了我的一些作品的各种文学选本，每每与它们相对，一股温馨的暖流便传遍全身：它们是我的孩子，也是我对这块生我养我土地的一份回报。

九十年代出版界的一个特点是，编选文学集子的风气盛行，于是，我的一些作品也陆续被选进了各种文学、散文的选本，选进大学、中学的教材，有的还译成英文、法文介绍去了国外。比如：《二十世纪中国女作家散文精品》选了我的《五味糖》、《街声》和《总想为你唱支歌》；《中国当代百家散文》选了我的《草湖夜话》；《中国当代美文300篇》选了我的《天目山寻秋》和《总想为你唱支歌》；《中国当代散文精华》选了我的《五味糖》；《散文精品大观》选了我的《悠远的纤道》。

另外，《五味糖》一文还入选《世界名家散文经典》；《悠远的纤道》一文还入选《华夏二十世纪散文精编》，《总想为你唱支歌》和《小街》两篇文章还入选《中国新时期抒情散文大观》，等等，等等。面对自己的作品被选进当代各种选本，我在高兴之际，更多的则是感到了一种压力，因为所有的文章都只能说明我的过去，说明我曾在中国的散文园地里辛勤耕耘过，而不能代表我未来的写作，如果我还想在这条路上继续走下去的话，那么，我就要不断超越自己，力争拿出更好的作品来。于是，我把所有的荣誉都丢到脑后，想尽法子去忘掉它。——我深深体会到，只要我有稍微的自得，只要我在我以往的作品前稍有满足，稍有沾沾自喜，我就会再也写不出好东西来了。创作的规律就是这样：永无止境。

写作空下来的时候我常常喜欢去苏州的大街小巷走走，我曾经碰到过陆文夫先生，那天，他双手放在身后，也正慢步悠悠从一头走来。——苏州的巷像一部历史，虽然看似平淡，但打开后很是耐读，那些巷子里常常住着一些曾经辉煌一时的名人，以及一些对艺术十分精到的老人。我从他们身上常常会想起一些名著的撰写者，比如曹雪芹等，他们身前都穷困潦倒，没有过上舒心的日子，更没有看到自己书稿所产生的影响，但他们的书却一代一代传下来了，让人百读不厌，回味无穷。作品的生命力是由时间岁月来鉴定的，作品的好坏是由

后代人来评说的，只有经过了漫长岁月的考验，只有在历史的烟尘里被反复浸渍后，一个真正的艺术家、作家才会诞生。——因此，一个作家的辛勤劳动，也许自己看不到收获的那一天，但这又何妨呢？当一个作家把自己的一生都已交给了自己倾心的事业，当他在那里找到了自己人生的寄托与安慰，这个过程本身就是他生命的全部了，至于结果，他会微笑着说：那就由后人去评说吧。

——因而现在，每当我坐在电脑前按动键盘时，每当我的思绪随着手键的“嗒嗒”声而翻涌流淌时，我的心灵，便与整个空旷的南方一样辽阔。

和法国科学院里现在还在勤奋工作的九位诺贝尔奖获得者相比，和众多的著名学者相比，我在法国科学院只能算是一个非常年轻的、刚开始有一点成就的研究人员，加上工作繁忙，理应埋头努力，不值得提及自己，但家乡这么多热心的人和领导在关心我，为不拂他们的好意，我抽空写一点自己的体会，我所获得的荣誉不仅属于我祖国、父母，属于我的家乡，我也期望我的经历对有志于从事科学研究的家乡学子有所鼓励。

我出身于一个普通的干部家庭，四岁时遇上文化大革命，跟着我父母一起到当时十分偏僻的盛泽农村下放，在一个由公共厕所改建的教室里上大队小学，而且是三个年级的复式班（现在的同学可能都已经不知道这样的班级了），但是生活的艰辛（晚上从没有电灯），加上学习条件的贫乏，并没有压垮我父母对子女在学习上的期望，在他们的鼓励下，我看了很

多书，学习很用功，成绩总是第一。七十年代初，邓小平先生的复出给很多老干部带来了新生，我父母的境遇也有所改善。我随他们到当时四面是水、交通不便的小镇上公社中学，学习条件比大队小学是强多了，但和很多城市中学相比还是差得远了。我在中学里从没有做过一次物理、化学实验，但所幸的是，中学里的老师们工作十分负责，这在当时读书无用论很时髦的年代真是难能可贵。我父母宁愿在生活上节省，给我和弟弟们买了大量的参考书，对我们在学习上施加的“压力”也越来越大。我在中学里的成绩也总是第一。1978年高考时，我取得了很好的成绩，但由于体检的原因，我被当时的浙江化工学院录取。那时我觉得受到了很大的打击，很多高考成绩比我低的同学都进了有名的重点大学，而我却要去当时远离大城市、地处山沟的浙化，一心想学物理的我还不得不改学化工，尤其是名声似乎不大好听的农药专业，我确实很不情愿。所以报到上学时，差不多是由我爸“押”着去的，这件事至今还被我爸爸、妈妈当作家里的笑料，从中也可看出当时十六岁的我在生活中还很幼稚，受不起一点挫折。我记得当时也没有洗衣机，我还不会洗衣服，临上学前我妈妈突击教我洗衣服的事。

当时的浙江化工学院地处十分偏僻的山区，离县城还有30公里，和清华、浙大等远不能相比，当时全校总共只有四五名副教授，一位正教授都没有，教学条件

不能算是好的。但是老师们都很负责，而且我始终牢记我母亲所叮嘱我的：有志者事竟成，事在人为。这两句话从那时起就是我的座右铭。离城市远，我周末也全用来学习，晚上自习总要在教室里到熄灯才回宿舍。为了培养自己的自控能力，特别喜爱文学的我在大学四年期间，竟从没去图书馆借过一本文学书，电影也极少看。在现在的大学同学看来，这似乎是修道院里的生活了，但当时在刚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中国，很多同学和我一样，对知识的追求高于生活中的享受，而且在大学竞争也非常激烈。时间虽然非常紧张，但我很注意体育锻炼。在中学里我多次代表中学参加吴江县的运动会，短跑、跳高多次获得吴江县的前三名；在大学期间我保持了这一好传统，在大学运动会上我每次参加，短跑方面总是名列前茅。良好的身体条件使我在学习上总能保持精力充沛，和很多一心读书但不注意身体的同学相比，我觉得这方面我做得还是很不错的。自进大学以后，在每门课的考试时，我基本上都是第一。大学毕业时，浙化在算我们这届毕业生的平均成绩时，我是全校第一。凭着在大学期间积累的坚实基础，1982年大学毕业前夕，我参加了浙江大学的研究生考试，我从没去打听过自己的具体成绩，但据说在浙大所有学科中我是最前面的，所以直接成了国家教委的出国预备研究生，派出国家是法国。从一个在大队小学上学的学生，到代表中国到国外留学的出国研究生，我在父母、老师的支

持、帮助下，走过了一段漫长又艰辛的路，所以 1982 年这一好消息给我父母、小学、中学、大学的老师们带来了无限的欢欣。

经过 10 个月在上海外语学院的法语加速培训，我又以上海培训中心第一名的成绩（是法国教师教、考的）获得法语结业证书，1983 年夏来到了美丽的法兰西共和国求学，我又开始了生活中新的一页。我们这一届我国派往法国 127 人，我只有 21 岁，是其中最年轻的一个，继周恩来、邓小平先生他们老一辈勤工俭学的留法学生，我们中国人又来到这个富有悠久文化、历史、科学传统的国家。我们将给法国同事什么样的印象呢？我们当时的出国研究生都感到压力特别大。当我们分赴法国各地时，来自国内不同大学、不同学科的同学依依惜别，相互关照要好好努力，千万不能给中国人丢脸。时过多年，我对这一情景依然记得很牢。按大学成绩及法语水平，我被分到法国科学院直属的南锡化学工程科学研究所，从该所所长 Villermaux（维莱莫）教授当硕士研究生。法国科学院在化工领域有好几个研究所，但直属的就我们这一个（相当于目前我国的国家重点实验室），共有研究人员二百余人，我的导师维莱莫教授是法国化工界的第一号权威，我们研究所历史上还曾有过诺贝尔奖获得者。

如果说在国内期间，我总是在较差的条件下求学，到法后，我一下子置身于排名世界前列的研究所，学

习、工作条件十分优越，但这并不意味着自己可以轻松一些了。法国有着闻名于世的基础理论研究、教学系统，稍有科学知识的人都会知道这些名字：Lagrange（拉格朗日）、Fourier（富里叶）、Laplace（拉普拉斯）、Poincare（普朗卡里）、Curie（居里夫妇）等众多法国科学家以及他们对科学的贡献。和法国的教育体系相比，我国大学中理论，尤其是数学的教学落后很多，这在刚出“文革”的年代难以避免，现在可能有很多改善了。所以一开始上硕士的理论课，和法国同学相比，我自己课外要花大量时间补数学。特别是我们这一届硕士生中，有一位是从著名的巴黎理工学院毕业的，那是拿破仑亲自创建的学校，学生都穿军装佩剑，每年只招全法国最出色的三百名学生，现在法国的各大企业总经理、很多政府部长都是从该校出来的，在世界上享有盛名。所以，研究所的所有人都认为这位法国同学肯定是我们这届的Majeur（首位）。但各理论课考试完毕时，大家都惊异地发现第一名是中国人，大家都向我祝贺，我的导师更是惊喜非常，逢人就要说李怀志打败了巴黎理工学院的学生，他也说从我身上看到了中国人的潜力。在硕士论文答辩时，我的导师特意邀请了美、德的教授来参加，在我们研究所历史上的硕士答辩中这还是第一次，我又获得了最高的成绩。从作硕士论文的第三个月起，我就开始在国际性学术杂志发表论文，一年硕士论文期间共发表了6篇论文，建立的煤和木质物的气化理

论模型被美国化学会命名为“融解模型”。中国驻法使馆多次通报嘉奖，称我是留法学生中的象征。但是在这些成绩后面，除了我的导师、同事以外，很少有人知道我为此付出的心血，到研究所后，我基本上每天都是工作到深夜才离开研究所。为节省时间，晚上常常一个三明治就当晚餐了，每天工作十四五个小时是常事，和当时的很多的中国同学一样，祖国的荣誉在心目中是第一位的，自己个人的荣誉远不是工作的动力。跟维莱莫教授作博士论文时，我一直保持着这样的工作节奏，博士期间的工作主要是研究一种新型的反应器，在理论方面，我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在运用方面，为多家法国化工企业转让了技术。博士论文答辩时，我的导师邀请了法国化工界所有的权威，加上德国和荷兰的名教授，研究所还特意邀请了记者参加答辩，这在我们研究所历史上也是第一次。由于在博士论文期间的出色工作，我被法国科学院选中为优秀博士论文大奖，同时还获得了七万法郎的奖金，在法国这是一个年轻科研工作者所获得的最大奖，法国每年在各领域只有 10 个这样的奖。我的父母、导师、研究所的同事都为我高兴，浙大、浙化和大使馆的负责人都向我祝贺，我想，祖国和家乡也通过我的获奖而受到了人们的尊敬。

博士论文以后，在我导师的鼓励下，我再一次选择了新的研究课题。我的导师说，一个出色的科研人员要在各种不同的课题面前经受考验。在国外，由于效率及

工业公司的需求，科研人员也必须常换课题，这和我国科研界几十年不换课题完全不同。我于1987年进入法国原子能委员会做博士，当时欧洲经济共同体十二国政府开始大规模投资搞一个巨大的研究课题：民用核电站的安全。在前苏联切尔诺比利核电站事故以后，这一课题越来越重要了。在西方学术界，一个很大的优点是年轻人也要挑重担，我一进该委员会就主持了这一课题的第一阶段研究：可行性研究。我在理论及实验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法国原子能委员会的刊物上曾有这样一篇文章介绍我的工作，题目是《法国最优秀的年青化工专家在我委员会工作》。从化工到核安全，我又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所有研究成果都属机密，现在都未能发表，但在我的工作以后，美国、日本政府也参加到这一课题中来，现在的投资已达二十亿美元，这也是对我工作的肯定。法国在核电站安全方面现在领先于西方国家，我国选择法国作为核电合作伙伴也证明了这一点。两年博士后以后，我又到一家私人企业工作，承担了法国工业部的超临界流体安全研究，工作受到工业部的好评。

1990年底，我被任命为法国科学院的一级副研究员，回到南锡化学工程科学研究所，在很保守的法国科学院，当时28岁的我是最年轻的副研究员之一。我的任务是和一位来自加拿大的教授一起创建一个由法国科学院、教育部及法国五家最大化工企业联合资助的复杂

流体化工研究中心。在欧洲，还从没有这方面的研究工作，在基础理论方面还基本上是空白点，而在工业应用方面，这一新学科有着不可估量的实用性，高分子化工、食品工业、医药工业、石油、生物化工等工业都需要有这方面的知识，所以在法国，由政府 and 工业公司联合投资一个实验室还是非常少的事，因此我们研究中心的设备是世界最先进的，五家工业公司每年给我提供一百万法郎的科研基金。我 29 岁时就开始带博士研究生，现在我已经五个博士研究生（分别来自法国、德国、摩洛哥）及二个硕士研究生导师，博士生们的年龄都与我相仿，在法国像我这样年轻的科研人员带这么多研究生也是罕见的。我常接待来自世界各国的参观者，他们都很惊奇，尤其是来自中国的教授更是感到不可思议。现在我是这个研究中心的科研负责人，我和学生们除为工业公司解决了很多难题以外，在理论研究方面也取得了许多成绩，我在把物理混乱理论应用到化工及动力学领域取得的成果，被各国同行称为世界领先的，当然我清楚地知道，我和研究生们还有很多很多的事要做，我们已经完成的只是开始而已。在国内上小学、中学、大学时，我父母常批评我骄傲自大，当时的我的确很自满，但到法国以后，虽然我仍然总是第一，但我学会了以谨慎的目光看待自己，尤其是在赞誉面前。在这里我有机会接触很多著名的学者，他们的谦虚是我这样年轻的后来者的最好榜样。

我国现在正在发生巨大的经济革命，建设成就令世人瞩目，作为由高级知识分子组成的中国科协法国分会成员的我，在我们新领域的基础理论研究方面应该多和国内的学者交流，在帮助接待中国进修人员方面，我也开始做一些工作。家乡现在的变化之大令我难以相信，在巴黎时有幸见到沈荣法、屠金林先生等一行，他们年富力强，有文化、有专长，相信在他们领导下，家乡的面貌将会发生更大的变化。在家乡与国际工商交流方面，有机会的话，我将努力利用在法国工业界的联系，为家乡的发展出力、出建议。现在中国等新兴工业国的快速发展，给法国等西方工业国带来了严重的挑战，这里越来越多的人在把世界性的经济竞争形容为经济战争，建议法国政府要在教育、科研方面多投资，以培养出一支优秀的经济军官队伍——工程师、研究人员、设计员、推销人员。我深信在这场新的“世界大战”中，中国定将取得决定性的胜利，而家乡将走在中国发展的前列。

我期望家乡学子能从我上述零乱的叙述中看出，一个人不管在任何条件下，只要坚信事在人为这一准则，通过自己的勤奋努力，必能在事业上有所作为。随着我国经济的起飞，同学们学习的条件会越来越好，我也衷心期待着年轻的家乡学子在事业上超过我，为家乡争光。

最后，我想再次谢谢家乡这么多关心我的人，请大

家相信，为了你们，我在科研的道路上会加倍努力，以期取得新的成绩。



从雪山之顶俯视，周围的山峰已经失去了轮廓。他现在站得太高，与人间离得太远。但在迷茫的风雪中，他似乎触到了上帝的呼吸，那种孤寂的静，使他产生大叫大喊的欲望，而他所能发出的却是一串长长的呜咽，那是疲惫至极的幸福！他以这种方式，让地面的人类和天空的上帝对话……

1994年8月1日，苗来生作为中国人，孤身攀上了唐古拉山主峰，海拔6621米的各拉丹冬之巅，印上了一双属于中华民族自己的足迹。《人民日报》及其海外版等全国各大报刊，乃至世界各地有华人聚居地方的新闻媒体，都以极显著的版面、极富情感色彩的骄傲语辞，报道了苗来生这一不同凡响的壮举。

苗来生是中国的骄傲，更是吴江的骄傲。他出生于我市青云镇的一个渔民家庭，艰苦的人生和良好的教育，把他磨炼成一位具有强烈进取精神、求实好学、坚韧不拔、勇毅热忱的

清华学子。冲顶各拉丹冬是他第一次参加科学探险攀援雪山的活动，这里将登载的是他首次披露于世的最后200米的探险历程录，读者可从他的自述中，看到这位吴江儿子是怎样战胜种种艰难险阻，去创造他生命的辉煌的。

——编者

(一)

坡越来越陡，有的坡度要七十多度；雪越来越坚硬。冰镐根本插不进去，用尽全力往冰雪上砸冰镐的锯齿小头，也只能扎入二至三公分。这里就是各拉丹冬海拔6400米以上的地方。从这儿要突破顶峰，还需要闯过四个陡坡的难关。每个坡的顶上都有一撮风化的裸岩，而且坡一个比一个陡。

我的队友张为和苏毅为了保证我成功，毅然拿出了他们的装备让我挑选。我拿走了三把冰镐中的两把日本镐。从三个人的六个冰爪中挑出相对最好的一副自己穿上。然后背上冰镐绳套，与队友和队旗合了影，又照了单人相，双手分别握好冰镐，与队友告别，此后便要开始我独立作战的征程。此时真有“风箫箫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返”的感觉。路线是队长张为在1991年清华大学登山队攻顶失败的经验教训之上，在我们从C2营地到6400米行进中仔细琢磨突然开窍制定的。那

就是一直沿着离雪檐边二至三米的部位往上爬。本来按常规，上陡坡应该走“之”字形路线。清华大学登山队1991年从6400米攻顶时就是走的常规路线，结果到了第一块岩石下部时，却怎么也过不了那几乎是垂直的又相当宽的风化岩石而被迫返回6400米处。1985年日本登山队攀登此山时，他们从6400米到第四块岩石顶是花了一个星期全部打上绳子才上去的，而且又听说他们登顶后在顶上过了一夜，第二天才下撤的。可是日本人并不象我们那么慷慨，在自己登克顶后，把所有详细资料毫不保留地全部奉献给北大登山队。我们从日本人那儿所能了解的最详细的東西就是上面所提两点。因此从6400米往上的路线以及山体情况的资料我们基本没有，这就是首登该峰的最大困难。我们只能靠目测凭经验来作出合理的判断，然后根据该判断作出计划。好在事后证实，大部分判断都是正确的，要不也只能再次败退而归，而从大本营到6500米左右的一段资料，我们则建立在清华大学登山队的老队友们1991年夏攀登各峰的基础之上的。

开始的一段路还可以，坡度也只是七十来度，冰镐的锯齿也能扎进三厘米左右，不过我还是相当谨慎，每一脚的移动，都是在两把冰镐都死死地扎在冰雪里的基础之上的。其实我从6400米开始就一直在爬行。这样大约进行了二十多分钟。这时冰越来越硬，冰镐砸起来也越来越费劲了，有时要用尽全力砸好几下才能把冰镐

的锯齿扎入冰中二厘米左右。但我丝毫不敢疏忽或掉以轻心，也就在这时，左脚的冰爪突然松动了。这该死的冰爪与奥地利产的靴子根本不配套，冰爪的左右比靴子要宽近两个厘米，这时只听见张为在下面喊，“坚持到第一块岩石上再绑冰爪！”他大概一直在注意我的一举一动。好在我用两把冰镐上去本来就是为了应付这不可靠的冰爪中途松脱的。因此也并不惊怕失措。两把冰镐一脚冰爪也能实现“两点固定移动第三点”的安全行进法。再往上雪突然松了，用冰镐一插，竟然没到手柄。连插几次都是这样。糟了，遇到雪洞了！再仔细上下左右一对比，那个地方雪的颜色明显与周围地区不同。好在雪洞都不大。再经过冰镐试探，终于顺利地过了这个雪洞区域。接下来也就很顺利地到达了第一块岩石的顶部。

(二)

我当时心里倒是很平静。但后来听张为说他当时心潮起伏，看到了我超过了我的老队友 1991 年清华登山队的蒋惠忠、陆树兵时竟然激动得差一点掉了眼泪。1991 年我虽然已经是清华登山队队员了，但由于实习原因未能随队去各峰，因此我当时倒没有那么激动。但张为两次出征各峰都任队长，而且他们在 1991 年是历经磨难而失败了的，我理解他当时的心情。

在第一块岩石的顶部我重新绑了全副冰爪，咬了一



苗来生同志

通过此次登山活动，锻炼自身，引导更多的青年学子步出自我心理的怪圈，在大自然中磨炼自己的意志和品格，在社会生活中培养自己的能力。

——苗来生

口巧克力，歇了片刻。接下来就是第二台阶。第二台阶比第一台阶距离短三分之一，坡度比第一台阶稍陡。其间又松了一次冰爪。这次更惨，冰爪完全脱落，最后我是脖子上挂了冰爪上第二块岩石顶部的。第三台阶坡度缓得多，距离又短，因此不费多大劲就上去了。

但就在第三块岩石顶部休息时，天气突然阴沉下来了，这是我始料未及的。再向上看看，第四块岩石是那么的遥远，估计比第一台阶距离远三分之一，而且坡度也陡得多，特别是接近第四块岩石的地方几乎是垂直向下的。在这种地方即使是完全平移也是相当难、相当费体力的。再往下看，第四台阶底下完全是雪崩区，看了令人心惊胆战。但我当时很清楚：现在上，那么我能克服恐惧感，而且目前体力还行，完全有可能到第四块岩石，也就能够上顶；但假如下撤了，隔几天再上来时，很难再战胜自我了。因此，我决定先看看天气的变化情况，再决定是撤还是上。这样等了约四十分钟。天气就是阴沉着，也没什么变化，于是我决定上。我又重新仔仔细细地绑好冰爪，检查冰镐绳套。一切准备就绪，天气还是老样子，当时我唯一做到的就是谨慎，每一个冰镐不扎下三公分决不罢手，因此有时需要连砸四五次才能固定一个冰镐，就这样一步一步地慢慢移动。可是走了四分之三的路程，天气就开始转坏了。天上开始零星地飘起雪花，好在风还没有变大。我当时唯一的想法就是越过第四块岩石。再抬头向上一看，如果要从

第四块岩石顶上过的话，那么就要在几乎垂直的陡坡上往上爬二十多米。另一个办法就是横切第四块岩石，这样速度比较快。我在学校时，星期天经常出去攀岩。因此虽然知道那岩石是风化的，倒也并不觉得不可攀越。于是偏转角度向岩石平移。可是快接近岩石时，又被那岩石边近两米宽的冰窟窿惊呆了。这怎么过去呢？于是想绕过该冰洞区。可是上下移动了四五米，情况还是类同。看来靠近岩石边全是冰洞。也正在左右为难之际，狂风夹杂着雪暴朝人扑天盖地地打来，砸掉靠近身边的冰窟窿上面的薄冰雪层。冰窟窿不深，大约一米高，而且底下用冰镐砸时还挺结实，于是我蹲进洞里，静静地呆着。我不断地活动着手指、脚趾，不断地大口喘气，倒也并不觉得特别冷。这样蹲了将近一个小时，天突然转晴了。真是谢天谢地，冰窟窿上面的冰雪层冻得特别硬，人从上面爬过，绝对不会塌下去。于是顺利通过，爬到了风化的碎石上面。脱下冰爪，摘下早已湿透了的手套连同一把我认为上顶已经不需要再用的冰镐一起放入岩缝里。然后左手拿着另一把冰镐，开始徒手攀岩。终于到了右上角平坦的雪坡上。

(三)

再一看通往顶峰的路，我知道成功就在我面前。此时，大约十九点钟左右。我举起左手的冰镐向大本营挥了挥，然后直奔顶峰。可是刚跑了几步，呼吸就赶不上

了，于是不得不又停下来慢走。看着平坦的雪坡一尘不染地展现在我眼前，再回头看看那一连串自己留下的脚印，我激动无比。那上面特别的静，只听见靴子踩在雪上的嚓嚓声。我当时真想大叫大喊，但我叫不出来，只是不停地发出呜咽声。我现在想，假如当时有人听见，一定会认为是野兽的声音。可是好景不长，在我快到达顶峰时，天气又突然变了。只几分钟，狂风夹杂着雪粒把人吹得站不起来。看那来势比第一次变天气时更猛，当时我唯一的办法就是双手镶到左右衣袖里，胳膊护住双耳，跪趴在雪地上，不断地大口向鼻尖吹热气。可是雪打在脖子上和后背的下部马上就化成了雨水。这样持续了大约两个小时，我蹲得实在难以忍受了。于是就站起来，发现风雪已经小多了，就决定到了顶再说，等我走到顶峰下面的岩石边时，我又犹豫是否在此过一夜，然后明早登顶。于是想用冰镐挖雪洞，可是除上面一层浮雪外，下面全是冰，根本挖不出洞来。于是决定马上登顶，登顶后连夜撤回。于是爬上顶峰，此时刚好是晚上九点二十五分。经在顶峰下趴了两个小时，因此，激动的心情早已平静下来了，登顶后唯一想到的是如何更好地完成任务。

然而，我一个人在顶峰，谁给我留影把我与山峰合照在一起呢？没有办法，我又向右爬行了五六米远。坐在窄窄的脊上，把冰镐插在靠近顶峰的岩石缝里，把队旗穿在冰镐上准备照相。此时，虽然风已经小多了，但

要是站起来的话，它还是可以把你吹下崖去。再看看周围一片灰暗，根本看不到别处山峰的轮廓。由于戴墨镜已经习以为常，当时也根本没想到要摘下墨镜。于是照了几张顶峰的照片，又向周围胡乱照了几张。然后，自己左手拿相机，伸直胳膊，自摄与队旗的合影。我当时还真不敢相信这样能照出来，只是存在一种侥幸心理，况且在这样重要的情况下，浪费几张底片是无所谓的事情了。然后掏出早已刻好的有“中国科学探险协会 1994年8月1日”字样的空蔬菜汁罐头，摸出了刀子。

(四)

摸出刀子，又附加刻上“清华大学，苗来生”字样，把蔬菜汁罐头放在冰镐边上，周围堆上碎石块，又把一块巧克力纸用石块压在蔬菜汁罐头边上。取出取样瓶，灌满一整瓶未被动过的雪样。这些工作做完后，马上下撤。

此时已经晚上九点四十五分。天虽然可能已经停止下雪了，但暴风仍然卷着浮雪在天上飞滚，能见度仍然是几米远。不过坡上又新增了十五厘米的雪层，此时，冰镐已经能够插入雪中三分之一了。我沿着上来的梁子往下撤。梁子靠左边可能比较陡，我看见雪不断地整块整块往下塌。因此我尽量沿右边走。走了好长一段时间后，按理说应该到第四块岩石的顶部了，然而我连一片岩石也找不到。因为我一直觉得我是沿右边走的，那么

第四块岩石应该在左边，于是绕着山腰往左边行进（事后分析，我当时是横穿了通向第四块岩石的那个脊而走上了通向西藏的那个脊）。可是绕了大半个山头，还是没有看到岩石。当时我就清楚：我迷路了。但还是不能判断第四块岩石到底在哪个方向。最终只有一个念头，往下撤。可是此时山已经比较陡了，我在没有冰爪又只有一把冰镐的情况下，不敢贸然沿锥体母线下撤。而是走螺旋线下撤，这样撤了一阵子后，我对自己所处位置心中更没有底了。在螺旋下撤的过程中，一次我的冰镐突然插空，把我惊出一身冷汗。仔细一看。原来冰镐插到雪洞上面的浮雪上，把浮雪打落洞内，此时已经能够看到黑洞洞的一大块。再往前看，前面雪山体的锥体母线相当平坦。因此决定继续往前。再扒下用冰镐打雪洞的右侧边缘，发现是硬的冰。但那边缘很尖也很窄，于是右脚先斜向前下方的雪坡伸开，然后左脚放入空洞洞的雪洞里，整个身体骑坐在冰沿上，左手拿冰镐，用冰镐和右手撑着慢慢向前移动，终于过了此雪洞。然后盼望着到达那个缓坡，但是不管爬了多久，发现缓坡还是那么远。终于发现是自己的视觉错误。不过此时，坡度确实已经缓了一些。而且经过那个雪洞的训练，对坐在雪地上活动已经适应了。于是试着沿母线下滑，用冰镐行动时还得心应手。就这样滑下去吧。突然发现前方颜色不对，怎么是黑乎乎的？使出吃奶的劲挥动冰镐往下砸，迅速翻身压在冰镐上，如此高速下竟然一下停住

了。再往下看，原来是一个垂直陡坡，到底有多深也判断不出来。于是又沿着山腰横切了一断，看到下面是缓坡了就继续下滑。就这样往复行进，此时天气已经算转晴了，虽然看不到眨着眼睛的星星，但毕竟风已经停了，飞雪也没有了。下滑时最恼火的是遇到陡坡或雪洞，想要横切时发现坡上还是雪洞，必须上攀。你想，我又没有冰爪，上去很容易往下滑，而且上坡本来就费劲，在下滑时还必须使足全劲才能止住。大约在6500—6400米之间（现在判断），雪坡上面只有一层薄雪，下面全是硬硬的冰。

（五）

在此段路程中，我体会到了身体完全不能自控的感觉。有一次失控下滑时，使劲砸了三次冰镐都未固定住，却因第三次用力过猛且滑速过高而使人翻滚起来。当时冰镐已经脱手，人翻滚个不停，好在由于张为经验丰富，临行前他让我把冰镐绳跨肩背，因此冰镐未丢。我拼命想抓冰镐，但就是抓不住。我当时手乱抓个不停，心里闪过一人念头：我完了。但奇迹发生了，积雪突然增多，冰镐又刚好一下扎进雪里，竟然把我拖住了。缓过气来后，我的感觉就像头被皮榔头击了一下一样。想想真是命大，要在那一段高处就翻滚下来，此命必丢无疑。缓过神来后，继续下撤。经过此段路程的锤炼，此时我已经把从《山野》上学到的冰雪作业知识与

实践很好的结合起来了。很远我就能“凭颜色”判断出前方是冰裂缝、雪窟窿，还是正常坡。甚至能够基本判断浮雪的厚度。到了最底的一段，冰雪又很薄了。每次的止动都要竭尽全力才行。最糟的是，我快要到凹底时，在休息时手套突然掉落，沿着雪坡往下滚。看看下面好像是很平的，但只是朦朦胧胧的，也许又是视觉错误。况且丢了手套后，手抓住冰镐时冻得发麻，手指也不灵活，很可能因此行动不了。况且我也担心被冻伤。于是原地挖几下，找出两个站脚的平台，然后把冰镐的锯齿端狠命砸入冰雪中，坐在冰镐上单等着天亮。此时，看表刚好是凌晨1时20分。我用帽子将耳朵盖上，抓一些浮雪涂在耳朵外面的帽子上，不一会儿就结了一层冰，作用却好多了。同样，双手各插在左右衣袖里，用嘴不断地对着鼻子吹气，脚趾不停地弯伸。虽然没风，不一会儿腿还是麻木了，于是换一个姿势继续坐。早上刚到六点，我往下面察看，隐约看到确实是个平台，于是滑下去。拣到了手套。但手套里灌满雪，而且已经结成硬邦邦的冰了，根本没法戴。我当时老觉得6100米的二号营地在右面。于是沿着平台向右行进。那平台上面积雪很深很深，有很多地方一个冰镐插下去就全没了，在这种地方，我只能爬行，有时甚至滚过去。说是平台，其实也不平，越往右越低。到七点时，我差不多到了最低处，那儿有好几条冰裂缝在流着冰水。此时万道霞光从东边的坳口升起，看上去异常漂

亮。我照了几张相，然后往西南的一个山谷走去，因为我看见那边半山腰好像有个白色的马鞍帐篷，我当时以为北大登山队已经来了，大本营建立在那儿，或者是柴达木综合地质考察队的帐篷。于是往那边行走，走没多久，发现那儿全是没到靴邦的烂冰雪，我的脚也湿了。再往西北面一看，冰裂缝的水全往那儿流，且可以看到尽头是一个很大的类似水库的湖，而且尽头的山上也没有水。我想既然那儿已经出雪山了，而且沿着那条河向下，必然能找到它与大本营那条河的汇流处，那么也就能回到大本营，至少可以找到牧民。但走到那边后发现根本过不去。经过思考，忽然恍然大悟，出太阳的方向就不是大本营的方向么！那么那个坳口的东侧不就是二号营地么！于是决定爬上那个坳口去。此时已经是上午九点多了。也就在往回走时，因为上坡才发现自己昨晚把体力耗尽了，胸口也不住地痛，不能作深呼吸，我知道这是昨晚吸了大量冷空气所致。此时脚上的重量已经是鞋的三倍了，而且那冻在鞋上的冰层根本敲不下来。

(六)

于是，脱掉登山靴子，光脚踩到雪地上，虽然太阳已经火辣辣的了，但脚还是冻得麻木。不得已又穿上了靴子。这样继续走，到快十二点时，冰雪在烈日高照下全融了，脚一踩就没到靴邦上面，每移动一步都非常困

难。到十二点时，我在又渴又饥又累的情况下实在走不动了，于是背对着太阳侧躺在雪地里睡到下午三点多才醒来。醒来走了几步又受不了了。口袋里只剩下半袋半两一袋的牛肉干，又不敢随便吃掉。于是脱掉登山靴外靴，又把口袋里的一瓶顶峰雪样、一把野外用刀、一副雪套以及剩下的唯一的一把冰镐插在那儿，想等我回到二号营地后，让队友下来取走。此时雪已经没过膝盖，根本没法行走，于是滚一阵、爬一阵、歇一阵地前进，再看看离坳口还很远，而右侧不远处就是岩石，想攀岩上去可能相对简单一点。于是尽一切努力在那儿扒。往坡上爬太困难了，而最困难的是离岩边上二十米内全是冰。在没有冰爪又没有冰镐的情况下，我只能用五根手指，利用体温融冰掘出五个指洞，靠这样固定，不使身体下滑，慢慢地往上爬，终于于五点二十多分时到岩石边，三十几时分到最下面岩石的顶上。我当时就感觉张为他们肯定在找我，但不知他们会不会到这上面来找。我试着向上使劲叫了三声。居然听到回声了。接下来还听到张为问我：“你上来还是我们下来？”我说：“你们下来吧，给我拿点吃的来。”此时是十七点三十七分。我兴奋地一口气把剩下的牛肉干全部吃完，坐着岩石上等他们下来。等了好一会儿，才见有两个人从坳口像小孩滑水梯一样地往下滑，当时还觉得好玩得很，准备用相机把他们照下来。可是突然我听见张为一声惨叫“啊！”再一看，前面的那个人不见了。后来又听见张为

叫“王经亮”，此时我才知道来营救我的是张为和王经亮。过了好长一段时间才看见另一个人又出现了。他们又继续下滑，然后平移到我那岩石边上。他们体力毕竟比我好多了，一会儿就爬上了岩石。此时，我才知道：刚才王经亮与张为结组下滑时，王经亮掉进七八米深的冰裂缝里，他与张为结组的绳子也断了。后来是他从缝里往上爬，露出头后，张为挖掉周围的雪才把他拉上来的。他为了我也差一点死了。

(七)

他们把东西给我吃了以后，也脱落外鞋与我一起沿着风化的岩石往上爬。

岩石风化得很厉害，稍一用力，便塌下一大堆，我们整个身体差不多都趴在岩石，然后小心翼翼地往上爬。张为和王经亮脖子上各挂了一双自己脱下来的外靴，而王经亮还背了一个登山包，他们的难度比我大多了，可是在攀岩过程中，他们俩却一前一后保护我。我当时体力极度地差，每爬几下就得休息好长一段时间。他们就一前一后等着我。一直爬到天黑（九点半以后）才到岩石顶部。上来后，我才知道，那儿差不多要到6300米处了，于是下撤又成问题了。

我没有外靴，更没有冰爪，而那坡有几段也还是陡。这样每下一次陡坡，他们俩又必须有一个重新上来一次给我靴与冰爪，然后再陪我下去。这样折腾，一直

到晚上十二点半，我们三个才最终顺利到达二号营地。

在苗来生看来，各拉丹冬只是他生命中需要战胜的一个高峰而已，辉煌不是用于向人们炫耀的，而是用来照亮他人心灵的灯。24岁的他，在1995年告别清华学子生涯的时候，组队又一次远征了四川岷山。他把这支科学探险队同时建成了国内第一支不留一点垃圾于雪山的环境保护行动宣传队，又一次受到了国内外的瞩目。为此，中央电视台等国家一级报刊又一次以巨大的篇幅介绍了他及其队友们的光辉业绩。苗来生则认为，自己的这次活动除了科学考察的需要外，其主旨还有二：一是“以自己的实际行动，身体力行地向他人、向社会呼吁要爱护我们的大自然，不做人类家园的破坏者！”二是“通过此次活动，锻炼自身，引导更多的青年学子步出自我心理的怪圈，在大自然中磨炼自己的意志和品格，在社会生活中培养自己的能力。”

——编者